

话说中国

百年记忆

卷十五

主 编 李 诚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天安门迎来新领导人	(1)
含笑走下天安门	(1)
皇家圣地与人民乐园	(4)
古城楼笑迎游人	(10)
邓小平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	(21)
天安门迎来第三代领导人	(26)
两代领导集体顺利交接	(32)
改革攻坚的新阶段	(39)
新的机遇新的挑战	(39)
“市场”的困扰	(44)
平地春雷:邓小平南方重要谈话发表	(48)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	(55)
新的改革大潮的涌起	(60)
第三代领导集体开创外交春天	(65)
欧洲的对华政策在经历重大变化	(65)
面向 21 世纪的中德友好合作关系	(68)
中英关系回顾与展望	(75)
法国以最长的红地毯迎接江泽民	(82)

跨越欧亚	(85)
编织中国与东西欧友谊的长虹	(99)
法国十分期待李鹏	(107)
委员长首访西欧三国	(112)
李瑞环在瑞典饮 250 年前的中国热茶	(115)
江泽民非洲六国和胡锦涛出访拉美	(118)
乘普通航班出访	(134)
对中亚决不“输出经济改革模式”	(142)
钓鱼岛问题使中日关系蒙上阴影	(159)
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访美	(170)
东方风来满园春	(176)
一	(176)
二	(180)
三	(182)
四	(185)
五	(187)
六	(191)
七	(193)

天安门迎来新领导人

含笑走下天安门

1989年冬天的一个上午，中南海正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新任不久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把一份辞职信摆在几个常委的面前。

这几位中国政府和党的最高领导者脸上都露出了庄严和崇敬的神情。

这份辞职信出自邓小平之手。

自从1979年以来，事实上邓小平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国内外都承认这一点。

有谁愿意放弃手中的权力，自愿由大官回到普通平民的地位上呢。

邓小平做到了这一点。

辞职请求信是这样写的：

中央政治局：

我向中央请求辞去现在担任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

1980年我就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废除干部

领导职务终身制。近年来，不少老同志已相继退出了中央领导岗位。1987年，在党的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为了身体力行地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我提出了退休的愿望。当时，中央反复考虑我本人和党内的意见，决定同意我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退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决定我留任党和国家的军委主席的职务。此后，当中央的领导集体就重大问题征询我的意见时，我也始终尊重和支持中央领导集体多数同志的意见。但是，我坚持不再过问日常工作，并一直期待着尽早完成新老交替，实现从领导岗位完全退下来的愿望。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的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现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夙愿。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的。恳切希望中央批准我的请求。我也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辞去国家军委主席的请求。

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我们党、我们国家和我们军队所取得的成就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刚刚起步，任重而道远，前进中还会遇到一些曲折。但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把先辈开创的事业一代代发扬光大。中国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来，就一定有能力永远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11月9日晚，电波传送出震动中外的信息：中国共产党

第十三届五中全会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广大人民群众对他身体力行，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作出表率，表示由衷的敬意。

自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以来，多少年，他自己一直就盼望尽早完成新老交替，完全从领导岗位退下来。

终于，85岁高寿的邓小平，实现了夙愿。他高兴地对出席五中全会的同志们说：“感谢同志们对我的理解和支持”。

中共中央的决定历数了这位经历曲折的职业革命家的功绩，其中提到：

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作为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目睹“文革”给国家、人民造成的灾难，同党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面对国家经济不发达、人民生活不富足的状况，他又果断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决策；为使中国兴旺发达，他力主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改革开放，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他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立国兴邦而确定的正确路线。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他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提出的富有创造性的构想。

独立自主，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是他倡导的为新中国赢得了崇高地位的外交方针。

邓小平，作为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宝库，作出了辉煌的贡献。

如果从他加入共青团计算，67年了，他一直在为中国革

命和建设奋斗。他几十年为党和国家建立了卓著功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功业，同邓小平的名字紧紧地连在一起。在把中国送入崭新的 90 年代之际，他了却心愿，退出了最后一个领导岗位。这结果，如海外舆论所言，应该是并非出人意料。但又还有多少善良的人们，希望国家的稳定发展继续得力于他的帮助。毕竟，是他把中国引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新时代。

“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

邓小平含笑走下天安门。

皇家圣地与人民乐园

中国古代封建帝王都城建造，有“左祖右社”之说，北京皇城沿用了这一传统规制。

从天安门巍峨壮丽的红墙向东延伸，苍松翠柏、紫藤绿柳丛中，矗立着几座布局紧凑而爽朗的古代建筑，这就是现在的劳动人民文化宫，旧时称太庙；而位于天安门城楼西侧的一处精致秀丽的皇家园林，是旧时的社稷坛现在改为中山公园。

太庙是明清两代封建帝王的家庙，始建于 1420 年（明永乐十八年），距今已有 500 多年的历史。明清两代，这里是供奉所谓列圣功臣的地方。据史料记载，凡皇帝登基、大婚、册立、出征、凯旋等重大事情，皇帝都要来这里祭告太庙，

向他们的祖宗禀报。

太庙平面呈长方形，古地面积 13.9 万平方米，南北长 475 米，东西宽 249 米。它的中心建筑是前殿、中殿和后殿，称“三大殿”。全庙共有三层围墙，朱红宫墙、黄琉璃瓦顶。在第一层和第二层围墙之间，古柏森森，使人有肃穆、清静之感。由第二层围墙的琉璃砖门走进，东边原为“神库”，是收藏祭祀用具的地方；西边原为“神厨”，是存放祭品的地方。门内金水河，清澈见底，流经东西，河上架以七座白石小桥，桥上绕以石栏杆，小巧秀丽。桥的北面东西两边各有一个亭子，亭内有井，俗称井亭，亭子为六角，飞檐翘角，美观新奇。北面则是戟门，这个门是因当时门外有排列持戟的仪仗队而得名。

跨进戟门，迎面是前殿，其规模最大，是三殿之主，皇帝常在这里举行大祀。殿前有宽大的月台和三层石基，石基上建有白石栏杆，栏杆顶端，雕龙刻凤、工艺极为精细。中殿小于前殿，也叫“寝宫”，是平日供奉死去皇帝神位的地方，清代从太祖到光绪的神主牌位都在这里。后殿则自成院落，殿的规模较小，殿内供奉着清室未入关的 4 个列祖，前殿的东西配殿，则放着满、蒙、汉的功臣各 13 位。院内还有许多 500 多年树龄的古柏。

除上述建筑外，太庙东边原来还有打牲亭，西边为小园，原称鸳鸯院，传说昔日还有仙鹤等。太庙整个建筑，朱门丹壁、富丽堂皇，和故宫毗邻，浑然一体，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高超的建筑艺术才能。

1924 年，太庙由清室移交北洋政府，曾作为和平公园对

外开放，1931年，由故宫博物院接管。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诞生，人民政府就立即着手筹办劳动人民文化宫。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把太庙交给工会作为工人文化活动的地所。

1950年太庙正式改名为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其南门上的“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的横额为毛泽东手书。

每逢国庆节、国际劳动节等重大节日，首都人民都在这里举行盛大游园联欢。前殿中殿和配殿，还经常用来举办图片、书法、画等展览。宫内还开辟了图书馆、电影馆、棋艺室、运动场、儿童运动场等。西边的小园，现在建成了容纳3000人以上的剧场。假日期间，这里还经常举办周末晚会，放映电影，进行篮球比赛、有奖游艺、棋类表演。昔日皇家庙堂，如今成为劳动人民的娱乐场所。人民作家赵树理曾生动叙述了太庙的变迁，他写到：

古来数谁大，
皇帝老祖宗，
如今数谁大，
劳动众弟兄。
世道一变化，
根本不相同，
还是这所庙，
换了主人翁。

社稷坛建于公元1421年（明永乐十九年）。“社”，就是土地；“稷”，就是高粮，是五谷中最早种植的，通常也代表

“五谷”。每年二、八月皇帝都要亲自到社稷坛，举行降重的祭祀仪式，祈祷五谷丰收，以示关心民食。乾隆年间，皇帝有时还在这里祈雨祈雪。此外，社稷坛还举行过出征、班师、献俘等仪式。

中山公园环有两道红墙，穿过第二道红墙，便是内坛了。在内坛的中央，环绕着一道方正的琉璃矮墙，墙的中心便是社稷坛，通常称它为五色坛。做为中山公园的主要古迹，社稷坛位于园中心最引人注目的地方。

汉白玉砌成的三层方台便是当年皇帝祭祀社稷的祭坛。整个坛呈四方形，约40平方米，高约1.5米，四面出台，各四级。坛分为五个方位，铺有五色土：东方甲乙木，铺青色土，采自山东；南方丙丁火，铺红土，来自两广；西方庚辛金，铺白土（现已不白），进自陕西；北方壬癸水，铺黑土，掘自涿洲；中央戊己土，铺黄土，贡自中州河南。这五色土并非为了好看，而是表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祭坛的地基全部用汉白玉筑成，坛四周的矮墙，也按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覆盖着青、红、白、黑四色琉璃瓦。在坛中央曾有一方形石柱，名为江山石，意为“江山永固”。

中山公园内还有一个陈列花木的温室——唐花坞，这里一年四季群芳争妍。走出唐花坞，沿长廊西行，有一座双檐八角亭，叫作兰亭碑亭，它由一块兰亭碑和八根刻有文字的汉白玉石柱组成，这些碑柱是1917年从圆明园废墟中清理出来移到中山公园的。起初，管理人员在园内建了一大门敞轩，把兰亭碑移进轩内，直到半个世纪之后的1971年，中山公园管理处才以那八根刻有“兰亭集序”的柱子，重建一座名符

其实的兰亭碑亭。

兰亭碑亭原是圆明园 40 景之一。清高宗弘历，喜舞文弄墨，他精选历代著明书法家虞世南、冯承素、柳公权、董其昌等临摹王羲之的兰亭序墨迹及有关兰亭的诗文共七册，自己也御临一册，命人刻在 8 根汉白玉柱上，即兰亭八柱。

兰亭碑为石碑，高 6 尺，宽 5 尺，厚 1 尺，正面刻上中国晋朝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王羲之修禊的故事，背面刻上乾隆撰写的一篇诗文。这里记述了晋永和 9 年（公元 353 年）夏历 3 月 3 日，王羲之和他的朋友共 41 人，来到浙江会稽山游览，他们在兰亭饮酒赋诗，游兴极浓。王羲之兴致勃勃，挥笔疾书，写成一篇《兰亭集序》，共 28 行，324 字，笔法刚劲圆润，字字皆令人悦目，成为书法中的珍品，这就是著名的兰亭帖，后人临摹者甚多。

如今，兰亭八柱大部分已经风化，字迹依稀难辨，但兰亭帖却流传于世。

社稷坛南门外有一对石狮，以小石敲击，一个发出钢音，一个则发铁音。然而它的妙处尚不仅如此。雄狮爪下一球，雌狮抚一幼狮，各置门之东西，两狮挺胸昂首，皆扭头大笑。尤以雌狮笑口大开，憨态惟妙惟肖，简直是一幅石狮的“闺房记趣”！据传说，这一对石狮是隋唐遗物，至今已 1300 余年。

中山公园的奇石以安徽的灵壁石最佳，形态奇特，瘦透漏皱，各尽其妙。其中以“青莲朵”、“青云片”、“李芝石”、“绘月”等四块灵壁石最为著名。

辛亥革命后，废除了祭礼社稷的制度。1914 年将社稷坛

改建为公园，开始称“中央公园”。1925年，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曾在中央公园停放灵柩，接受北京各界人民的瞻吊。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国父”，于1928年把这座公园改名为“中山公园”，停放灵柩的拜殿改名为“中山堂”。中山堂解放后一直由北京市政协管理，不对外开放。1954年8月21日，在中山堂召开的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在这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1986年11月12日，在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际，一尊孙中山先生的铜像在中山公园落成、揭幕。这尊身高3.4米的铜像，由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七十八岁的教授曾竹韶牵头设计、北京机电研究院铸造所铸造，坐落在中山公园“保卫和平”牌坊北面的广场。邓小平题写的“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永垂不朽”十七个大字，雕刻在油黑锃亮的花岗岩基座正面。参加揭幕仪式的孙中山先生亲属都称赞这尊铜像“很好，太像了”。

1996年11月8日，北京市政协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30周年的前4天，决定正式对外开放中山堂，同时举办纪念展览。纪念展真实记录了当年天荒地恸悼念国父的感人情景。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山公园曾多次进行修葺，后又增添了许多大型游艺、文化设施，使古老的园林面貌焕然一新，同时园内还定期举行各类文艺及体育表演和比赛，丰富首都人民的业余文化生活。中山公园的牡丹、芍药，在京城亦众所周知，经久不衰。现更添兰花等名贵品种，每年举行的各类花卉展览成为中山公园的特色之一。中山公园游园、

观景、赏花已经成为许多首都百姓假日休闲的好去处。

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勤劳留给后人的文明遗产。新中国成立后，这一皇家圣地回到了人民手中，成为劳动人民工作之余休闲、游览的场所。

古城楼笑迎游人

这是个格外晴朗的日子，天刚蒙蒙亮，值勤人员就发现有人跨过金水桥，径直朝城门走来。迎上去一问，得到的回答是反问：“今天天安门正式开放，你不知道？”

值勤人员没料到这么早就有人来，赶忙指点购票地点。一个、两个……希望尽早登上天安门的平民百姓和外国游人，陆陆续续来到城楼下的购票处。没有玩笑，没有调侃，个个一本正经。仿佛不是来游览，而是准备发表就职演说，准备接受电视采访的……如果不是亲临那种场面，你是无法体会排队时的庄严肃静气氛的。天安门将永远铭刻着这一天——公元1988年1月1日。

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绿神州大地的时候，中南海毛主席故居、人民大会堂相继开放了。天安门城楼能不能开放呢？从高级领导人到一般群众都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这里是进行重大国事活动的场所，不应该对一般游人开放。有的则认为，没有必要把天安门搞的那么神秘，天安门应该成为改革开放的中国的象征……

1984年9月，有一位署名华兴的侨胞给中央书记处写

信，信中说：“30多年了，每次到天安门，仰望城楼，梦想有一天能登上祖国心脏的心脏。我向周围的人说出我的愿望，有人说这是幻想，是白日做梦。我深信，总有一天梦想会成为现实。”其言也切切，意也切切。他在信中还提出天安门的维修经费可组织爱国侨胞捐款赞助等具体意见。

中央有关领导对此作了批示。1986年“五·一”节，城楼组织内部开放，接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英模代表。他们兴高采烈地登上城楼后，许多人想到的不仅仅是这给了自己一种荣誉，而是更深更远。人大代表庄庆汉在留言簿上写道：“天安门城楼的开放，是我国民主化进程的重大标志。”还有的代表问工作人员：“什么时候正式开放呵？……”

1988年，是北京国际旅游年。天安门管理处和北京市的领导人认为，天安门开放的时机业已成熟，他们正式向中央写报告，希望国际旅游年的第一天，天安门城楼正式接待游人。中央书记处于1987年10月正式批准他们的报告。

九点钟一声铃响，天安门东西马道的珠红色大门打开。等候已久的游人第一次体验到“马道通天”的感觉，一步步踏上城楼。北京市旅游局的负责人把第一个登上天安门的纪念奖，分别授予了北京市东四人民市场75岁的退休职工高希武和美国的牙科医生卡特夫妇。他们分别成为天安门城楼对外开放第一天最早在城楼上迎接旭日的中外游人。

从此，天安门城楼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中外游人。目睹了一幕幕令人难以忘怀的情景。

——牧民的服饰，牧民的装束，叫人一看，就知道他们来自大草原。“太壮观了！”他们的汉语发音不准，也没有更

华丽的词汇。眼睛不够用了，内心深处的感情无法表达了。自我解嘲地说：“唱一曲吧！唱一曲！”于是，发自内心的声音，在城楼上空萦绕：“从草原来到天安门……”唱着唱着，忍不住跳了起来，还不住地向工作人员表示歉意。其中的一位，站在大厅门口，挥起手臂，说：“毛主席接见我们时，就是这个样子……”

——这位须发皆白的老者，穿一身不甚人时的工装，由孙女陪着，缓缓走来。边走边对孙女讲：“这叫马道。懂吗，马道。早年间是砖的，后来换成条石……”走上城楼，他从东向西，看得好仔细，滴水、栏杆都要看。工作人员同他攀谈，才知他是重修天安门时的工人。“我一定得上来看看。那时候，咱是修城楼，今儿个，咱是登城楼的。你们年轻人，不知道这城楼的高贵，过去，咱这样的泥瓦匠能上来？花几千块、几万块也上不来。还是如今的政策好，咱跟领导人一样，能上天安门。”

老人的这种心愿，很好理解。他还有另一桩心思呢！“我也担心，这么多人上天安门，会不会毁坏？上面保护的怎么样？所以，我一定得来看看。”老人说着，走进大殿。每个旮旯里都看，能用手摸的地方，都要摸摸。边走边介绍，柱子有多粗，灯笼有多大……当他用了近半天的时间，把浸透着他的汗水的城楼看遍之后，才放心地走下马道。

——这一位显然是个老军人，尽管他没有军衔没着戎装，从他那军人姿态和步伐，谁都会说他像军人。上前一问，果然是个“三八”式。“在延安那阵子，我们离毛主席的住处很近，经常见到他，挺亲切。全国解放后，他老人家在这上面

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回我也站到城楼上来，觉得他离我们近了，你们说是不是？”

站在这位老军人旁边的，是个中年妇女。看面相也就是40岁上下，可白发却过早地爬上了她的额头。她站在毛泽东朝群众挥手的地方，久久伫立着。望着长安街上川流不息的车队，望着大会堂上猎猎的红旗，望着广场上照相留影的人群。望着望着，她的眼圈里合满了泪水。工作人员上前探问，她才躲开，泪水却再也止不住，流了满脸。工作人员以为她有什么事，来安慰她，她更是忍不住哭出声来。“同志，你怎么了？”

“没什么，没什么。”她掏出手绢擦擦泪，她周围的人纷纷猜测：这里一定勾起了她的某种回忆，这里说不定叫她想起了逝去的亲人，这里可能令她想起了“文革”，她的年龄正是那一代人……“同志，您怎么了，要不要去休息一下”工作人员再次来问，她依然回答：“没什么，没什么。”仍旧伫立在那里，许久，许久。她满足了自己的某种心愿，却给别人留下个谜……

尽管天安门从此不再是“禁地”，但绝大多数人对这块心目中的“圣地”了解的并不多。从广场上看天安门，只知道城楼的主体建筑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是巍峨的大殿，下层是巨大的城台，整个城台外观呈立体的等腰梯形。有人做过测量，城台从地面到台顶高12.3米，上层长116米，宽38.76米，面积为4500平方米；下层长120米，宽40米，底面积4800平方米。

据有关资料记载，明清在营造和重建天安门时，实心城

台上部外表用大城砖垒砌，磨砖对缝，并用白灰膏、江米（糯米）汁灌浆而成，坚固细致。大城砖都是山东临清所产的澄浆砖，每块长 48 厘米、宽 24 厘米、厚 12 厘米、重 24 公斤，大多由朝廷指派专人，到山东临清等地督办烧制后，再经北运河、通县张家湾转运到北京。城墙中心以夯土填实。

城台顶部外侧筑雉堞，又称垛口。内侧上部边沿四周是 1.2 米高的淡青色宇墙，又称女儿墙，墙下每隔 20 米左右，留一个返沟道嘴，以渲泄雨水。

天安门城台下部，有 5 个券形门洞。门洞长均为 40 米，但高宽不一。中间的门洞最大，高 8.82 米，宽 5.25 米，其正中恰好压在皇城的中轴线上。明清时期，只有“真龙天子”的皇帝才能出入这一中央门洞。

其余四个门洞依次往外缩小。对称于中央门洞两侧，紧靠中间门洞的两个门洞各宽 4.43 米，供宗室王公和三品以上的文武官员出入。最外的两个门洞各宽 3.83 米，供四品以下官员出入。如果有人错走了城门，就是冒犯了“皇权至尊”的礼仪，定会招来杀身之祸。

天安门城台的 5 个门洞中，各有两扇朱漆大门，门上布有“纵横各九”的鎏金铜钉。

在城门上使用门钉，开始于隋唐时期，当时是出于构造的需要。工匠在木板和穿带部位，钉上铁钉以防止门板松散。但由于快钉钉帽露在表面有碍美观，工匠们便将钉帽打造成泡头形状，使它兼有装饰功能。

门钉的数量和材料，明代以前没有明文规定。到了清代，开始有了讲究。《大清会典》上记载：“宫殿门庑皆崇基，上

复黄琉璃，门设金钉。”“坛庙圜丘外内垣门四，皆朱扉金钉，纵横各九”。九是阳数之极，“九重”为帝王之居，只有皇帝的皇宫及城门正门才能享有“纵横各九”的规格，以下按品级门钉数量呈单数递减。一般亲王府邸的大门上门钉纵九横七；世子府邸门钉纵七横五；公爵门钉纵横各七，侯爵以下至男爵纵横各五，不过，他们各自的大门上只能为铁制门钉，不能采用铜制门钉。

在巨大的天安门朱红城台上层正中，座落着巍峨壮观、金碧辉煌的大殿。

大殿坐北朝南，上覆金黄琉璃瓦。四角屋檐缓缓上翘；底层四面环廊，基座长 61.6 米，宽 32.5 米，面积 1920 平方米；基座底部至正脊顶部琉璃兽头 22.6 米，四周是雕刻有荷花宝瓶图案的汉白玉栏板，栏杆望柱上雕成莲花瓣瓜头花饰；殿内红漆木柱，宫灯高悬，和玺彩绘，雕梁画栋。驻足此间，令人赏心悦目。

《易经》上说：“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言九五阳气盛至于天，故飞龙在天……犹若圣人有龙德，飞腾而居天位”。古人认为，九是阳数之最，五为阴数之尊，九五相合象征帝王之位。天安门主体建筑充分体现了皇权至上的思想。大殿“门五阙、重楼九楹、形扉三十六”。东西面阔九间，南北进深五间。

天安门大殿的地面，是由见方 2 尺细料的方砖铺墁而成。由于这种砖烧制自江南苏州等地，通过运河和通惠河运至北京供皇城专用，所以开始被称为“京砖”。后因这种砖敲击有声，声如金钟，又被称为“金砖”。

“金砖”之称，还有一说法。它是出自工匠之口，因此砖从取土、烧制、运输、加工直至铺墁，每块价在当时约折合一两黄金，故称“金砖”。

制作“金砖”之泥十分讲究，以“粘而不散，粉而不砂”为上。制造工艺较为复杂，并全部为手工操作，需经取土、炼泥、装模、阴干、焙烧、洄窑等十几道工序。在封建社会，平民百姓屋舍别说用“金砖”，就是能看上一眼也是很难的。真可谓：“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重檐的天安门城楼大殿顶上，覆盖着上千块金黄色的琉璃瓦。这些古朴的琉璃构件，在阳光的照射下，流光溢彩，散射出耀眼的光辉，使这座建筑愈显得美丽华贵，气势非凡。

琉璃制品的生产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名称最早见于《汉书》，本作“流离”，意思是说它“光泽如流光陆离，耀眼生辉”。元世祖忽必烈在大都城建造皇宫时，将城外门头沟民间办的琉璃窑辟为官窑。明成祖朱棣在北京建立新都时，皇室宫殿、苑林庙宇，大量使用琉璃构件，鉴于门头沟琉璃厂离宫城太远，供应不便，于是又在北京城南门外的海王村（今和平门外琉璃厂一带），另设一座烧琉璃瓦的窑厂，名为内厂，比门头沟外厂的规模更大。琉璃厂的琉璃窑成了明朝工部五大窑厂的首户。明朝诗人吴梅村有诗为赞：

琉璃旧厂虎坊西，
月斧修成五色泥。
偏插御花安凤吻，
绛绳扶上广寒梯。

诗中不仅赞美了当时琉璃制品技艺精湛和安装水平的高超，也点明了该厂位置。清朝人潘荣陛在他所著的《帝京岁时记胜》中也有这样的记载：

琉璃厂在正阳门外之西。厂制：东三门，西一门，街长里许，中有石桥。桥西为公廨，东北楼门上有瞻云阁，即窑厂之正门也。这段记载证明，在清朝初期，和平门外的琉璃厂仍旧是个窑厂区。那么，古老的琉璃窑厂后来怎样失踪的呢？

据说，清朝乾隆皇帝一日早朝，忽然看到西南方一股黑烟直冲斗牛，忙问是怎么回事？回报说是琉璃厂在烧窑。乾隆认为黑烟冒犯了他的圣威，弄脏了城市，旨令琉璃厂西迁60里。于是，琉璃厂的窑厂被迁移到60华里的永定河畔九龙山下去了，琉璃厂从此空有虚名。

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清高宗网罗天下文士编辑四库全书，开设“四库馆”，学者文士寓居琉璃厂附近，琉璃厂便以文化街的形式繁荣了起来。清代学者翁方纲曾在《复初斋诗集》自注中写道：

乾隆癸巳，开四库馆。……每日清晨，诸臣入院……午后归寓，各以所校阅某书应考某典，详列书目，至琉璃厂书肆访之。

由此可见，文人学士们修订《四库全书》，每每到这里来搜集或查阅有关文献和古籍，那时的琉璃厂实际上成了全国

最大的书市。

琉璃的色彩有黄、绿、青、蓝、黑、白、翡翠等十几种。从“梵王宫殿月轮高，碧琉璃瑞烟笼罩”这句《西厢记》曲词中，不难看出元朝的宫殿大量使用的是绿色琉璃。

到了明清，不同色彩的琉璃，有不同的用处：黄色用于皇宫和重要的庙宇；绿色用于宫廷内的一般殿座、城门庙宇和王公府第；黑色用于庙宇和王公府第；蓝色用于与隆重祭祀有关的建筑。

重檐歇山式大安门楼大殿屋顶，有正脊一条，垂脊8条。正脊两端，有一对被古人称为“龙吻”的琉璃制品；8条垂脊上，各有“龙吻”一个，故有“九脊封十龙”的说法。

“龙吻”最早称为“鸱尾”，后改“尾”字为“吻”字，成了“鸱吻”。到了明代，“鸱吻”被改成了“龙吻”。据《唐会要》记载：“汉柏梁殿灾后，越巫言海中有鱼，此厚似鸱，激浪即降雨，遂作其像于屋上，以压火祥”。可见人们当时把这个“龙吻”装饰在屋顶上，作用是“避火”。

天安门正脊上的“龙吻”系清代琉璃制品，高3米多，宽2米多，重约4吨，由13块琉璃构件组成，俗称“十三拼”，又因在正脊上，又称之为“大吻”或“正吻”。

“十三拼”龙纹鳞甲，四爪腾空，龙首怒目，张口吞住正脊。在起到装饰效果外，由于它衔接了殿顶正脊与垂脊之间的重要关节，从而起到了使殿顶更加封闭、牢固、防止雨水渗入之作用。

“十三拼”的脊上，还插有一柄宝剑，并露出伞形剑靶。

据说，这是怕“龙吻”擅离职守逃回大海，因而把它死死地锁在屋脊上，使其不能腾飞。

8条垂脊的“龙吻”，亦称“垂脊吻”，其体形略小，呈前趋势，起封护两坡尾陇和装饰垂脊的双重作用。

天安门城楼8条垂脊上，还有8个“骑鸡仙人”和72个走兽。仙人在每条垂脊最前面领路，骑着似凤非凤、似鸡非鸡坐骑。仙人之后依次是龙、凤、狮子、天马、海马、狻猊（音酸尼）、押鱼、獬豸（音谢至）、斗牛9个形态各异的走兽，个个昂首摆尾，欲上九天。

9个走兽各有含义，体现着皇家殿宇的威严和吉祥富贵，寄托着镇灾除恶、逢凶化吉意愿。如以“万物之首”的龙和“百鸟之王”的凤，来象征吉祥富贵；用“兽中之王”狮子和“能食虎豹”狻猊，体现皇帝威武可率百兽；用象征尊贵的天马、海马，寓意皇家的威德可通天人海；用传说能“兴风作浪”的“防火、灭火能手”押鱼，以避火患；以性情忠直，善于分辨曲直的獬豸，表示主持公道；以身披鳞甲的斗牛，来消灾灭祸。

仙人走兽不单纯是檐脊上的装饰物，还是檐脊上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起密封、防漏、加固的作用。骑鸡仙人”的作用是固定垂脊下端的第一块瓦件，其它走兽的功能是遮住两坡瓦陇交汇点上的三连砖上口，保证雨水不从三连砖处渗入。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不同的殿宇，走兽数目、尺寸、颜色也不同。如天安门、端门、乾清宫等，除仙人外设9个走兽，取古建形制奇数最高者。太和殿却破例，在9个走兽

后边又加上一个名为“行什”的走兽，达到十个，为宫殿走兽中最多的一例，充分体现其不同凡响。一般皇帝居住和处理政务的地方为 9 个走兽，皇后寝宫为 7 个，东西六宫居所 5 个，其他嫔妃有的 3 个，有的甚至只有 1 个。走兽的减少方法是由后向前，而且要成奇数。

现在的天安门城楼大殿，在梁柱之间悬挂着门盏大型玻璃宫灯。大厅正中最大的那盏称为主灯，有 8 个面，全高 6 米，直径 2.8 米，重约 450 公斤；其余 16 盏为 6 个面的辅灯，每个辅灯高 6 米，直径 2.2 米，重约 350 公斤。每盏灯的上角各有一盏伞形小灯。这些古雅的大型宫灯，是 35 国庆前夕，由北京灯具厂采用传统工艺作法重新制作了。它们与古老的建筑浑然一体，格外醒目。

宫灯属北京传统工艺品，古时指六方宫灯。从这个意义上说，节日里悬挂在天安门城楼前廊的红灯，从应称为大红灯笼。目前所见到最早的宫灯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代制品。

天安门城楼大殿内的旧宫灯，在 1952 年修缮天安门城楼时被更换了。当时应老舍先生的邀请，于非暗、徐燕荪、秦仲文、王雪涛、溥雪斋、胡佩衡等著名国画家，前来为宫灯四面配画。他们奇妙的构思和精湛的技艺，为天安门增添了光彩。“文革”期间，“葵花向阳”等图案，替代了国画作品。

古时称校场或城墙上跑马的路为马道。在天安门城楼东西两侧，各有一条长 30 米、宽 6.5 米的梯形马道。明清时代，每当在天安门举行“金凤颁诏”仪式时，宜诏官员要从这里上下城楼。毛泽东等开国元勋出席开国大典时，也是由城楼西侧马道一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当时的马道，是由

古青砖铺成的百级梯道。1970年修缮天安门时，马道上早已破损的古青砖被换成了石条。原来的百级阶梯被分为4层台阶，每层17级，共68级，中间有3个平台。与此同时，马道两边宫灯形状路灯，也被改换成了壁灯，每个马道7组，每组2个华灯。

邓小平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

1989年春夏之交，一场动乱在北京以致全国爆发。对于这次政治风波，我国著名的历史专家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作了如下描述：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病逝，成为触发动乱的直接导火线。在首都的一些高等院校，由于极少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分子长期策划和背后操纵，散布胡耀邦是受政治迫害而致死的蛊惑人心的谎言，悼念活动很快发展成为政治性的示威游行。一时间谣言四起，出现了大量的大小字报和标语口号，攻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短短几天内，连续发生了聚众冲击中南海新华门的严重事件，出现了占领天安门广场的非法行动和更大规模的非法游行示威。在西安、长沙、成都和其他一些地方，发生了严重的打、砸、抢、烧等犯罪活动。在此期间，动乱制造者们通过学潮提出了一系列带纲领性的政治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重新评价胡耀邦的功过，彻底否定1987年初

中央对胡耀邦辞职的处理；二是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在反自由化中受过批评和处分的人平反。这表明动乱一开始就表现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对于这种严重情况，党的总书记赵紫阳显示了和胡耀邦同样的倾向，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但不反对和抵制，实际上是采取纵容和支持的态度。

4月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李鹏主持下召开会议（赵紫阳于前一天赴朝鲜访问），对事态的发展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已经摆在面前，决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由《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指出这场斗争的性质。4月25日，邓小平发表重要谈话，对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定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对动乱的性质作了深刻分析，指出这不是一般的学潮，而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指出极少数人“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搞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社论使绝大多数干部明确了动乱的性质，也使许多学生开始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5月4日以后，80%的罢课学生复课，全国各地的局势迅速趋向平稳。

这时，回国才几天的赵紫阳突然改变对邓小平谈话表示

赞成的态度，指责根据政治局常委决定和邓小平谈话精神写的《人民日报》社论定性错误，提出要加以纠正。赵紫阳的错误主张，受到了常委其他同志的抵制和反对。5月4日，他在事先没有征求常委任何同志意见的情况下，在会见参加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会议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时，发表了一篇同中央的立场和方针完全不同的谈话。在已经出现动乱的情况下，他却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在大量事实已经证明这场动乱的实质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他却说“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在已有种种事实说明极少数人在利用学潮搞动乱的情况下，他还只是说“难免”“有人企图利用”，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央关于极少数人已经在制造动乱的正确判断，并且把中央的内部分歧公开暴露于世。动乱策划者从中受到鼓舞，更加猖狂地进行种种活动，使本来已经趋向平缓的局势骤然逆转。

5月6日，赵紫阳又同中央主管宣传、思想工作的负责人谈话。他说：“放开了一点，游行作了报道，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这番谈话使舆论上迅速出现了支持学潮和动乱的错误导向。首都乃至全国各地的游行示威活动，规模越来越大，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多。动乱的策划者玩弄两面手法，一面表示愿意同政府“对话”，一面组织绝食活动，并于5月13日开始，煽动和扶持部分学生到天安门广场绝食，把他们当作“人质”，作为实现其政治阴谋的“赌注”。由于学生绝食引起社会上部分人从各种不同角度出发的同情，加上舆论的错误导向，前往“声援”的人越来越多，从几万、

十几万发展到几十万之众。举世瞩目的中苏高级会晤也因此而受到严重干扰，一些国事活动日程被迫变更，有的被迫取消。与此同时，全国各大城市乃至所有省会城市游行人数急剧增加，一批中小城市也出现了游行，这是前所未有的。

在十分险恶的形势下，中央政治局常委于5月16日晚召开紧急会议。常委中的多数认为，面对险恶的形势，绝对不能退让，只能更加坚决地反对动乱，制止动乱。赵紫阳不听常委多数同志的意见，仍然坚持退让。第二天，游行示威的人数和对邓小平的攻击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同时，为赵紫阳鼓吹的标语口号充斥于游行队伍和天安门广场。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在北京市警力严重不足、已无法维持正常的生产、工作、交通和生活秩序的情况下，中央政治局常委于5月17日开会决定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并于5月19日晚召开首都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号召紧急行动起来，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迅速结束动乱。赵紫阳反对中央的决定，并且拒绝出席大会，从而表明了他同党的公开分裂。根据国务院令：自5月20日10时起，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

动乱的策划者则继续占据天安门广场，蓄意挑起事端，竭力使动乱加剧，终于使动乱在北京地区发展成为一场反革命暴乱。

在整个学潮和学生绝食过程中，党和政府采取了极其克制的态度，在各方面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6月3日，当部分戒严部队按计划进入首都戒严地区的过程中，非法组织的头头策动在一些路口设置路障，阻

截军车，并且发生了焚烧军车和杀害解放军官兵的严重事件。他们还策划利用第二天是星期天的时机，煽动更多的人上街，造成一个暴动的态势，企图一举推翻政府，夺取政权。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不得不下定决心，于6月3日晚命令驻守在首都周围的戒严部队强行开进，平息反革命暴乱。部队在开进过程中由于遭受大群暴徒的野蛮袭击，不得不实行必要的武装自卫。6月4日晨，停留在天安门广场的数千名学生被戒严部队以极大的耐心和毅力劝告和勒令和平撤离，天安门广场清场任务全部完成。以天安门广场重新回到人民手中和戒严部队全部到位为标志，反革命暴乱被一举粉碎，北京的局势很快平稳下来，其他大中城市也很快恢复了正常秩序。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具有深刻的社会和历史背景。正如邓小平所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从国际环境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度过战后危机重新获得发展，特别是新的科学技术革命使生产得到迅速的发展，科技新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也大为加快，这使一些人感到意外而产生困惑，他们看不到资本主义制度仍然存在种种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与此同时，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决策上发生了不少严重失误，致使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进程中遇到许多困难，以至社会主义制度本来具有的优越性未能始终一贯地发挥出来。这就不能不影响到

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所以“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思潮相当严重地泛滥开来。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有计划地通过种种渠道对社会主义国家加紧进行思想、政治渗透，竭力支持和扶植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动摇和夺取社会主义已经取得的阵地。这种“大气候”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知识界、青年学生乃至党内的一些人所产生的严重影响，是决不可以低估的。

从国内环境来看，在粉碎“四人帮”后就出现了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盲目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1979年初，在这股思潮刚刚冒头的时候，邓小平就旗帜鲜明地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以后，他又严肃地提出了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任务。但是，多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赵紫阳接替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逆流不但没有受到遏制，相反地愈益发展，以致泛滥成灾。一批长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并从事政治阴谋活动的人，便成了动乱和暴乱的主要策划者和组织者。

平息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胜利，巩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阵地和1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也给党和人民提供了一个深刻的经验教训。

天安门迎来第三代领导人

1989年10月1日，共和国在风风雨雨中，迎来了不惑

之年。世人瞩目的天安门广场，7组大花坛，40多万株五色草和8万多盆鲜花组成各种美丽的图案。

工、农、兵和知识分子塑像两侧，呈正六角形的高达7米的大花篮，满篮鲜花秋果。

用金菊和红花组成的11朵大葵花，围绕着光芒四射的红太阳。另有鲜花组成的巨幅五星红旗，两侧用黄菊组成“1949—1989”的字样。

在正中坡形花坛的两旁，人们可以看到用鲜花组成的“实现四化”“振兴中华”八个夺目大字，这概括了全国人民的心声。当夜幕降临，首都人民挟着炼钢炉前的钢花，带着田野的芬芳，披着战斗的风尘，聚集到天安门广场，礼炮。向起的时候，礼花也腾空而起。

广场上空，出现了“庆祝建国四十周年”几个火红的大字，刹那间，16支探照灯升起的大光柱在430米的高空汇成一点，然后在夜色中交相辉映。

这时，城楼上下，万头攒动。

轰隆隆，轰隆隆，随着阵阵礼炮响，无数礼花升向天空。啪啪僻僻，璀璨的礼花弹飞向天空，竞相散放，然后呈伞状向大地弥漫开来。

一时间，天空五颜六色，如同降下万朵彩霞，七色的花朵。人们不禁想到这两句诗来：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

国庆40周年夜晚的焰火晚会，盛况空前。以天安门为中心，400门礼花炮分布在9个施放点，发射数万发礼花炮弹。仅天安门广场就有26门大炮，礼花品种多达160多个，比

国庆 35 周年时多了 100 多种。

在腾空而起的簇簇礼花中，“庆祝建国四十周年”8 个火红的大字，镶嵌在瑰丽的画图中。

在共和国 40 周年庆祝联欢晚会上，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第一次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天安门两侧观礼台上，有近两万名观礼代表，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他们中有几十年如一日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做出杰出贡献的劳动模范；有为国家的安宁和经济的发展建立丰功伟绩的人民解放军英雄；有为新中国的诞生历尽战争风霜的开国功臣；有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做出重要贡献的优秀企业家；有清正廉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秀干部；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有少数民族参观团和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侨，以及外国朋友。

专程来庆贺我国 40 周年华诞的 100 名台湾同胞沉浸在广场的欢乐海洋里。

从美国芝加哥赶来参加建国 40 年周年大庆的老华侨陈济明望着满天的焰火和广场上欢乐的人群，感叹地说：

“这么美丽的场面，在世界任何地方都看不到。中国有句古话：四十而不惑。”

这位老华侨相信祖国今后一定会更成熟、更稳定、更快地发展。

在天安门城楼上，邓小平会见了外国宾客。

在会见民主柬埔寨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及其夫人时，邓小平说：“我们支持你们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是真独立，不是假独立。”

当西哈努克对中国的支持表示感谢时，邓小平说：“中国人民和柬埔寨人民几十年如一日相互支持。你们不会忘记我们、我们不会忘记你们。”

在会见朝鲜国家副主席李钟玉时，邓小平说：

“过去一段时间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把思想阵地都让出去了。现在我们一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他又说：“不久前在北京发生的事情是一件坏事，但归根到底对我们有利，因为它使我们更清醒了。”邓小平请李钟玉转告金日成：“请您回去转告金日成主席，中国的社会秩序早已恢复了正常，请金主席放心。”

在平息北京地区发生的政治风波的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条件下，中共中央于1989年6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全会之前，中央政治局举行了扩大会议，为全会的召开作了必要的准备。

四中全会的主题是讨论赵紫阳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的严重错误，并作出相应的组织处理。

全会审议并通过了李鹏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会议认为，赵紫阳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错误的性质和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他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期间，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工作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在指导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也有明显失误。特别是在他主持党中央工作以来，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严重忽视党的建

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据此，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职务。在随后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上，赵紫阳又被撤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

四中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进行了必要的调整：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常委会由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 6 人组成，决定增补李瑞环、丁关根为书记处书记，免去胡启立等 3 人在政治局和书记处担任的职务。

全会召开之前，邓小平即指出，经历了春夏之交的这场政治风波之后，我们要“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以便“使我们的失误纠正得更快，使我们的长处发扬得更好”。全会本着这个精神，初步总结了教训，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方针和任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还要不要继续坚持？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还要不要继续坚持？这是动乱过后，全党、全国人民在冷静思考的问题，也是全世界密切关注的问题。对此，十三届四中全会旗帜鲜明地作出答复：“要继续坚决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继续坚决执行党的十三大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必须毫不动摇、始终一贯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必须坚定不移、一如既往地贯彻执行，绝不回到闭关锁国的

老路上去。”

针对一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鼓吹“全盘西化”即鼓吹资本主义化的严峻现实，汲取以往赵紫阳所犯的把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原则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错误的教训，江泽民在全会上强调指出：“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我们坚持贯彻执行改革开放，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改革开放。作为鲜明的对照，那些顽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所主张的，却是以实现西方资本主义为目的，放弃人民民主专政，取消共产党的领导，背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改革开放’。他们的‘改革开放’，中心就是资本主义化。这当然是党和人民绝对不能允许的。”这个讲话，划清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改革开放”观的原则界限，对于帮助广大党员和干部全面理解、自觉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保证我国的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发展，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全会对当前形势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要求全党特别注意抓好以下4件大事：一是彻底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一步稳定全国局势；二是继续搞好治理整顿，更好地坚持改革开放，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三是认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努力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教育，切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四是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大力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坚决惩治腐败，切实做好几件人民普遍关心的事情，决不辜负人民对党的期望。

四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平息 1989 年春夏之交政治风波这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会以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坚决地、全面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一手抓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一手抓思想政治工作、党的建设，认真克服“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全国政治局面迅速趋向稳定，经济形势逐步好转，思想战线出现新的转机。

两代领导集体顺利交接

在天安门广场的西侧，矗立着一座造型壮观、气势磅礴的巍峨大厦，它中部略高，两翼稍低，平面呈“山”字型，突出的两端似伸展的双臂拥抱着天安门广场，这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及其常设机构所在地——人民大会堂。

人民大会堂于 1958 年 11 月破土动工，1959 年 9 月竣工，仅用了 10 个月的时间，这是我国建筑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无论是人民代表，还是参观游客，当你置身于这座宏伟的建筑中间，可曾想到，这里昔日竟是操掌人民生死权的封建衙署——五军都督府的旧址。

1959 年 9 月 9 日凌晨 2 时半，毛泽东主席来到即将竣工的人民大会堂视察时，意味深长地说：“大会堂是人民建造的，还是叫人民大会堂好！”

人民大会堂占地 15 公顷，总建筑面积 17.18 万平方米，南北长 336 米，东西宽 206 米，中央最高部位距地面 46.5

米，可容得下整座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周围有 134 根石质廊柱。东门和北门的柱子用天然大理石镶砌，正门廊柱高 25 米，直径 2 米，屋檐是黄绿相间的琉璃瓦，金光闪闪的国徽高悬于正门上方。从金色的铜门跨入大会堂就是这座建筑的枢纽中央大厅，用远古藻类化石磨制而成并呈灰色或红色云层花纹的地面显得庄重典雅。

人民大会堂的中部是这幢建筑的“心脏”——万人大礼堂。大礼堂宽 76 米，纵深 60 米、高 32 米，礼堂分上、中、下三层，可容纳 10000 人。一层的每个座位都设有可同时翻译 12 种语言的译意风和电子表决器，每个座位之间都能安装一个即席发言的话筒，礼堂周围设有高、低频率不同的扩音设备；礼堂顶部中央是用红色有机玻璃制作的巨大五角星灯，周围辐射出 70 道光芒线和 40 个葵花瓣状纵横密布的 500 个满天星灯，三环水波式暗灯槽，环环相套，层层舒展，如众星捧月；墙面与顶棚不以直面相交，而取圆曲缓下之势，成穹隆形，上下皆为蓝色。“水天相连，浑然一体”。这一独特的布局是根据当年周恩来总理提出的设计思想设计的。30 多年前盖这座大厦时，曾在设计主会场的方案中出现了犹豫，当时人们把各种意见拿到周恩来面前时，周恩来阅后说道：“这么大的会场，人会感到压抑，我们不能让人民的代表在这里感到渺小，你们想想，为什么当我们站在海边时，天不觉得高，人不觉得小，就是因为海天一色嘛。”于是，根据他的启迪，人民大会堂才有了今天这样的穹顶式结构。

大会堂的北部是可容纳 5000 人的宴会厅。东西长 102 米，南北宽 76 米，高 15 米，面积 7000 平方米，大小相当于

一个国际标准的足球场。宴会厅顶棚中心是水晶玻璃灯和玻璃钢压花组成的葵花图案，周围是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彩色藻井，宴会厅四周共有 28 根直径 1 米的沥粉贴金廊柱，墙面和墙裙为浅黄色，主席台是宴会上宾主讲话祝酒和表演文艺节目的地方，整座宴会厅宽敞畅亮，富丽堂皇。

人民大会堂的南部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楼。此外还有会议厅、休息厅、办公室 300 多个。其中，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命名的 31 个会议厅（1996 年增加香港厅）各具特色。这些厅的布置反映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特点和我国各民族的独特风格，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召开讨论会的会场。

自落成以来，人民大会堂便成了人民代表聚会的圣地，成为民族团结的象征，人民当家作主的象征，人民共和权力的象征。除此以外，它还是中国共产党聚会的圣地，与共和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1989 年 11 月 9 日，这座党和国家举行政治活动的重要场所，又演绎了感人肺腑的一幕。

下午 3 时，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进行表决，通过了邓小平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请求。

一个小时后，邓小平来到了人民大会堂，和参加本次中央全会的全体与会者一起照相。

在休息厅里，刚刚从五中全会会场内出来的中央各位领导，看到邓小平进来，纷纷走过来和他握手。刚刚当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江泽民一步趋前，紧紧握住邓小平的手。他建议，几位领导同志一起和小平同志照一张相。

当江泽民、杨尚昆、李鹏、姚依林、乔石、宋平、李瑞环、王震、薄一波、万里、宋任穷、胡乔木等12位中央领导人一字排开后，记者们一拥而上，闪光灯噼啪闪烁地拍下了这历史性时刻……邓小平走过中纪委委员的行列，走过中顾委委员的行列，走过全体中央委员的行列……

大厅里，掌声骤起。

邓小平笑容满面地站在麦克风前，他说：“感谢同志们对我的理解和支持，全会接受了我退休的请求。衷心感谢全会，衷心感同志们。”随后，邓小平同出席和列席全会的全体同志合影留念。在离开大会堂的时候，江泽民一直把邓小平送到门口，他紧握住邓小平的手说：“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四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就曾多次表示：等新的领导班子一经建立威信，他就要坚决退出中央领导岗位，他希望大家能够以江泽民为核心，很好地团结。他反复说明，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

十三届五中全会以前，鉴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已经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并逐步赢得了党和人民的信任，邓小平再次正式向中央提出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并表示要带头建立退休制度，结束过去实际上存在的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终身制。据此，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并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委主席。

全会高度评价了邓小平的历史功绩，强调指出：“他根据

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和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全会要求全党“一定要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的著作，使它今后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进程中发挥重大的指导作用”。

经过四中全会、五中全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第一代是自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了顺利的交接，这对于保证党的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这个事实，是党在政治上高度成熟、组织上坚强有力的明证。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江泽民代表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该报告分为4部分：一、14年伟大实践的基本总结；二、90年代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三、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对外政策；四、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江泽民在报告中谈到14年伟大实践的基本总结时指出，14年来我们从事的事业，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其引起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是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这14年是真正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14年，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14年，开创了历史的新局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党赢得了广

大人民群众的拥护。

江泽民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这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他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有人统计，在北京各报有关中共十四大的报道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出现最频繁的语句，在外电的报道中，有关这一方面的报道一样十分突出。

在十四大分组讨论会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了最热门的话题。怎样认识和解决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是困扰经济发展的一个问题。国营大中型企业缺乏活力，关于姓“社”姓“资”的抽象争论，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束缚住了人们的思想。邓小平南方谈话中关于计划与市场的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当中共十四大明确宣布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人们的认识产生了更大的飞跃。代表们说，十四大报告中最有新意，最有突破性，对改革最具决定意义和深远影响的问题，就是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在14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找到了一条加快90年代经济发展的“高速公路”，作出了重大的战略举措。来自多个地区的中共十四大代表，用生动的事实说明，哪个地方的市场作用发挥得愈充分，哪个地方的生产力就愈发展，经济增长速度就愈快。让社会主义坐上“市场”的快车，不仅加速经济发展，也必将促进政治体制的改革，

为下个世纪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国际经济界人士这样预言：21 世纪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是亚洲，而亚洲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将是中国大陆。俄罗斯的一位记者在报道中说：中国将成为在亚洲出现的“第五条龙”。人们有理由相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一定会更充分地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水平。正是由于中共十四大提出了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也就引来全世界的强烈反响。日本《读卖新闻》发表社论说，在江泽民总书记的报告中提出市场经济，是中国重视市场经济的一个历史性转折，是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设计出的一条唯一能使中国社会主义生存的新路线。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说，中共十四大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为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台湾《经济日报》报道：岛内工商界人士对中共十四大的反应是“有如吃下定心丸”，大陆的“改革开放姿态更加明朗。”保加利亚社会党中央机关报《言论报》发表文章说：“今后 5 年内，中国在经济方面将变得更加美好。”

党的十四大以后，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加快步伐，经过 5 年的实践，经济增长速度年平均为 11.6%，年度经济增长的波动幅度只有一两个百分点，成为新中国建立以来经济增长最快、波动幅度最小的时期。

5 年来的改革和发展实践表明，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使人们摆脱了许多思想上和体制上的禁锢，调动了各个方面的积极性，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正在发生巨大的历史性转变。

改革攻坚的新阶段

新的机遇新的挑战

90年代初，国际国内的客观形势为我国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从国际上来说，世界正处于新旧格局的交替过程中，虽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但仍然可以争取一个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东欧、前苏联演变以后，西方大国面临许多棘手的问题，既要应付东欧和独联体的新的危机，又要应付西方内部的新的政治矛盾和经济摩擦。对它们搞和平演变我们固然要保持警惕，但总的来说，国际上对我们的障碍不算多，我们可以灵活利用的回旋余地还是比较大的。世界新科技革命的进程正在加快，许多国家和地区正在进行产业和产品结构的调整。

重组与升级，亚太地区经济发展出现良好势头。这些都为我们扩大对外开放，加快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提供了有利时机。

从国内来说，十多年来建设和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大大增强了我国的经济实力。三年多的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

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新的全面开展，进一步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建设和改革中，也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

但挑战与机遇并存。由于东欧剧变和前苏联解体，我国作为世界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又成为西方国家和平演变乃至遏制的对象。亚洲“四小龙”及其周边国家和地区正在加快经济发展，国际经济贸易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如果我们不加快改革，经济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那么同西方国家甚至同周边国家的差距就会继续拉大，我们就会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就会遇到极大的困难。前苏联和东欧垮台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竞争中打了败仗。

挑战还来自国内。人们对1989年以来国际国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不同总结和看法，特别是对发生1989年政治风波的意见分歧，直接影响了我国改革和发展的政策取向及进程。

前面谈到，邓小平认为：政治风波的发生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没有错，经济的发展战略没有错，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政策没有错，没有改革开放，“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软一硬不相称，配合得不好。总之，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

是对的。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

但当时也有一些同志则从1989年政治风波及其他国际国内一系列事件的总结中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即实际上把政治风波的发生归咎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路线，归咎于改革开放，对党的基本路线发生了动摇。认为现在国内有两项中心任务，一是经济建设，二是阶级斗争即反和平演变，有的甚至提出反和平演变是当前的中心任务。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改革开放引进和发展了资本主义。因此，对改革开放中许多重大问题提出了疑问和诸难。例如：有人担心办经济特区，是搞资本主义，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认为多发展一些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会改变社会主义性质；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集体经济瓦解的根源等等。总之，干什么事，都要问一个姓“社”还是姓“资”，其结果，只能是什么事都不敢干。在这一背景下，理论界出现了对改革具体措施要不要问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

这个问题很早就提出过。《人民日报》1988年5月14日的评论员文章就有这样一个小题：“从凡事都问姓‘杜’还是姓‘资’的思维方式中走出来。”文章说：“遇到重大改革措施，往往要问一个姓‘社’还是姓‘资’……如果我们时时事事都要照这样的方式来思维，在思想上会有无穷的疑虑，实践上就会寸步难行，结果将一事无成。”对这一观点，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争论。

1991年1月至2月，邓小平在上海视察过程中，发表了

一系列谈话。根据邓小平的谈话精神，上海《解放日报》于三四月以皇甫平名义发表了《改革开放要有新的思路》等三篇评论文章，提出改革要深化、开放要扩大，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认为：“如果我们仍然困于‘姓社还是姓资’的法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皇甫平的文章在舆论界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些有影响的报刊发表一系列文章进行批评。认为现在的问题不是思想解放的问题，而是到底改革是改到资本主义那里去，还是改到社会主义那里去的问题。批评文章法问说：“为什么不能问姓资姓社？”“你不问姓资姓社，且问你贵姓什么？”批评延续了半年多时间，直到1991年9月1日江泽民对第二天《人民日报》社论直接干预，指示一定要删去批判“不问姓资姓社”的段落，才停止了公开的批评。但内部的争论仍在进行。

我们党从改革开始，就一贯强调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问题的实质在于，我们站在什么角度，用什么样的标准，去衡量姓“社”姓“资”。如果我们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科学社会主义新认识，用邓小平从科学社会主义要求出发得出的生产力标准来衡量改革开放，就不存在对我国改革开放性质发生怀疑的问题。如果我们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认识来看待改革开放，必然得出改革开放姓“资”，搞不得、不能搞的结论。可见，这样一种认识和总结，是我们过去对社会主义认识“‘不完全清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反映。归根到底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

会主义”问题。这种思潮的重新抬头，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形成巨大威胁，为改革开放设置了障碍，也实际上为刚形成不久的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放手工作设置了障碍。弄得不好，就可能重新回到过去的老路子上去。这一严峻的挑战，党必须正视和作正确的回应，才能抓住历史赋予的难得机遇，把握正确的航向，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前进。另外，经济发展的速度也一直是“困扰”和“束缚”我们党思想的一个严重问题。那种片面追求速度。产值、指标和片面扩大基本建设规模的做法，曾给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损害。1958年“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成为酿成三年困难的主要原因。1978年前后，又出现了盲目引进外资的“洋冒进”。1984年到1988年，我国的经济高速发展，财富有了巨额的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台阶，但这期间也确实存在经济“过热”的问题。通货膨胀以及相伴而生的“官倒”腐败现象，成为发生1989年政治风波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问题的周期性发生，使一些人把严重社会问题的出现与经济发展的速度联系起来。一提加快发展，这些人就心有余悸，害怕再次发生类似的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经济的发展必须同我们的国力相适应，不能揠苗助长。但是也不能因此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因为在发展速度上曾出现问题就不敢再提发展速度，甚至主张低速度。在党内，确实存在着邓小平所讲的怕出问题而把“稳”“强调得过分”的思想倾向，存在着“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的状况。这种思想状况，显然与国际国内的形势不相适

应，搞得不好，就可能错过历史的机遇，在新的挑战面前败下阵来。

“市场”的困扰

市场经济姓“社”还是姓“资”，是姓“资”姓“社”争论的主要问题，多年来也一直困扰着我们党。

我国的改革是以市场为取向的，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逐步引入市场经济机制，最终用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使市场成为国家资源配置的基础。改革初期，如前所说，党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其基本精神就是在不根本触动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引进市场机制，陈云形象地把二者关系比喻为“笼子与‘鸟’”的关系。从1979年到1984年，这一认识在全党占据主导地位。1984年以后，党放弃了“为主”“为辅”的提法。继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后，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1989年后，党又提出了“必须建立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在国家法律法规和计划的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既要克服那种过分集中、管得过多过死的弊端，又不能过于分散和削弱宏观调控”。

这些提法的变化，体现了在改革实践中党对计划与市场关系认识的深化，认识到应该提高市场的作用和地位，不能仅仅限于“为辅”的补充位置。但是由于实践的局限和人们认识上的不统一，这些提法又在实际上回避了一个实质性的问题：我国改革要建立的经济体制到底以什么为主、为基础？虽然提高了市场调节、商品经济的地位，但也没有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要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人们虽然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改革逐步向市场方向推进，但在实际生活中，占主体的认识仍是计划经济那一套，强调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搞的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其他。

这一认识的局限和不足，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在于人们仍然囿于过去的传统观念，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做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而市场经济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因此，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问题不解决，我们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的突破，改革就只能在计划经济的框框里打圈， “鸟”就很难冲破“笼子”的束缚，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改革的方向问题。

早在1979年11月26日，改革刚刚发动不久，如前所述，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客人的谈话中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在这段谈话中还说：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是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当然方法上基

本和资本主义相似，但也有不同。学习资本主义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次谈话，当时没有公开发表。党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远远没有统一。

1981年至1983年间，我国理论界出现了第一次对商品经济及市场经济是姓“资”姓“社”的争论，当时主张姓“资”的意见占了上风。1982年8月，胡乔木批发了致5位理论界领导同志的一封信。这封信说：“在我国，尽管还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是决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为商品经济。如果做这样的概括……就势必模糊有计划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界限，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

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之后，围绕前段时间经济上出现的问题，对改革的市场取向出现了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问题的出现来源于“市场取向”，“向市场经济转化”的改革，“削弱了计划经济”。因此主张，现在必须走回头路，回到计划经济的老体制中去。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问题的出现来源于改革偏离了市场方向，或进行得过于迟缓。现在要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非进行彻底的改革。

与此同时，理论界再次对市场经济姓“资”姓“社”问题展开争论。一些同志运用和1981—1983年批判“商品经济”时大体相同的论据和语言，批评改革市场取向的主张。有些文章甚至把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之争提到“两条道路”的高度，说有人主张改革应当以市场为取向，说明“在改革问题上的两种主张、两个方向即两条道路的斗争，仍以不同的形式、方向在继续”。

这一争论，虽然言辞上比较激烈，但仍没有超出正常的讨论范围，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总是在相互的思想碰撞中接近和达到真理性的认识。

实践是最好的裁判，理论上争论不休的问题，却在实践中得出了确定不移的判断。十多年改革的实践证明，凡是市场取向改革比较明显，主要靠市场调节的地区和产业，经济发展就比较快，经济的前景也比较乐观；凡是市场取向改革不明显，仍然主要靠政府计划直接调节的地区和产业，经济发展就比较慢，经济活力就比较小。我国农村改革的成功，乡镇企业的发展，以及沿海特区的繁荣，主要得益于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和体制。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最终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代原来的计划体制，把市场作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我国的经济才能实现整体腾飞。

认识和实践的发展，要求我们党尽快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争论，正式承认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改革的目标，加快市场取向的改革。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与薄一波、姚依林等同志的谈话中，提出了解决这一课题的历史性任务，他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这次谈话预示着，又一次新的思想解放就要来临。

平地春雷：邓小平南方重要谈话发表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邓小平，仍然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关注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多次重要谈话。在这些谈话中，邓小平精辟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以来一直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处在关键时期的关键谈话，犹如平地春雷，震撼着冬眠的神州大地，预报着改革春天的再次降临。邓小平南方重要谈话内容非常丰富，其中涉及到加快改革开放与发展，主要有以下内容。

一、抓住时机，加快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

如前所述，90年代初以来，我国经济又面临着加速发展的极好机遇。邓小平以一个战略家的敏锐目光看到了这一中国发展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同时又非常担心这一历史机遇会因我们主观的原因而丧失。1989年6月16日，他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把“经济不能滑坡”作为第一件事加以强调，指出：“凡是能够积极争取的发展速度还是要积极争取。1990年3月3日，他又指出：“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如我们有五年不

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

1991 年秋以后，经济治理整顿工作基本完成，我国完全具备了加快发展的条件。邓小平把抓住时机，加快发展的紧迫问题摆到了全党的面前。8 月 20 日，他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强调稳是对的，但强调得过就可能导致丧失时机。……总结经验，稳这个字是需要的，但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以后还用不用这个字？还得用。什么时候用，如何用，这要具体分析。但不能只是一个稳字。”

在南方重要谈话中，他进一步论述了加快发展的必要性。指出：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他后来在视察首钢时又说“如果老是百分之六的速度，就会影响第二步目标的实现，而且会给第三步目标的实现造成更大的困难”。他告诫全党“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

邓小平认为，加速发展，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从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得到的。1984 年到 1988 年，那 5 年的加速发展就是明证。

邓小平在分析国际国内丰富经验的基础上指出：“看起来

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

邓小平强调加速发展，是以讲效益、讲质量为前提的，是以科学和教育为依靠的。“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怕的。”“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学和教育。”而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更不是伤害整个发展机体、机制的“大跃进”。

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邓小平在南方重要谈话中强调指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提出不能动摇，就是有可能发生动摇。在党的历史上，就曾发生过偏离八大正确路线的教训。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强调最多的，就是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不能变。1984年，他针对国际上关于“邓某人不在政策要变”的担心，在中顾委一次会议上说：“我们要向世界说明，我们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战略，谁也变不了。为什么？因为实践证明现在的政策是正确的，是行之有效的。人民生活确实好起来了，国家兴旺发达起来了，国际

信誉高起来了，这是最大的事情。改变现在的政策，国家要受损失，人民要受损失，人民不会赞成。首先是八亿农民不会赞成。”“从我们自己的实践看，不但我们这一代不能变，下一代，下几代，都不能变，变不了。”

1989年国内发生政治风波，邓小平在5月31日同两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国际国内都很关心这个问题。”政治风波刚刚平息，他在6月9日讲话中又郑重地强调了这一问题。

邓小平的南方重要谈话，强调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基本路线长期保持稳定的信心和决心。邓小平说：“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说过来说过去，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

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体现了我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进程。这是以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经历的时间为科学依据的。十三大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需要上百年的时间。因此，作为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也要管一百年。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必须把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必须坚决反对动摇党的基本路线的“左”的和右的两种倾向。既

要坚持改革开放，又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认为，反对改革的“左”的东西是动摇党的基本路线的主要因素。在50年代初期和中期，他就多次提醒全党，我们既面临右的阻力，也面临“左”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指出重点是纠正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他在南方重要谈话中进一步强调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动乱就是右；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根深蒂固的是“左”的东西，“左”带有革命的色彩，拿大帽子吓唬人，好像越“左”越革命。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因此，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三、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早在1985年3月7日，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曾指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也指出：改革开放。“使生产力获得了新的解放”。这些论述虽然都提到改革是解放生产力，但由于不是专门作为一个问题提出，也没有专门作为一个问题来论述，因此还没能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

邓小平在南方重要谈话中鲜明而尖锐地指出了这一问题。他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这就明确地说明了，我国改革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调整和修修补补，而是要把生产力从旧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社会主义

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论断的最直接的实践意义，就是要解放思想，加大改革的力度。经过十多年以市场为导向渐进性的改革，市场成分在我国经济体制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以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改革者发扬革命的主动精神，胆子要大一些，敢于实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如果像小脚女人那样，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三个有利于”标准和社会主义本质的提出，从根本上抽掉了“左”的东西对改革开放进行姓“资”姓“社”诘难的理论基础，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进入新境界。

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他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

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论断解除了把计划与市场作为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束缚，肯定了我国以市场为取向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

在“特区”问题上，他指出特区姓“社”不姓“资”。深圳特区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在“三资”企业问题上，他说：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那些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的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问题上，他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办法。

邓小平南方重要谈话在我国改革开放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为改革开放扫清了道路，也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进一步放手地工作创造了条件。对此，江泽民在邓小平逝世后的一次讲话中十分动情地说：到党的十四大前，他把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前进道路上存在的重大问题都给我们解决了，为我们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特别是他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为我们开好党的十四大，进一步搞好改革开放，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现在回过头来可以看得更清楚，小平同志真是高瞻远瞩，深

谋远虑啊！

199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以中发（1992）2号文件的形式下发了《邓小平同志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要求“全党同志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全面深刻地领会谈话的精神实质，紧密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3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全体会议，认真讨论了我国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完全赞同邓小平的南方重要谈话。邓小平南方重要谈话，为党的十四大的召开作了思想、理论和组织准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

邓小平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发表以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向市场方向迈进已是大势所趋，不可能再继续延用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建立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这种双重体制的提法。

但如何表述新的经济体制，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主要有三种：一是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二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三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这几种提法，究竟哪一种更切合我国的经济实际，更易于为大多数同志所接受，更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在重大理论问题上差之毫厘，就可能导致实践上的谬之千里。最高决策层和理论界都在认真地思考着这个问题。江泽民在1992年6月9日中央党校的讲话中说：

“总得最后确定一种大多数同志都赞同的有关经济体制的比较科学的提法，以利于进一步统一全党同志的认识和行动，以利于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的建立。”

经过认真缜密的思考，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的讲话提出了自己倾向性的观点，他说：“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他认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性的，这在人们的脑子里和认识上一直是清楚的，不会因为提法中不出现“有计划”三个字，就发生是不是取消了计划性的疑问。而且，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无计划，所以，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可以为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所接受的。他还说：虽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但也和中央一些同志交换过意见，大家基本上是赞成的。

在这次重要讲话中，江泽民还进一步从理论上阐发了邓小平南方重要谈话关于计划与市场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本质区别的思想。

在邓小平的推动和全党的共同努力下，历经十多年的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最难的历史性课题终于被解决了，并为全党所接受，成为全党的共识。1992年7月21日，陈云在《悼念李先念》的文章中指出：“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这是陈云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主要领导人的一个重大的政治表态。

江泽民在回顾我们党对市场经济问题的认识由分歧走向统一的发展过程时指出：“认识的发展变化，包括出现不同意见、不同观点的讨论，这是正常的，说明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特别是对一些重大问题，往往总是要经过反复认识和反复讨论，并通过实践不断总结提高，才能得到比较科学的认识。现在可以这样讲，经过十多年的摸索和总结国内外经验，我们对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认识，已经比较成熟了，在全党也进一步统一了，完全可以进入加快实施的阶段了。”至此，我们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已经水到渠成，呼之欲出了。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党的十四大在北京召开。李鹏主持大会开幕式，江泽民代表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报告全面回顾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所走过的道路，对14年伟大实践作了基本总结。报告指出：14年来的改革开放，就其引起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是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它的实质和目标，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以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为了加速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和社会全面进步，报告提出必须努力实现十个方面关系全局的主要任务，即是：第一，围绕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快改革步伐；第二，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更多更好地利用国外资金、资源、技术和管理经验；第三，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高度重视农业，加

快发展基础工业、基础设施和第三产业；第四，加速科技进步，大力发展教育，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第五、充分发挥各地优势，加快地区经济发展，促进全国经济布局合理化；第六，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有一个较大的发展；第七，下决心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切实做到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第八，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新水平；第九，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加强环境保护；第十，加强军队建设，增强国防实力，保障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顺利进行。

党的十四大的一个突出新贡献，就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报告向全世界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大通过的《关于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批准了十四大报告并明确“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大通过的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也明确要求：“要从根本上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样，就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全党行动的指导地位。

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大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体制。这句话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它不同于用计划配置资源的计划经济体制，也不是计划经济体制附加些市场调节的功能，而是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市场并不排

斥宏观调控，因为市场不是全面的、万能的，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这就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引导市场的健康发展。这说明，我国所要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不是像资本主义发展初期那种没有宏观调控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是现在为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由国家宏观调控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相似”的市场经济体制。

但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又具有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点，方法基本“相似”而性质不同。十四大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实行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这决定了我们所要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性质，也使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有可能更好地发挥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更好地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兼顾效率和公平，实现共同富裕。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又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但坚冰已被打破，航道已经开通。十四大对我国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定的日程表是：“在九十年代，我们要初步建立起新的经济体制，……再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将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只要我们大胆探索，敢于试验，及时总结经验，我们就一定能够到达胜利的彼岸。

新的改革大潮的涌起

以邓小平南方重要谈话和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阶段。改革开放大潮再起，呈不可阻挡之势，一泻千里。加快发展和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成为新阶段的主要特征。

关于加快发展问题。1990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中要求：“今后十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六左右”，当时认为“这在世界范围内将是比较高的增长速度”。1991年3月召开的七届人大四次会议接受了这一建议。

邓小平南方重要谈话发表后，在加快发展成为全国上下一致要求的大背景下，适当调整和提高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势在必行。中共中央高度重视邓小平的意见，开始考虑和专门研究这一问题。

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中指出：“从全国来说，根据我们现有的物质技术条件、经济实力、社会承受能力，加上加快改革开放的措施和人的积极因素的进一步发挥，看来国民生产总值可以超过“八五”计划中确定的年均百分之六的增长速度，可以搞得再快一些，向百分之九、百分之十前进，只要把工作和措施跟上去，是有把握实现的，而且不会有什么大的风险。”根据初

步测算，十四大提出：“增长百分之八到九是可能的，我们应该向这个目标前进。”1993年3月初召开的十四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调整“八五”计划若干指标的建议》，把经济增长速度由6%调整为8%~9%。同年3月下旬召开的八届人大一次会议接受了中共中央的建议。至此，调整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议程圆满结束。1992年至1997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每年都以高出9%的速度增长。实践证明，这一调整是完全必要和及时的。

关于加快改革问题。新阶段的改革从发动开始就具有鲜明的特色。从改革的深度来看，改革由原来突破或弥补计划体制的局限和缺陷转向迅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改革的参照物也由主要是对农村改革成功经验的借鉴而转向对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地区的学习。从改革的发动和前进的幅度来看，前阶段改革是循着由上（中央）到下（基层）逐步展开的，思想解放和改革操作交互作用，呈典型的渐变式推进的特征。而新阶段的改革刚一启动，就是上下一致，一呼百应，使改革迅速展开并走向高潮，改革措施出台的数量，涉及的范围，是前一时期无法比拟的。就改革的社会参与程度来看，前阶段的改革，农民和乡镇企业无论在主动性上，还是在相对利益增长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而新阶段改革的主体力量则产生于更广阔的社会基础上。在前阶段表现相对被动的城市全民、集体企事业单位和政府机关在新的形势下大幅度地增强了社会参与意识，不同程度地作出了迎接市场经济新体制形成的积极反映。北方城市的许多人南下广东、海南，寻找自己发展的机会，在机关工作的许多人丢掉“铁

饭碗”，辞职“下海”，试图在商场上一显身手。总之，新阶段的改革，确实体现了改革是一场伟大革命的性质。

1992年至1993年实行宏观调控之前，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企业改革、价格改革、农村改革、对外开放等方面，都迈出了较大的步伐。

在企业改革方面，1992年6月下旬，国务院通过《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进一步扩大了企业的权利。规定企业有14个方面的自主权，即生产经营决策权、产品劳务定价权、产品销售权、物资采购权、进出口权、投资决策权、公用资金支配权、资产处置权、联营兼并权、劳动用工权、人事管理权、工资奖金分配权、内部机构设置权、拒绝摊派权等。并规定“企业的经营权受法律保护，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不得和侵犯”。《条例》的出台，为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提出了新的依据和推动力。但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并非一帆风顺。据国务院贯彻《条例》调查组对15个省区市的调查分析结果表明，至1993年6月，企业的14项自主权基本落实的有8项，部分落实的有4项，基本不落实的有2项，最难落实的是拒绝摊派权。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工作仍然道路漫长。

价格是市场发育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市场合理配置资源主要是通过价格信号变化来实现，理顺价格，企业才能进行公平的竞争。因此必须进一步改变价格双轨制，建立起市场形成价格的价格机制。在理顺粮食价格方面，如前所说，分别于1991年、1992年提高粮食价格，实现了购销同价，并逐步推进放开粮价的试点，至1993年7月，90%的县市已

放开粮价。长期以来粮价严重扭曲的基本矛盾得以解决，粮价的市场形成机制并开始运行。在生产资料价格方面，调整了部分基础产品的价格和公用事业的收费。1992年7月1日起提高铁路、货运、煤炭、天然气的价格，并取消了煤炭、原油、成品油、钢材等计划外价格的最高限价。国家管理的生产资料和交通运输价格1991年底有737种，而到1992年底已减少到89种。一些商品的零售价格也进一步放开，据河北、山西、北京等9个省市统计，仅1992年上半年就放开了552种商品的价格和收费。这就为我国最终形成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创造了条件。

在计划投资体制方面，指令性生产计划进一步缩小，1992年底国家工业指令性计划已缩小到16.2%；其中国家计委下达的仅为12%；东南沿海地区有的已低于10%；与此同时，计划部门的职能正在向“研究战略、制定规划、综合平衡、培育市场、重点建设、宏观调控、协调服务”的方向转变。

农村改革向深层迈进。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是党对农村的基本政策，前面谈到，1991年11月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强调要继续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1992年农业部制定了《关于加强农业承包合同的管理意见》，指出要把家庭承包责任制纳入法制的轨道。农业承包合同一经依法签订，即具有法律约束力，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已经签订的3亿多份农村承包合同都具有法律约束力。多种形式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也在积极推进和完善。在保持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不变的基础上，农

村的改革除了继续调整农产品的价格，推动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外，在促进农业的优质高产高效、乡镇企业的发展、减轻农民负担等方面，都推出了新举措。

对外开放由沿海向沿江、沿边、内陆省份推进，是对外开放的新特点。1992年3月，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黑龙江黑河市、绥芬河市，吉林珲春市和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6月，又决定开放长江沿岸芜湖、九江、岳阳、武汉、重庆5个内陆城市。至此，长江沿岸的10个主要中心城市已全部对外开放。其后，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石家庄等4个边境沿海地区省城，太原、合肥、南昌、郑州、长沙、成都、贵阳、西安、兰州、西宁、银川等11个内陆地区省城，实行沿海开放城市政策，这些地区和城市的开放辐射面将影响到我国整个内陆和沿边沿江地区，开始向多层次、全方位的“大开放”格局发展。

对外开放的领域进一步扩大，1992年国务院批准北京、上海等6个城市和5个经济特区各试办一二个外商投资商业零售企业，对金融保险、旅游等原来禁止或限制外商投资的行业也开始试点。

第三代领导集体开创外交春天

1994 年月，江泽民访问法国时，提出了发展中欧关系的四项原则：面向 21 世纪，努力发展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互补互利，促进共同发展；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磋商与合作。

1996 年 4 月 12 日，李鹏在法国讲演时指出：“亚洲和欧洲的合作，可以说是世界上一个经济实力强大、技术先进、资金雄厚的国家集团同具有广阔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国家之间的合作。”

“西欧已成为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1995 年，中国同西欧的贸易总额达到 421 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 18.3%，创历史最高水平。”

欧洲的对华政策在经历重大变化

在世纪之交，亚洲国家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以及亚洲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政治地位的不断提高，使欧盟各成员国认识到加强同亚洲国家建立和发展伙伴关系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欧盟于是感到原有政策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为了协调各成员国的亚洲新政策，只有从战略的高度着眼于未来，制定

出欧盟整体的对亚洲新政策，才能确保和扩大欧洲国家在亚洲的存在和影响，以欧盟整体形象强化欧洲国家在亚洲的存在，提高欧盟在世界多极化格局中的战略地位。

还在 1994 年 7 月，欧盟执委会就提出了《走向亚洲的新战略》。

1995 年 3 月，欧盟公布了对日政策。

很快地，欧盟的对华政策使出台了。

各成员国虽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分歧，但都一致确认，“欧盟形象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我们的对华政策。”

然而，人们没有忘记，就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十几年中，欧盟曾先是忙于内部市场的建设，后是急于协调与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关系，从而忽视了与中国经济关系的发展，在中国的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等各方面都大大落后于美日。欧盟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已有 20 年，贸易与合作协议签约也达周年，但双边关系的稳步发展却被 1989 年的政治风波所打斯。

面对这种不利局面，欧盟在经过审时度势、深思熟虑之后，终于制定出与中国发展长期合作关系的新政策。

1993 年以来，西欧国家逐渐调整对华政策，西班牙、奥地利、德国、法国、葡萄牙、芬兰等国首脑相继访华，同时欧洲企业也纷纷进入中国市场。

1994 年底，欧盟决定正式取消 1989 年对华实施制裁措施，关系的正常化为经贸关系的重新蓬勃发展铺平了道路。

中国经济的腾飞、国际政治地位的上升、军事实力的强大，使得中国成为亚洲乃至世界寻求发展与和平的重要因素，

包括欧盟在内的西方国家从经济、政治、安全、环境保护等多方面考虑，愈益感到将中国纳入国际社会的重要性。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欧盟感到“现在是亚洲新战略的精神指导下重新确定欧盟与中国关系的时候了，欧盟必须发展起能够反映中国在世界以及地区范围内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长期关系”并使欧中关系“成为欧盟对外关系的一块基石”。

《中欧关系长期政策》是欧盟执委会与 15 个成员国的代表历时半年多讨论完成的，包括正文部分及 4 个附录。正文部分分别是：

- 引言：制定对华长期政策的需要
- 政治关系：将中国纳入国际社会
- 经济与贸易关系：一个新经济强国的崛起
- 合作：新的优先，协调与信息
- 结论

各部分在对有关问题现状作出评述的基础上，提出发展欧中合作的具体建议。

4 个附录分别是：中国的经济改革，欧盟与中国的贸易，欧中双边贸易问题，合作活动。

从欧盟对华政策文件的内容可以看出，欧盟对华政策有了三个积极变化：

第一，欧盟对中国的形势及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了积极和正面的评价。欧盟副主席布里坦在公布该文件时说，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目前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中国完全加入到国际大家庭中，不仅有利于中国的改革，而且有

利于中国在亚洲乃至世界成为一个稳定的因素。欧盟的这一态度与国际上有人散布的“中国威胁论”显然不同，是积极和有益的。

第二，在诸如人权、西藏等曾经干扰欧盟和中国关系的问题上，采取了比较现实和低调处理的原则。

第三，在中国复关问题上，欧盟表现出了更加理解、灵活和积极的姿态。

于是，在政治和外交领域，欧盟逐步恢复和加强了与中国的接触和磋商。

西欧与中国双边贸易额连年创造新纪录，经济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

在军事关系上也逐步趋于正常。

这一切，为我们理顺中欧关系创造了前提条件。

面向 21 世纪的中德友好合作关系

应该说，当今国际关系的演变有利于中德关系，中德关系发展具有一定基础。

政治上，正处于地位变迁时期的德国有求于中国。

近年来德国政治地位上升，加剧西方内部矛盾，而德国要扩大政治影响，需要借助各种力量的扶持。特别是，它要实现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目标，更少不了中国的理解和支持。

对于中国来讲，也可以利用德国与西方的矛盾和利益冲

突，以谋政治与外交上的更大回旋余地。

经济上，中德之间的互补性很强。德国作为主要依赖出口的工业国家，可以得到中国这个广阔的市场，而中国可以得到德国的先进技术与设备。

中德之间不像与美、日、英那样有历史遗留问题。

而且，与美、日、英等国相比，德国比较务实，易于抛开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体制的区别，从实际的共同利益出发，达成谅解和共识。

远离中国的德国，应该是中国外交争取的一个重要对象。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位于欧洲中央地区，面积广达 35 万平方公里，人口有 7900 万，在欧洲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前西德国内生产总值占欧盟的 23%，相当于英法两国总和的 63.7%。现德国对欧盟的摊款占欧盟总预算的 25%，德国马克占欧盟统一货币单位埃居总额的 30.1%。过去，德国是欧共体建设的排头兵，现在和将来又是欧盟建设的排头兵。

德国不仅是一个地区大国，更是一个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和中国等国家一样，都对世界事务担负着重要责任。

德国是一个世界贸易大国，1993 年出口总额为 2661.24 亿美元，居世界前列，占世界出口贸易总额的 10.1%。德国作为联合国会员国，每年缴纳的会费占联合国总预算额的 8.94%，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居第三位。德国在国际事务中正发挥愈来愈大的作用。

德国是一个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资金实力强，技术先进，产品有竞争力，信誉好，但缺乏商品销售和投资市场。中国是一个正在搞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中国家，缺少资金和技

术，而劳动力便宜，市场广阔，与德国这个依赖出口贸易的外向性经济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相互支援，相互补充，这既符合两国的利益，又能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德国曼海姆大学一个教授测算，如果每个中国人买 1 美元的德国产品那就是一个八位数即是千万人口的大市场。现在中国 12 亿人口中约有一个 6000 万至 3 亿人能拿出可观的钱来购买东西的的开放市场。从 1990 年到 1994 年短短的 5 年中，中德贸易总额翻了一番以上，从 117 亿马克增长到 256 亿马克，其中德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一倍多。德国是中国在欧盟中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德贸易额占中国与欧盟贸易总额的 37%，是英、法、意三国对华贸易的总和。对德国来说，中国无疑是个看好的大市场。

在政治合作方面，冷战结束后，世界并没有变得更太平。欧洲东部和南部地区，许多地方又重新出现领土纠纷，民族冲突，内战迭起，给这些地区人民带来痛苦和灾难。在当前存在一超（美国）、四强（俄罗斯、欧盟、日本、中国）及复杂的国际关系和地区关系中，中德可以共同谋求解决国际冲突和争端的道路和方法，共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德国不少有识之士已注意到：中国是一个拥有 12 亿人口的世界大国，占世界总人口的 1/5。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虽然中国经济力量和人民生活水平比西方发达国家还差得较远，但中国是一个蒸蒸日上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政治稳定，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在日益增强。正如科尔总理 1994 年 7 月 4 日在欢迎李鹏总理访德的宴会上所说：一今天已没有任何重大

的国际问题能在没有中国参与下得到解决”，“中国对世界政治稳定的意义和责任是不可估量的。”

当然，中德两国要拓展和构筑成面向 21 世纪的新的合作关系，必须双方具有战略眼光，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要消除“中国威胁”论的错误认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西方有一股势力公开鼓吹“中国威胁”论，主张对中国实行“遏制政策”。德国也有报纸说，东南亚国家“担心一个经济现代化的、有高度军备的中国，没有美国的抗衡力量就会不受阻碍地实现它自己的利益”。这种鼓吹只不过是“冷战思维”的复活，意在不让中国发展，不让中国强大。12 亿人口的中国每年军费只有 70 多亿美元，而美国为 2500 亿美元（1995 年），德国 310 亿美元，日本约 590 亿美元（1995 年），日本自卫队是“一支军费占世界第二位，用高科技武器装备起来的在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有作战能力的部队。”中国军费只及美国的 1/35.7，人均国防开支的数额是：美国 890 美元，英国 326 美元，德国 209 美元，甚至卢森堡还为 142 美元，中国则少得可怜。中国不会威胁别人，而只会受到别人的威胁。所以鼓吹“中国威胁论”完全是别有用心。

中德两国既无历史遗留问题，也无现实的根本利害冲突。这是发展中德两国友好合作关系最重要的基础条件。1900 年，德国参与八国联军侵略中国，1901 年八国联军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辛丑条约》，德国获得了中国胶州湾地区。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中国收复了德国在山东地区殖民地，两国就了结了历史问题。中国一贯支持两个德国的统一。1972 年 10 月中德正式建交以来，两国关系虽然有

过波折，但自 1993 年 11 月科尔总理对中国的成功访问后，两国关系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德国政府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向台湾出售武器。两国领导人频繁互访和会谈，增加了相互信任。两国在尊重各自社会制度和不同国情的基础上，政治、经济、贸易和文化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各个领域的人员交流更加密切。这些互相交流和平等对话又进一步促进两国关系向更深层次发展。

中德关系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

50 年代初到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联邦德国推行“哈尔斯坦主义”，联邦德国参加美国对新中国的封锁和禁运，中德两国关系基本处于冻结状态，只有很少的人员往来和贸易活动。1955 年 4 月 7 日毛泽东主席宣布结束中国与德国的战争状态。1956 年 1 月对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中国欢迎与联邦德国关系正常化。随后，两国民间开始了人员往来和经贸活动。1956 年中国艺术团访问联邦德国，德国自由民主党议员赫尔曼·施万访问中国。1957 年德国经济东方委员会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签订了贸易协定。1964 年 5 月到 11 月中德两国进行了关于互派记者的谈判并签订了互派记者的协议。1969 年 10 月，联邦议会选举后，社会民主党与自由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当时总理勃兰特大力推行“新东方政策”，并表示愿意改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1972 年春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基督教

民主党人格哈德·施罗德访问中国，推动了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和发展。同年10月11日，联邦德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谢尔访问中国，两国签订了建交联合公报，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之后，联邦德国与中国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第二阶段

两国建交后直到1993年底，两国关系在顺利发展中又出现了波折。这个阶段的前半期，社会民主党政府怕“刺激”当时的苏联，与中国关系比较平淡。从1982年10月起，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党联合执政，中德关系才有了大的发展。两国首脑和高层领导人的互访不断增多，两国的经贸关系不断发展，各种交流活动也不断加强。1971年，德国对中国出口额为6.12亿马克，1987年达到84.5亿马克，同年从中国进口额为345亿马克。1988年11月，根据两国文化合作协定，标志两国文化合作蓬勃发展的德国歌德学院北京分院成立。1983年德国承认中国为发展中国家，1984年向中国提供技术援助1500万马克，1987年给中国技术援助包括向兴安岭森林火灾提供援助共计1亿马克。1985年开始向中国提供财政援助5000万马克，1987年增长到1亿马克。两国还签订了中国省与德国联邦州之间及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协定。

1989年北京发生“六·四事件”，德国政府对中国实行全面制裁。在西方国家包括美国不断向中国发出信号，以示要改善对中国关系后，1990年10月30日，德国联邦议会通过决议，取消对中国的制裁，但取消得不彻底，对中国的发展援助仍限制在以下范围：（1）援助直接服务于人的；（2）

援助有利于环境保护；（3）援助服务于中国的经济改革。直至1991年11月联邦经济部长默勒曼率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1992年11月新任外长金克尔首次访问中国，才重又初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1993年3月新任的联邦经济部长雷克斯罗特率领一个庞大的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使两国关系走上正常化。1993年5月，中国外长钱其琛访问德国，与联邦政府领导人进行会谈，双方强调要扩大和发展双边关系。同年9月，经贸部长吴仪访问德国，参加中德经济合作混合委员会第8次会议，两国决定成立“经济合作和投资委员会”。双方一致认为，中德经贸关系进入健康、稳定的发展阶段。双方还就建立天津工业园小区、铁路合作、煤炭和有色金属工作小组进行了讨论。中国代表团向德方提出了700多个合作项目。同年11月15日至23日，科尔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实现两国关系的完全正常化。

第三阶段

两国努力建立面向21世纪的新的友好合作关系。1994年1月16日，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应德国联邦议会邀请，对德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两国议会首次进行正式接触，人大成立了“中德议员友好小组”并与联邦议会中国议员小组建立了关系。同年7月李鹏总理对德国进行正式访问，1995年7月江泽民主席访问德国，把两国关系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1月科尔总理又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进一步密切了两国关系。回顾中德关系发展的历程，深感今日成果的来之不易。中德双方应继续努力排除干扰和障碍，使两国友好合作关系更上一层楼。

中英关系回顾与展望

众所周知，中英关系中的首要问题是香港问题。正当香港回归祖国的日子越来越临近的时候，中英关系的发展必然成为内地和香港同胞最为关心的问题。

要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必须首先回顾一下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提起、分歧的由来和发展。按时间划分，中英关系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1982年至1992年为第一阶段；1992年到现在为第二阶段。

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来华访问时，中国政府向她正式提出关于中国将在1997年收回香港的决定。邓小平当时在会见撒切尔夫人时指出：“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中英“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英国“应该赞成中国这个决策。中英两国应该合作，共同来处理好香港问题”。

谈判历时两年。从1982年9月撒切尔夫人访华至1983年6月，双方主要就原则和程序问题进行会谈；从1983年7月至1984年9月，由两国政府代表团就具体实质性问题进行了22轮会谈。

当时由于英方一度坚持三个不平等条约仍然有效及“主权换治权”的主张，曾使谈判难以进行。为此，邓小平再次告诉英方，如继续坚持上述错误立场，中国将于1984年9月单方面公布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会谈最后还是以中国

政府提出的关于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由港人治港和现行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等原则进行。1984年12月中英双方最终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这一协议的签署为全面解决香港回归与平稳过渡问题奠定了基础。

随后，中国开始着手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从1985年7月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正式成立到1990年4月正式通过基本法总共历时4年9个月。在基本法的制定过程中，中方曾吸收了不少英方提出的合理意见。两国外长在基本法即将颁布的时候，在7封近万字的信件往来中曾就香港1995年选举，包括立法局分区直选数目等香港改制发展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在原则上达成一些谅解和协议。英国前外相杰弗里·豪公开赞扬说，“我们能在基本法这份中国宪法文件中获得95%我们熟知的法制，可算是奇迹。”

可以说，从1982年以后的10年间，中英双方在香港一些重大问题上有过较好的磋商合作。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和土地委员会的工作也取得不少成果。

但在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风波后，英方错误地分析中国国内和国际形势，改变了对香港的政策，在香港问题上采取了与中国政府不合作、甚至对抗的态度，从中英联合声明的立场倒退。

1992年10月初，英方在没有同中方磋商的情况下，由新上任的港督彭定康在施政报告中突然抛出“改制方案”，企图改变两国政府间已经商定的联合声明与基本法衔接的原则和两国政府已经达成的有关协议和谅解。

彭定康置中方多次劝说于不顾，一意孤行地单方面采取

行动，从而挑起了一场长达6个月之久的中英公开论战。后来，英方迫于种种压力，在1993年初向中方表示了谈判的愿望，中方考虑到中英合作的大局和两国的根本利益，同意和英方进行两国政府之间的谈判，希望英方放弃“三违反”，重新回到中英合作的轨道上来。于是双方从1993年2月初至3月12日进行了内部磋商，后同意谈判按照“三原则”进行。

从1993年4月22日至11月27日期间，中英双方举行了17轮会谈。双方商谈的主要议题是，香港在英国管制下举行的最后一次选举，即香港1994/1995年19个区议会、两个市政局（新界区城市政局、港岛九龙市政局）和立法局三级的选举安排。这是一个牵涉到此次选举产生的为期4年的三级架构能否过渡到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以后的一系列具体问题，也就是涉及1997年香港平稳过渡和政权顺利交接问题。

说得更具体一点，“直通车”问题是双方会谈中讨论的一个重要议题。香港立法局是每4年选举一次。1995年选举出来的立法局要跨越1997年。前两年为香港立法局，而后两年为特别行政区立法会。按全国人大有关决定的规定，1995年选举产生的立法局的组成如符合该决定和基本法的有关规定，其议员拥护基本法，愿意效忠特区政府并符合基本法规定条件，经特区筹委会确认，即可直接过渡成为1997年的香港第一届特区立法会议员，故称为“直通车。”

谈判中，英方不断设置障碍，并单方面停止进行17轮的谈判，将有利于平稳过渡的改制“直通车”拆毁，强行将其“三违反”方案付诸实施。

鉴于英方的不合作态度。中国政府明确宣布：依靠自己

的力量，依靠广大爱国爱港同胞，一定能够实现香港的平稳过渡和按期恢复行使主权。为此，进行了一系列扎扎实实的准备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几年来，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和新华社香港分社陆续聘请近 200 名香港各界人士担任港事顾问，新华社香港分社聘请了 500 多名对香港地区性事务有贡献的人士担任区事顾问，以便更广泛地听取香港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

——1993 年 7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香港特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加紧研究和提出筹组香港特区以及维护香港平稳过渡的具体意见和建议，为 1996 年特区筹委会的成立和运作做好一切必要准备工作。

——1994 年 8 月底，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决议，港英最后一届三级架构于 1997 年 6 月 30 日终止，授权特区筹委会按人大有关决定和基本法的规定组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机构。

在经济和民生问题上，尤其在一些跨越 1997 年的大型基建项目方面，例如新机场及有关工程的建设，中国政府为维护港人的长远利益，保持香港的长期稳定繁荣，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尽管英方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中方仍然希望英方能“减少麻烦，多做实事，增加合作”，并在一系列问题上主动推动英方回到合作的轨道上来。

在中方的一再努力下，英方表示了希望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1995 年 3 月，英国前首相撒尔切夫人作为外交学会的客人访华，随后，前首相希思来京出席“中国国际经济论坛

95 会议”。5 月，英国当时的贸工大臣赫塞尔廷应外经贸部部长吴仪的邀请也访问了中国。英方在与中方合作的问题上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态度，使一些有关平稳过渡的问题如香港终审法院和新机场财务安排等问题达成协议，受到各方的欢迎。

1995 年 10 月，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访问英国，并在访问中会见了梅杰首相。赫塞尔廷副首相等英方领导人，同里夫金德外交大臣进行了会谈。双方就包括香港问题在内的双边关系和共同感兴趣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

双方都表示，要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在今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加强在香港问题上的磋商和合作，以实现香港政权的顺利交接和平稳过渡。双方就港府与香港特区筹委会的合作、中方同香港公务员接触的问题原则上达成了谅解。双方还同意成立以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双方首席代表为首的政权交接仪式专家小组，具体研究交接仪式的安排。

那次访问使中英关系在经历了曲折历程后，走出低谷，对进一步改善两国关系，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当时，香港报纸纷纷评论钱外长英国之行，认为双方达成的有关协议和共识，有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和香港政权的平稳过渡和顺利交接。中英双方的合作不仅对香港政权的交接有利，而且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中方希望英方能抓住钱其琛访问伦敦时在四个问题上达成原则性共识的契机，同中方切实加强合作，不要干扰筹委会工作，不再为香港平稳过渡制造障碍。

钱其琛在伦敦发表演讲时强调了今后处理中英关系的几条原则：

一、着眼长远，面向未来。双方都应当以面向未来的长

远观点，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以使这种关系走上长期稳定的健康发展轨道。

二、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中英两国在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发展水平上存在着不同和差异。在一个多样化的世界里，这些不同和差异是完全正常的，也是有益的。两国应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增进了解，取长补短。要做好伙伴，而不要自命为传教士。

三、平等互利，发展合作。目前，中国经济正持续快速发展。英国是中国传统的重要贸易伙伴，在交通、能源、电讯、化工、机械制造以及金融等领域有很强的优势。中英在经贸领域合作的潜力很大，前景十分广阔，双方完全可以发展各种形式的互利合作，优势互补，共同受益。

四、信守协议，加强磋商。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和稳定符合中英两国和两国人民包括香港人民的利益。为实现这一共同目标，中英双方都有责任，在今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根据联合声明，加强磋商与合作，妥善解决有关问题。

以上这四条是处理中英关系最重要的原则，只要双方共同遵循这四项原则，那么中英关系一定会朝着顺利、健康的方向发展。

但必须看到，在今后的时间里，摆在内地和香港同胞面前的任务还相当艰巨繁重。

特别是 96 年初，里夫金德外交大臣应钱其琛的邀请对中国进行了为期 3 天的访问。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和李鹏总理分别会见了里夫金德，钱外长还同他举行了会谈，就双边关系和香港问题等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双方都表示重视中英

关系。英方表示“与中国建立长期的、基础广泛的关系是英国明确的战略取向，”中方对此表示欢迎。

双方还回顾并确认了 95 年则月两国外长会谈以来双方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例如民航协定、特区护照等问题上所取得的进展。因此，从里夫金德的访华可以看出，英方是有意愿同中国在香港问题上进一步开展合作的，但也不排除英方在这一问题上口头上称合作，暗地里搞小动作的可能。因为筹委会所作的各项准备工作实际上是为政府交接作准备。英国自 1840 年鸦片战争后强迫清政府订立不平等条约占领香港到现在已有 150 多年的历史。从 1992 年以来它在香港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它要撤出香港总不是那么乐意，不那么痛痛快快，总要找一些理由或借口为政权顺利交接设置各种障碍，因此人们不得不对此提高警惕。

总而言之，不管英方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中方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在 1997 年 7 月 1 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邓小平在谈到香港问题之所以能得到解决的原因时曾说：“主要是这几年我们这个国家发展起来了，是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而且是个值得信任的国家，我们是讲信用的，我们的说话是算数的。”预委会几年来的工作及所取得的成果表明，我们确实已把握了方向。江泽民也曾明确指出，“香港保持平稳过渡要靠我们自己，我们从来没有把香港的稳定繁荣寄托在别人身上。”我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中国之所以有如此的决心、勇气和把握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主要是一靠“一国两制”政策；“二靠“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三靠内地和香港的稳定 and 经济发展。人们可以完全

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切切实实按照中央制定的一系列有关香港问题的特殊政策办，香港一定能实现平稳过渡和政权顺利交接，香港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法国以最长的红地毯迎接江泽民

1996年9月2日至12日江泽民访问了俄罗斯、乌克兰和法国，如果说江泽民对俄罗斯、乌克兰的访问是政治色彩浓于经济，那么，他对法国的访问则是实实在在的“政治、经贸之旅”。

江泽民是自1978年以来第一次访法，也是中法关系恢复正常化的联合公报发表8个月后，两国元首的首次会晤，其政治意义十分瞩目。

此次，法国“以最长的红地毯”热烈欢迎中国贵宾的到来。江泽民自马赛飞抵巴黎时，72岁高龄的密特朗总统尽管不久前刚作了第二次前列腺手术，仍亲赴机场迎接，并陪同江泽民乘直升飞机到市中心的荣军院广场。“花都”巴黎处处洋溢着中法人民的友好气氛，从凯旋门至协和广场约2公里长的香谢丽舍大道上，处处悬挂着三色旗和五星红旗。

法国总统府的一位官员透露：根据惯例，法国一年只接待四起国事访问，且只少不多，1995年高规格的国事访问仅一起，然而1996年却破了例，江泽民是第五次受到最高礼遇的外国元首。据说，有的国家元首虽然与法国保持着十分友好的关系，经常前往巴黎，但几十年也无法得到法方以国事

访问的规格接待。

正如江泽民在巴黎所言，“中法两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对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负有重要责任。两国对维护地区和平、加强各国之间的友好合作等方面有许多共同相似的观点。”双方都强调各自的“独立性”和拒绝外来的压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冷战后的世界上，两国谋求的都是“发展”与“和平”。

访问中，中法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两国加强磋商、协调与合作是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因素；双方一致同意面向 21 世纪，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持续稳定地发展双方在政治、经贸等领域的关系。

在爱丽舍宫的盛大欢迎宴会上，密特朗总统反复表达了法国企业界希望参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强烈愿望。他说：“法国在世界贸易中名列第 4 位，然而在中国市场所占比例只有 2.5%，与法中两国的大国地位极不相称。”他特别提到 9 月 6 日在巴黎召开的法中经贸混委会第 10 次会议，认为这次会议的成果表明，法中两国的经贸合作“已走上新的坦途，前景十分可观”。

江泽民表示，中法两国经济互补性很强，发展双边经贸合作的潜力很大，中方愿意本着平等互利的精神，进一步拓宽同法国经贸合作的领域，促进经贸关系的全面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在江泽民为期 5 天的访法日程表上，没有埃菲尔铁塔、没有巴黎圣母院、也没有凡尔赛宫；而是高速列车、核电站和客车飞机等法国人最引以为自豪的高科技项目。

法国 TGV 高速列车目前是世界上运行最快的商业列车，时速 300 公里，同时也是 515.3 公里世界最高时速的创造者。法方精心安排，让江泽民及随行的钱其琛副总理外经贸部长吴仪等中国官员亲自乘坐、体验一下“世界最快列车”的滋味。法国铁路公司总裁蒙塞利亲自陪同，并邀请江泽民到驾驶室参观。江泽民对列车的评价是：“速度既快，又很舒适”。

作为世界核能大国，法国全国发电总量的 78% 来自核电站。9 月 11 日，江泽民来到法西南部城市波尔多附近的柏莱耶核电站。他仔细询问了电站安全方面的情况。站长一一作答，还特别提到该核电站曾为广东大亚湾核电站培训过不少技术人员。陪同参观的法国电力公司董事长梅纳日不失时机地告诉江泽民：“法国愿意帮助中国建 1000 座核电站”。

法国在交通、能源、电信等方面的优势正是目前我国重点发展的领域。正如两国领导人所一再强调的那样：中法两国经济上有很强的互补性，两国经贸合作有着巨大的潜力。江泽民此次访问期间，中法双方签署的价值 181 亿法郎的合同、协议和意向书，正是这种潜力的有力证明。

对于江泽民此次欧洲三国之行，国际舆论予以积极的评价，普遍认为这次访问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必将推动中国同三国的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合作。舆论还指出，江泽民此次访问“以中国的大市场为后盾，同以经济问题为中心的这三个国家成功地建立了新关系”，“充分显示了中国作为一个经济政治大国的稳健与强硬”，标志着中国和欧洲关系的“一次突破”。

跨越欧亚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结束历史性的非洲六国之行刚一个月后，又应欧亚六国元首的邀请于 1996 年 6 月 23 日至 7 月 6 日先后对西班牙、挪威、罗马尼亚、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江泽民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对上述六国进行的首次访问，意义重大，引起舆论强烈反响。

《参考消息》6 月 23 日登载了路透社评江泽民出访欧洲，中亚的文章，题目是：广交天下朋友，挫败西方遏制。从一个侧面介绍了江泽民此次出访的背景。

分析家们今天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将于 23 日离开北京，前往欧洲和中亚访问，谋求挫败西方遏制北京的战略。

江泽民将从 6 月 23 日至 7 月 6 日访问西班牙、挪威、罗马尼亚、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这是他在两个月中第二次出访。江泽民 5 月份访问了六个非洲国家，向它们提供优惠贷款，以抵消敌对的台湾对它们的诱惑。

中国渴望在联合国增加盟友，这一政策今年 4 月奏效：北京挫败了一项得到美国支持的指责中国侵犯人权的提案，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近年因为台湾、人权、知识产权以及核扩散等问题而一再处于紧张状态，这两个太平洋大国本月好不容易避免了一场涉及数十亿美元的贸易战，一位西方外交官说：“中国急于将中亚国家拉到它一边。”

4月中国同邻国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俄罗斯签署了一项条约，在这几个国家同中国的边境建立了非军事区。那位西方外交官说：“中国人看准机会，同那些到目前为止主要同俄罗斯保持关系的（中亚）国家建立良好的政治关系。”

北京仍然对西方怀有疑虑，那位外交官说，“中国担心可能陷于孤立……成为西方迫使中国就范战略的牺牲品。”他说，江泽民出国访问是挫败北京所谓美国试图遏制它的努力的战略的一部分。

美国官员说过，华盛顿力图同中国接触，而不遏制中国。不过，一些高级官员曾警告说，今后有可能对中国进行遏制。

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在江泽民出访前就这次出访的目的和意义发表谈话。沈国放说：“中国同这六个国家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我们认为，双方应从面向21世纪的战略高度，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扩大合作，使双边关系沿着健康的轨道长期、稳定地向前发展。我们相信，通过江泽民主席的这次访问，中国同这六个国家的相互了解和信任会进一步加深，双方的友好合作也会得到进一步发展。”

法新社6月22日的报道说，今年以来中国全方位外交已经产生了积极影响，江泽民此行的目的是继续展开全方位外交活动，以巩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大国地位。江泽民六国之行在到访国更是反响强烈。访问前，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就纷纷接受中国记者采访，发表谈话，高度评价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及江主席访问的意义。

西班牙众议院议长特里略表示，西班牙对中国采取积极

而热情的态度，以钦佩的心情关注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并希望加强两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参议院议长巴雷罗指出，两国经常进行重要的高层互访，江泽民的访问体现了两国政府和人民继续保持经常接触的意愿，很有积极意义。

挪威外长戈达尔表示，挪威政府去年制定了亚洲战略，中国占据了其中最重要的地位。挪方期待着江泽民的来访。戈达尔表示相信，这次重要访问将有力地促进双方在政治、经贸、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合作。江泽民抵达的前几天，挪威各大报纸纷纷报道了江泽民来访的消息，介绍中国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

江泽民 70 年代曾作为中国专家组总组长在罗马尼亚工作过，此次访问在罗受到异乎寻常的重视。6 月 10 日，罗总统伊利埃斯库在接受《中华英才》记者采访时指出，两国的双边友好合作关系有着悠久的传统和深厚的基础。江泽民是罗马尼亚人民的老朋友，他的来访必将把两国的传统友谊和合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为促进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做出重大贡献。江泽民访罗的消息刚一公布，罗新闻界即进行了大量报道。只要看看几个标题就可知罗方对江泽民的访问的重视程度：《罗马尼亚人民的老朋友即将来访》、《会罗语的江泽民即将访问罗马尼亚》……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表示，“江泽民主席是访吉的第一位中国最高领导人，这将是本世纪前最重要的事件。吉政府和人民正精心准备江泽民来访，相信访问一定能圆满成功，并将把两国合作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哈萨克斯坦高度重视江泽民的来访，作为接待江泽民来访的准备工作之一；我驻哈使馆和哈文化部于6月14日开始举办“中国今昔”图片展，共展出400多幅照片，包括《环境与人》、《中国妇女》、《西藏新貌》、《中国风俗》、《中国住房建设》、《外企在中国》等10个部分，在哈国内受到欢迎并引起强烈反响。

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两次接受中国记者的采访。他表示，他正以急切的心情期待着江泽民的来访，他说：“江泽民主席的来访将是哈历史上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首次访问，这次访问必将使两国关系跃上一个新台阶，政治和经济合作由此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哈下议院议长沙戎部长、工贸部副部长也分别对中国记者发表谈话，高度评价江泽民访哈的重要意义。

在为期14天的访问中，江泽民同欧亚六国领导人进行了会晤、会谈，同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达到了增进理解，加强信任，扩大共识，加深友谊的目的。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

访问期间，江泽民从面向21世纪的战略高度，把握国际形势变化的脉搏，以适应各国人民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愿望，同六国领导人和各界人士进行广泛的接触、会晤与交谈，深入探讨了如何建立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增进了理解，加强了信任，扩大了共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访问期间，中国和有关国家签署了近30个协定和文件，分别和罗马尼亚、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发表了联合声明，其中特别值得庆贺的是中吉两国签署了国界协定。这些成果对于扩大

我国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合作，增进我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改善我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西班牙，江泽民出席了国王卡洛斯一世的欢迎宴会，出席了两院议长的联合欢迎仪式，与阿斯纳尔首相举行了会谈，会见了企业家代表，接受了马德里市市长授予的金钥匙，接受了《国家报》记者的采访，还到帕尔马市和巴塞罗那市进行了参观访问。

在挪威，江泽民出席了国王哈拉尔五世的欢迎宴会，同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举行了会谈，会见了议长格伦达尔夫人，会见了挪威经济界人士，并在国王哈拉尔五世的陪同下参观了挪威船级社，还赴挪第二大城市卑尔根参观访问。

在罗马尼亚，江泽民与伊利埃斯库总统举行了正式会谈，会见了沃克罗尤总理、参议院议长盖尔曼和众议院议长纳斯塔塞，会见了他对年代初在罗工作时的老朋友，参观了布加勒斯特重型机械厂、布拉索夫卡车厂和拖拉机厂。

在乌兹别克斯坦，江泽民同卡里莫夫总统进行正式会谈，会见了议会立法会议主席乔尔蓬巴耶夫和人民代表会议主席马图布拉伊莫夫，在阿卡耶夫总统的陪同下参观了比什凯克的“玛纳斯村”。

在哈萨克斯坦，江泽民同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举行了正式会谈，会见了议会下院议长奥斯帕诺夫，并在议会发表演讲。

这六个国家，地域不同，国情各异。不论社会制度、文化传统、意识形态，还是发展模式和经济水平，都有不少差异，但所有这些差异，都不是发展国家关系的不可逾越的障

碍。只要国家之间平等相待，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和睦相处，互不干涉他国的内部事务，就可以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江泽民的这次欧亚六国之行再一次充分体现了我国一贯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体现了我国始终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的真诚愿望。这次访问的成功再一次说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处理当代国家关系的最好方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国际关系中，遵守这些基本准则，既有利于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也有利于促进各国的共同发展，从而应当成为世界人民迫切要求建立的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础。

在江泽民会见的六国领导人中，西班牙首相阿斯纳尔是上任时间最短的一位，从他就任首相到6月25日与江泽民举行会谈，只有一个多月。会谈中，江泽民指出，在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的新形势下，中西两国应从战略高度处理两国关系，并着眼于21世纪，共同努力在两国之间建立起长期稳定的互利合作关系。

阿斯纳尔首相说，积极发展西中关系一直是西班牙各政党的共识。我们这届新政府也将一如既往地为此作出努力，将西中两国关系推向新的水平。

当江泽民转达李鹏对阿斯纳尔首相的问候和访华邀请时，阿斯纳尔表示感谢并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他说，保持高层互访的势头，对两国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并表示很愿意亲眼看看中国在发展经济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在前一天的下午，卡洛斯国王在欢迎江泽民来访的仪式上，特意请来阿斯纳尔首相，三人合影留念。这一不同寻常

的举动，是在向公众表明，国王希望5月刚刚开始执政的阿斯纳尔首相及其内阁一如既往地保持并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看来，国王与首相在发展同中国的关系问题上态度是完全一致的。

6月25日下午，江泽民在下榻的国宾馆帕尔多宫会见西班牙企业界代表。20多位代表无一不是大企业或大银行的总裁，他们都热切地希望江泽民的访问对业已开展起来的两国经贸合作注入新的活力。

江泽民说，今天在座的各位企业家、金融家，为发展双边经贸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江泽民向大家介绍了中国的经济形势和发展前景，并表示支持西班牙企业界到中国中西部地区寻找合作机会。他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希望你们能够抓住机遇。

西班牙企业家协会主席奎瓦斯说，中国成功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两国企业界的合作提供了许多机会和良好的条件。西班牙企业家将坚定不移地继续为推动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做出贡献。他表示，西班牙企业家协会不久就要组团访问中国，寻求合作机会。我们不仅重视发展同中国沿海地区的经贸合作，而且还将致力于开发同其他地区的合作。

会见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过了一个小时，由于江泽民还有重要安排，大家依依惜别。企业家们纷纷表示，江主席的讲话增强了西班牙企业界同中国进行合作的信心。西班牙阿尔莎集团总裁古斯曼说，江主席对中国中西部地区情况的介绍，为我们指明了一条发展参与中国的经济技术合作的新路。

挪威船级社是世界三大船级社之一，不久前他们把驻亚

洲分部的总办事处由新加坡迁到了上海。6月28日下午，江泽民在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的陪同下，来到总部在首都奥斯陆郊外赫维克的挪威船级社。

江泽民刚一走进院子，立即受到船级社幼儿园的小朋友及院内人员的热烈欢迎。在会议室，总裁孙欧灵为了表达对江主席的敬意，用刚刚学会的汉语一字一字地说道：“尊敬的江主席和国王陛下，女士们，先生们，我今天非常荣幸地欢迎各位贵宾光临挪威船级社。”

在参观一间实验室时，孙欧灵介绍说，这个实验室是用一种抗噪音干扰的新材料构成的。江泽民饶有兴趣地走进全封闭的实验室，并用英语说：“早在30多年前，我曾负责过类似项目的研究，当时如果我们有这种材料就好了。”孙欧灵对江泽民的专业知识十分佩服，他说：“主席先生，您的知识真渊博，看来都不需要我的介绍了。”

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为中挪两国的经贸合作开辟了良好的前景。6月28日，20多位挪威最有实力和信誉的企业家在听完江泽民的讲话后，兴奋地表示要抓住机遇，与中国同行展开积极有效的合作。

江泽民在下榻的萨斯饭店与企业家会见时，向他们介绍了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的发展前景。江泽民指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必将进一步扩大中国同包括挪威在内的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合作，为国外投资者和客商提供巨大的市场和更好的合作条件。中国和世界日益广泛的经济交往，不仅将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江泽民表示，我们热忱欢迎挪威更多的企业家到中国开

展各种形式的经贸合作，也衷心希望挪威企业家在中国市场上进一步提高竞争能力，以长远的战略眼光不断开拓新的合作领域。

挪威总工会和工商联合会的负责人表示愿与中国同行一道，继续推动两国企业界之间的合作，以实际行动促进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

6月29日晚，罗马尼亚总统府统一厅内洋溢着热烈友好的气氛。伊利埃斯库总统在这里举行盛大宴会，热烈欢迎江泽民访罗。

江泽民在致词中说，中罗两国人民始终友好，这种友谊是我们共同的宝贵财富。近年来，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不断发展。江泽民强调指出，中国政府和人民十分珍视同罗马尼亚的友谊。我们希望中罗两国和两国人民永远是好朋友、好伙伴。我们愿意和罗马尼亚朋友共同努力，把一个充满活力、全面发展的中罗友好合作关系带入21世纪。

伊利埃斯库总统说，中国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中国人民，也有利于地区和国际的和平、稳定与合作。他满意地指出，建立在国际法公认的普遍原则和准则以及罗中两国人民长远利益和相互尊重基础上的罗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正在不断向前发展。

在7月1日的正式会谈中，两位元首又一致认为，双方都要从面向21世纪的高度来看待和处理中罗关系，继续保持经常性的高层接触，把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推向一个新的水平。

对年代初，江泽民在罗马尼亚工作过一年多，结识了许

多罗马尼亚朋友。20多年后，江泽民故地重游，在紧张的日程安排中，特意挤出时间，在下榻的罗马尼亚一号国宾馆会见他在罗工作期间的老朋友。

7月1日晚，江泽民一见到这些老朋友，便准确地叫出每个人的名字，和他们亲切握手，热烈拥抱。江泽民对20多年前的那段往事记忆犹新，甚至与谁何时何地第一次见面都记得一清二楚，令在场的人非常感动。江泽民说，天下之事变化很大，但中罗人民的友谊始终没变。“人生何处不相逢！我这次访问贵国，能再次见到大家，心里格外高兴。”会见中，江泽民不时用罗语同老朋友交谈，罗马尼亚朋友也不时用汉语对话，老朋友之间格外亲切，显得无拘无束。

罗马尼亚友人知道江泽民喜欢罗马尼亚诗文，特意向江泽民赠送了罗著名诗人埃米内斯库的诗集，江泽民非常高兴，即兴背诵了埃米内斯库的诗《你为什么不到我这里来》，还同一位罗友人合唱了用这首诗谱成的歌曲。江泽民余兴未尽，又用钢琴弹起了罗马尼亚古浪漫曲《妈妈昨夜把家还》，大家也跟着唱了起来。

当年给江泽民当过翻译的切尔特让女士高兴地说：“中国国家主席在紧张的访问日程中特意会见我们这些普通的罗马尼亚人，这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的友谊，更是两国和两国人民友谊的体现。”

7月3日中午，塔什干飞机制造厂迎来了一位最尊贵的客人——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

当江泽民在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陪同下，冒着38摄氏度的高温来到该厂总装车间时，库切罗夫总经理热情地

迎接中国贵宾的光临，陪同江泽民等进入车间，并介绍工厂的情况。

江泽民一边听取主人的介绍，一边在飞机起落架等部件前驻足端详，还不时提出一些技术问题。当江泽民了解到开发民用产品是飞机厂的重要生产方面，并看到了车间里摆放的不锈钢厨具及橡胶游艇等民用产品时，江泽民说：“我们的企业也在这么做。”在露天场地看完伊尔飞机舱门自动开启的表演，江泽民意犹未尽，又向主人询问了飞机的推力、最大装载量等问题。

库切罗夫总经理深有感触地说：“江主席参观得很仔细，很认真，我相信他的来访不仅将推动两国在航空领域的合作，而且还将为两国经贸合作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进一步同中国发展各领域的合作。”

其实，这同样也是两国元首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当天两国签署了5项合作文件，为两国经贸合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两国元首的正式会谈中，江泽民说：“不断扩大和发展经贸合作，促进共同繁荣，是中乌双方的共同愿望。我们对此充满信心。”卡时里莫夫总统表示，乌希望看到更多的乌中合资企业和更多的中国商品进入乌市场。

蔚蓝的天空，长长的红地毯，玛纳斯讨翘首等待着中国国家主席的光临。

7月4日中午，当江泽民冒着似火骄阳，在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的陪同下，笑容满面来到位于首都比什凯克南部的“玛纳斯村”时，数千名身着艳丽民族服装的“对民”

载歌载舞，欢迎中国贵宾。几名少女向江泽民献上面包、盐和鲜花，表达吉尔吉斯人民的深情厚谊。

在村中心的高岗上有几座吉尔吉斯风格的毡房。在毡房前的台阶上，身穿民族服装的吉尔吉斯乐队弹奏着欢快的乐曲。当江泽民走近乐队时，一位女歌手演唱起吉尔吉斯民歌《我美丽的土地》，热情迎接江泽民和阿卡耶夫总统。歌毕，阿卡耶夫总统又挽起江泽民的手臂，登上高高的台阶，步入充满乡土气息的毡房。

毡房内铺满富有民族特色的地毯，陈设着吉尔吉斯家具和工艺品。两位领导人走进右手的侧毡房，在尊贵客人坐的一块红棉被上并排而坐。江泽民用熟练的俄语说：“我去过我国新疆和内蒙古的毡房，那里也是这样盘腿而坐。”阿卡耶夫总统望着江泽民熟练坐下的动作，笑着说：“您坐下的样子像个真正的吉尔吉斯人。”江泽民也笑着称赞阿卡耶夫总统戴的吉尔吉斯传统白毡帽既遮阳，又凉快。

走出毡房，江泽民又和阿卡耶夫总统在村子里种下一株象征两国人民友谊的天山云杉。两位国家元首一起为云杉树填土浇水。阿卡耶夫总统一边浇水一边对江泽民说：“这棵云杉将茁壮成长。您下次来时，它一定会长成参天大树。”江泽民用俄语说：“我相信。”周围的人都热烈地鼓起掌来，友好的气氛达到高潮。

人民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吉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谊一定会像云杉一样长成参天大树。就在上午举行的正式会谈中，两国元首一致表示，应立足于 21 世纪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面向未来，以扎扎实实的行动共同构筑两国长期稳定的友好

合作关系。

“议员先生们，我很抱歉，耽误你们休假了！”流利的俄语，风趣的开场白，立即引来一片欢笑声和热烈的掌声。

这是7月5日下午出现在哈萨克斯坦议会大厅的一幕。当天江泽民在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陪同下，来到议会大厅，发表题为《共创中国和中亚友好合作的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为了聆听江泽民的演讲，本应在6月28日开始休假的哈上下两院议员把假期整整推迟了一周。

江泽民就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哈关系、中国在核武器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关系、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南北对话等问题，言简意赅、高屋建瓴地阐述了中国的立场和观点。演讲多次被热烈的掌声打断。

江泽民的演讲在哈议员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上院议员阿巴尔金说：“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有着近千年的交往历史，两国山水相连，有着很大的合作潜力。江泽民主席表示中国愿意永远做中亚各国人民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表示出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的强烈愿望。中国国家元首选择哈萨克斯坦议会发表演讲，体现出中国人民对我们的尊重和友情，令人感动。”

议员别里柯巴耶夫对江泽民关于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的阐述极为欣赏。他说，中国是第一个全面提出力口强南北对话的国家，我们完全赞同江主席的观点。哈中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两国应加强合作，协调立场，同广大南方国家联合起来同北方发达国家对话。正如江主席所说的，发达国家有责任从经济上帮助发展中国家。

共创中国和中亚友好合作的美好未来，这是江泽民中亚之行的主旨和目的。阿拉木图议会大厅爆发的阵阵掌声使人确信，中国永远和中亚各国人民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也正是中亚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乌克兰是欧洲有影响的大国，它的面积和人口与法国相差无几，历史悠久，资源丰富，经济、科技基础良好。1994年9月6日至8日，江泽民访问了美丽的乌克兰。

中乌分处亚欧两洲，相距遥远，但是两国人民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和传统的友好情谊。新中国成立之初，来自乌克兰的专家曾参与了我国100多个大型工业项目的建设，并为我培养了不少专业技术人才。1991年底乌克兰独立时，我国是最早承认并与之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近年来，两国经贸关系得到恢复并不断扩大，乌克兰已经成为中国在原苏联地区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江泽民在开始乌克兰之行时表示，中国十分重视同乌的关系，他此次访问的目的就是要同乌领导人一道，“从面向21世纪的高度，共同探讨进一步发展两国互利合作的途径，开创两国关系的未来。”

在48小时的“短暂而重要”的访问中，江泽民同乌总统库奇马及其他领导人进行了有成效的会谈，双方签署了两国联合声明。中乌海运合作等5个合作文件。

中乌两国在经济上有很强的互补性，但是双方目前的合作水平同两国的合作潜力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为此，两国领导人决定增加在各个层次、各个领域的交往，特别是要推动两国有实力有信誉的企业之间的合作，使两国经贸关系持续

稳定地向前发展。

两国领导人还就重大的国际政治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共识。双方一致认为，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应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反对在国际关系中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乌克兰重申：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确认不同台湾建立官方关系。中国则重申承认和尊重乌克兰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赞赏乌克兰在核问题上所采取的积极步骤，对乌关心自身安全并要求提供安全保障和获得财政技术援助表示理解。

库奇马总统高度评价江泽民主席对乌克兰的访问，称此次访问是乌中关系的“里程碑”，为两国进一步合作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并称两国是“特殊伙伴关系”。他认为，两国“开展务实的经济、政治合作的时机已经到来。”

编织中国与东西欧友谊的长虹

1994年6月29日至7月12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应邀对奥地利、德国和罗马尼亚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李鹏此次出访欧洲三国，是第一位中国政府首脑访问奥地利，中国总理第一次访问重获统一的德国，也是中国领导人近年来第一次出访东欧，由此成为中国的一次重大外交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李鹏的出访，编织了中国与东西欧的友谊长虹。

这次李鹏作为国宾，带着中国人民对奥地利和德国人民的友好之情，对两国进行了为期 11 天的正式访问，意义重大，备受世人瞩目。奥地利总理弗拉尼茨基、德国总理科尔都曾作为李鹏总理的客人访问过中国，双方对在北京友好会见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作为回访，从李鹏踏上这两个友好西欧国家，就受到了热情、隆重、周到的欢迎和接待。老朋友重逢，宾至如归。弗拉尼茨基和夫人破例全程陪同李鹏总理和夫人访问。在奥地利萨尔堡机场的欢送仪式同欢迎仪式一样热情隆重。李鹏与弗拉尼茨基总理相约，下次在北京见面。

科尔总理对李鹏的接待也是细心周到的。为显得对贵宾的接待更亲切些，科尔总理夫人 7 月 4 日上午专门邀请李鹏夫人朱琳到家里喝茶。当晚，在科尔为李鹏举行国宴的同时，科尔夫人为朱琳和随行的中国女同胞举行家庭晚宴，气氛亲切热烈。

科尔与李鹏的会谈，可用坦城、友好、亲切 6 字概括。会谈中，两国领导人谈到人权问题，但气氛是友好和真挚的。科尔说，欧洲总有一股势力攻击中国，他是坚决反对的。他很赞赏李鹏在维也纳讲话中关于中国愿意就人权问题进行平等善意的对话，反对借人权干涉别国内政的内容。科尔表示，德国愿意本着友好的、充满信任的、谨慎的精神同中国进行建设性的对话。科尔还说，他下次访华时想多看些地方，特别是想看看中国的山东。李鹏表示欢迎，并说：“我们既在北京见面，也在山东见面。”科尔总理对李鹏的生平表示浓厚兴趣，为此，李鹏送给科尔一本杨建业著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

有限公司出版的题为《李鹏》的书并介绍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科尔说，他同李鹏的谈话非常愉快，表示今后有事时将直接写信给李总理。李鹏表示赞同。在夫人们的聚会上，应科尔总理夫人的要求，朱琳介绍了中国妇女儿童的现状，并解答了外国朋友的一些问题。在场的中德两国朋友边听边议，气氛十分热烈。德国朋友对朱琳的介绍表示感谢。

中罗两国人民有着传统的友谊。这种友谊不仅表现在中罗建交以来长期保持友好的合作关系，也表现在中国总理与罗马尼亚总统个人的身上。

罗总统扬·伊利埃斯库同李鹏早年都在莫斯科动力学院学习，曾经是同班同学，并在一起实习过，1991年伊利埃斯库访华时，曾同李鹏举行过会谈。不久前，伊利埃斯库总统访问我国南方经济特区时，李鹏还专门就搞好接待工作提出了要求。此次李鹏应邀访罗，两位有着老同学情谊的领导人相逢在布加勒斯特，更是格外高兴。李鹏抵达布加勒斯特后，正赶上下雨。据说那里久旱无雨，客人同主人一样为这场及时雨而高兴。伊利埃斯库总统冒着大雨在总统府广场为李鹏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李鹏感谢伊利埃斯库总统和沃克罗尤总理的盛情邀请，使他有幸访问罗马尼亚。在两国领导人会谈前后，伊利埃斯库总统曾两次向在场的记者发表谈话，表达他本人和罗人民对发展罗中友好合作关系的美好愿望。李鹏的罗马尼亚之行是近年来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出访东欧，舆论界普遍认为此访的意义非同寻常。李鹏一行在访罗期间深切感受到诚挚、友好的热烈气氛，度过了“十分愉快、令人难忘”的时光。罗马尼亚报纸以《罗中深厚友谊》、《老

同学的会见》、《热烈的期盼》等标题报道此次访问，可见中罗友谊扎根于中国和罗马尼亚人民心中。

李鹏此次出访德国和奥地利的一大特点是有 30 多位中国大型骨干企业和进出口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随访。经济外交色彩浓厚。世界各国首脑出访，经常有大型企业代表团随访。我国政府总理出访，组成为数众多的大型企业家代表团随访尚属首次。

访问期间，李鹏在繁忙的活动中，亲自提议安排会见奥地利企业家，在德国向德经济界发表了演讲，这使奥、德商会的会长及广大企业家感激不已。李鹏的安排正是他们所期待的，他们认为中国总理这一决定本身就足以证明两国经贸关系的密切，也生动地表达了中国对发展同奥、德的友好关系的真诚愿望。

7 月 1 日上午，奥地利商会大厦沙林格大厅里座无虚席，奥企业家和随访的中国企业家济济一堂。在热烈的掌声中，李鹏走上讲台，首先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两天来，中奥两国经济合作成果丰硕，双方签订了 17 个协定、合同和意向书。总金额近 6 亿美元。中奥双方对此都十分高兴。这一好消息，使在场的两国企业家掌声雷动。

接着，李鹏建议将这次会见改为座谈，希望大家提问题。这一建议赢得了大家的赞同。在 1 小时的时间里，他回答了奥企业家提出的一个个问题。他还应主人的要求，全面介绍了中国的经济情况，会场上不时发出阵阵欢笑和掌声。奥商会会长马德塔纳说，奥商界非常重视中国企业家随李鹏总理来访，他感谢李鹏总理给他们带来了历史上最大的企业家代

表团。

7月5日，李鹏向德国工商界发表演讲又是一派热烈的场面。会场内外聚集了来自德国各地的著名企业家、经济界要人和中国企业家。在李鹏抵达会场之前，中德企业界已在此签订合同和协议22项，总金额44.3亿美元。

中国企业家同德国企业家一同聆听了李鹏的精彩演讲和答问，会场气氛热烈。与会者神情专注，既流露出对过去合作的满意之情，又表现出对今后合作的更大期待。

柏林的采政莲宫之所以闻名遇这，不仅仅因为它是本世纪初仿照英式乡村别墅建造、并以女王储名字命名的建筑，更重要的是1945年7月，美、苏、英三国首脑在这里会晤，签署了著名的《波茨坦协定》。后来，人们在原会址建成纪念馆，供人参观，由此使这里成为旅游胜地。

李鹏在勃兰登堡州州长的陪同下来到这里，参观了当年美、苏、英三国首脑签字大厅。

李鹏用德语向记者们问好，州长把李鹏引进来改莲宫饭店的元帅厅。参观中，李鹏详细询问了斯大林、杜鲁门、艾德礼当时的座位及签字时的具体情节。当时州长给李鹏出了一个难题，询问他愿意坐在美英苏三个首脑坐过的哪一个座位上，李鹏稍加思索后拉开苏美首脑主椅之间的一把辅椅坐下来，李鹏的夫人朱琳也紧挨着坐了下来，李鹏说：“这表明了什么呢？我没有坐在杜鲁门（美国）一边，也没有选苏联那一边。现在苏联已没有了，但是我们和俄罗斯是友好邻邦，两国关系正不断发展。我们与美国的关系也有所改善。至于那一边（指对面英国主座）我就不想多说了。”周围的人笑起

来。李鹏走出采琪莲宫时，他对围上来采访的记者们说：“我们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进行了友好的谈话。”这句寓意深刻的话语，使人回味无穷。

7月已日上午，李鹏一行来到德国著名的西门子公司总部参观。这是一处园林式的建筑群，格外清洁美丽，为迎接中国贵宾的到来，悬挂了彩旗和“欢迎李鹏总理”的中文横幅，公司负责人一清早就检查了准备工作，生怕有一点疏漏。

李鹏的到来，使西门子公司全体员工格外激动，整个公司沉浸在节日一般的气氛之中，曾几次访问过德国的李鹏对西门子公司十分熟悉。他回忆起当年与西门子公司关于核电设备的谈判情景时说，西门子公司设备不错，但价格高了一点，结果没有谈成功，合作被法国法玛通公司拿去了。他希望在今后的竞争中西子公司能取得银行界的支持，给予优惠贷款，那么和西门子公司合作将前途无量。李岚清副总理也谈到，西门子的技术无可怀疑，但价格高了一些，若是把德国技术设备、质量控制和售后服务与中国的低成本生产相结合，就会生产很有竞争力的产品。

西门子公司董事长皮勒博士说，和中方伙伴谈价格是极其艰苦的，对中方伙伴的精明表示钦佩。宾主轻松愉快的交谈在会场上引起阵阵笑声。李鹏说，中国还有句话，叫“在商言商”，现在我们来到西门子公司，就是谈经济，谈技术，但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就是最大的政治。他的这番话，再次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

李鹏出访欧洲三国，首先成为三国新闻记者竞相追踪报道的“头号新闻人物”。李鹏分别接受了三国记者的单独采访

或联合采访，其中也不乏活泼有趣的情节。

李鹏在布加勒斯特接受罗新社等7家当地新闻记者采访时，有一天记者提问：我可以请您就罗马尼亚的酒发表一点评论吗？李鹏笑答：当然可以。前天我们参观葡萄酒研究站时品尝了各种酒，我比较喜欢红葡萄酒，甜度只有4度，不过我们的李岚清副总理对罗马尼亚葡萄酒的出口价格有点不平。李岚清接过话说：罗马尼亚的葡萄酒质量不错，但出口价格每瓶只有半个美元，太便宜了，不能说是公平交易。这也反映了世界贸易中存在的问题。

李鹏在接受德国《商报》主编采访时，记者提问：总理先生，在同中国做生意中，存在一些困难，有些是中国官僚主义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由于人民币近来贬值较快。对此您有何评论？李鹏在回答中实事求是地讲清了人民币贬值是一种误解，外商来华投资已经增加。说到官僚主义，李鹏说在你们这样一个效率高的国家，这次访问期间我听到不少企业家也抱怨你们政府部门的官僚主义。你们没有听过这样的抱怨吗？记者听后点头称是，说德国的官僚主义也不少。记者又问：在技术转让方面，德国是否比日本更开放呢？李鹏回答：各有所长吧！您要知道，在一个国家评论另一个国家，这不是中国人的传统习惯。记者又提问：你们的人代会代表太多，一年只开一次会，今后是否要予以改变？李鹏答：在回答您关于中国人民代表大会问题之前，我想问问你们的联邦议会的议员是多少？记者答：600人。李鹏接着说：德国8000万人民600名议员，我们近12亿人民3000人大代表，究竟是你们议员多，还是我们议员多？对中国总理的这一反

问，记者回答说：我们德国的议员确实太多了。

李鹏在接受外国记者访问时，也有外国记者就所谓，“释放政治犯”和人权方面的问题提问。李鹏在坚定地表明中国政府观点的同时，答问不乏幽默。有一次李鹏说，西方某些政界人士同我们会晤时，递名单似乎成了一种时尚。动不动就递上个少则十来人、多则上百人的所谓在押人犯名单。我出于礼貌收下了，有关部门费了很大的劲认真地去查，结果往往是查无此人。名单中大多数人纯粹是虚构的。今后如再交这样的名单，我国有关部门也只好为付出的劳动收既“劳务费”了。李鹏的坦诚和幽默深为记者们所称道。同样，李鹏在对奥、德、罗的访问中，他对三国历史、人文风情的了解程度，也为三国各界人士所赞佩。

7月9日，李鹏和朱琳一行抵达罗马尼亚的重要海港，位于黑海之滨的康斯坦察。在这里重点考察了农林项目。10日上午李鹏一行来到市郊的穆尔法特拉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参观。

康斯坦察已有近2000年的葡萄种植史，酿造葡萄酒是支柱产业。李鹏详细询问了生产、经营和出口情况。在公司的陈列室兼品尝室，主人摆上8种不同的酒请客人品尝。正在品尝和亲切交谈之际，主人起立致词：我高兴地告诉诸位，今天适逢李鹏总理和朱琳女士婚庆36周年，让我们用这美酒为他们二位祝福。全场热烈鼓掌并频频举杯。当晚在主人举行的宴会上，康斯坦察县长还特意赶制了一个婚庆蛋糕以表祝贺。这一不是秘密的“秘密”，对在场的许多中国同事来说，也是初次听到，大家都为罗马尼亚朋友在接待工作上表

现的无微不至而赞叹。李鹏深情地说，这不只是对他们夫妇的祝福，而且体现了罗马尼亚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

法国十分期待李鹏

1996年4月9日一大早，巴黎市的居民一起床，打开收音机，听到的第一条重要新闻便是：“中国总理李鹏将于今天下午抵达巴黎。”晚上8点，各主要电视台都在黄金时段播放了法国电视二台记者4月7日在北京对李鹏的专访。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一时间成为法国各主要新闻媒体和法国人民关注的焦点人物。

李鹏是应法兰西共和国总理阿兰·朱佩的邀请于4月9日当地时间下午5时整抵达巴黎，对法国进行为期5天的正式友好访问的。这是12年来，首位对法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国总理，也是亚欧会议后法国首次接待的亚洲国家的政府首脑。法国朝野各界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认为李鹏的来访，必将揭开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新篇章，并将给亚欧两大洲的合作带来具体成果。

法国外长德沙雷特在李鹏访法前夕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表示，李鹏的访问将对推动两国关系起决定性的作用，并表示法国政府愿意同中国政府对话，愿意越过分歧去寻找共同点。法国前总统德斯坦高度评价李鹏的访问，他认为作为欧盟创始国的法国和亚洲大国的中国，“可以作为亚欧两大洲相互联系的桥梁”。

法国国民议会法中友好小组主席佩雷菲特在最有影响的大报《费加罗报》发表评论文章《历史翻过一页》。文章写道，李鹏很熟悉我们的国家，他是我们的贵宾，让我们表现出应有的礼遇，以免法国再失良机。雪铁龙汽车公司在访问前夕，还专门向当地中文报纸《星岛日报》连续两天买下半版广告，以“促进经贸合作，发展中法友谊”作为对李鹏来访的欢迎辞。法国各大报纸纷纷发表文章，评论李鹏的访问，介绍中国，介绍李鹏。《法兰西晚报》评论说：“从经贸角度来说，中国是绕不过去的。”《人道报》说：“李鹏访法是不能漠视的。李鹏的政府领导着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国，而且15年来，每年经济增长达10%。”《十字架报》以醒目标题《法国十分期待李鹏》进行报道，《回声报》则用上大幅标题《法国期待李鹏访问带来几十亿法郎》。各大报纸还从不同角度向读者介绍李鹏的生平：“烈士子弟、留苏学生、水电专家、教委主任……”《法兰西晚报》的一篇评论说：“李鹏只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念头：使12亿同胞得到温饱。”

李鹏在短短5天时间里，争分夺秒地进行了大量的会谈和会见。李鹏与法国总统希拉克、总理朱佩进行了富有成果的正式会谈，李鹏会见了法国参议院议长莫诺里、国民会议长塞甘、前总统德斯坦、前总理巴拉迪尔、前总理特使弗里德曼，还会见了包括外交部长、经济部长、财政部长在内的多位内阁成员，会见了法中2000年协会主席、雪铁龙汽车公司、法国电力公司。阿尔斯通——阿尔卡泰尔公司、通用电器阿尔斯通公司、法马通公司等众多法国大公司的负责人，会见了法国著名华人企业家和中文报纸《欧洲时报》的负责

人，出席了法国工商会的午宴并发表重要演讲，接受了法国主要新闻媒体记者的联合采访，还前往法国南部城市图卢兹参观了法国宇航公司和欧洲空中客车飞机公司的装配线和培训中心。

李鹏在法国访问期间受到极高的礼遇。仅摘取其中的几个片断就可充分说明这一点。

4月10日下午，李鹏前往法国外交部大楼同朱佩总理会谈。会谈前，朱佩在大楼前主持仪式欢迎李鹏的来访。当李鹏的车队抵达外交部时，朱佩早已在门口迎候。李鹏下车后，军乐团奏乐，李鹏在朱佩的陪同下踏着红地毯，检阅仪仗队，步入外交部大楼，举行了会谈。此前的4月9日17时，红地毯就已铺到了李鹏专机的舷梯旁，法国工业和邮电部长博罗特拉在机场代表朱佩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一次访问，举行两次欢迎仪式，这种礼遇是罕见的。

按原定日程，李鹏与希拉克的会谈安排在4月11日中午举行。但是为了体现双方经贸合作的成果，在会谈前临时又安排了一项重要活动——两人一同在总统府爱丽舍宫出席两国航空生产领域的一项合同的签字仪式。一大早，李鹏乘坐的汽车刚刚停稳，希拉克立即从爱丽舍宫的台阶上快步下来，走到汽车右侧门前，与李鹏热烈握手，互致问候。随后两人一同踏着红地毯进入爱丽舍宫。

签字仪式结束后，希拉克陪同李鹏从签字厅一直走到汽车跟前。李鹏坐进车后，希拉克又破例亲自为李鹏关上车门，并目送汽车走远。这种礼遇在外交场合恐怕是绝难见到的。正式会谈时，希拉克又热情地说，我对阁下的欢迎并不是外

交辞令，而是发自内心的真实感情。

4月12日上午，李鹏会见法国前总统德斯坦。一见面，两人从老远就伸出手，快步向前，热情握手。德斯坦十分高兴地用刚刚学会的汉语朗声说道：“总理先生，你好！”气氛一下就达到高潮。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一直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自戴高乐执政以来，法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冷战结束以后，两国都适时地调整了外交政策，都乐于见到世界朝多极化趋势发展，而反对由一国或者一个集团来主宰世界。这一系列共同之处表明两国在加强政治对话与协商、合作方面有着良好的基础。事实上，中国政府一贯重视发展同法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希拉克就任总统以来，亲自定下两国关系的基调——“长期性的、政治性的伙伴关系”，使两国关系迅速发展。

访法期间，李鹏在与法国领导人的会谈中指出，中法两国应建立长期的战略伙伴关系，应从世界大局、从中欧关系的高度来考虑发展中法双边关系。这些主张都得到了法国领导人的一致赞同。双方领导人一致认为，两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方面负有共同的责任；都希望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与合作，在裁军、地区安全等重大国际问题上保持密切的定期磋商；双方都认为中国应尽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反对把这一问题政治化。由于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国情不同，双方在人权等问题上存在分歧。李鹏表示，中国愿意就这些问题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对话，但反对借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这些主张得到了法国方面的理解。正如法

国外长所说，双方愿意越过分歧寻求共同点。可以说，这次访问在加深相互了解、增加相互信任。扩大彼此间的共识，从而促进相互合作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中法两国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不仅造福两国人民，有助于建立亚欧两大洲之间的新型伙伴关系，也有助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李鹏这次访问法国在促进两国经贸合作关系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果。这集中体现在两国签署了总额达 24 亿美元共 13 项经贸合作的合同、协议和意向书，涉及农业、汽车、航空、航运、化工、机械、能源、交通等众多领域。其中最引人注目目的是金额达 18.9 亿美元的购买 3 架 A340 空中客车飞机和 30 架 A320 空中客车飞机的协议与合同。这一系列合同与协议的签署是李鹏访问法国的重大成果，也是两国在经贸方面加强合作的愿望的具体体现。两国政府和经济界人士都表示相信，以这次访问为契机，两国经贸合作将朝着更加积极务实，更加富有成效的方向发展。法国参议院议长莫诺里说，欧美其他国家在中国的投资额和市场占有率都超过法国，法国应奋起直追。这次李鹏来访对法国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机会。法中委员会主席德乔治表示，我们正在并将继续积极推动法国企业与中国进行合作。法国雪铁龙汽车公司总裁卡尔韦说：“我们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我们的合作可持续 100 年。”

4 月 10 日上午，李鹏会见了雪铁龙汽车公司总裁卡尔韦。会见结束后，卡尔韦向李鹏赠送了一辆最新型的雪铁龙小轿车，两人一起坐进驾驶室，接受记者摄影、摄像镜头的

追踪。

从驾驶室出来后，李鹏意味深长地对卡尔韦说，要两只脚稳稳地站在地上发展。两人握手告别时，李鹏又对卡尔韦说：“你记住我一句话，中国经济大发展的时候，也就是神龙（中法合资小汽车工厂）在中国大地立足的时候，而且超规模化经营，经济价值就越高。”最后又用法语肯定地说：“完全是这样的。”卡尔韦连连点头称是。

委员长首访西欧三国

应德国联邦议院主席团、瑞士联邦议会国民院议长格雷特·哈勒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菲舍尔的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于1994年1月16日至30日对德国、瑞士、奥地利三国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受到了三国隆重、热情、友好的接待。

这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对西欧国家的首次访问，也是我国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对外欧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

行前，乔石在北京会见西欧三国驻华大使时说：“我非常高兴有机会访问西欧三国。虽然这次访问正处于寒冷的季节，但我们将满怀热情到你们的国家访问。”

访问期间，乔石向对方介绍了我国改革开放15年取得的成就和当前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特别是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方面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和长远规划。三国领导人对此给予高度评价。

1月16日至23日，乔石对德国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在8天的访问中，乔石与德国总统魏茨泽克、总理科尔、联邦议院议长聚斯穆特沙、外长金克尔等德国领导人举行了广泛的会谈，并会晤了德国经济界知名人士，参观访问了德国宇航空中客车、奔驰、宝马、西门子等一些与中国有广泛合作关系的大型企业。1月19日，乔石在接受“德国之声”电台采访时说：“一个改革开放的中国与一个统一和爱好和平的德国进行友好合作，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贡献。”德国总理科尔沙十长金克尔重申支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并支持恢复中国关贸总协定缔约国的地位。乔石这次对德国的访问，不仅是中国全国人大和德国议会间的高层交往，而且对进一步发展中德两国政治、经济和其他各个领域的合作也是有力的推动。

瑞士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正式同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且月23日至26日，乔石对瑞士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访问期间，乔石分别与瑞士联邦主席施蒂希、联邦议会国民院议长哈勒、联邦院议长雅格梅蒂、联邦委员兼外长科蒂等瑞士领导人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会晤了瑞士知名人士，参观访问了世界闻名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和苏黎世证券交易所。瑞士联邦主席施蒂希等领导人表示，瑞士将进一步扩大与中国在各个方面的合作。乔石对瑞士的访问，结识了瑞士联邦议会和政府的领导人以及各界朋友，进一步推动了两国和中国人大与瑞士联邦议会的友好关系的发展。

奥地利是乔石西欧三国之行的最后一站。1月26日下

午，坐落在蓝色多瑙河畔的世界音乐之乡维也纳迎来了来自中国的友好使者。乔石在为期4天的对奥地利的正式友好访问期间，分别会见了奥地利总统克萊斯蒂尔、总理弗拉尼茨基沙长莫克，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菲舍尔和联邦议会议长格斯特尔分别举行了会谈，奥地利领导人表示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赞扬中国走根据自己的情况发展民主的道路，强调奥地利将更多地注意同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的关系。

出访西欧三国期间，乔石强调，中国一贯重视发展同包括德国、瑞士、奥地利在内的西欧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真诚希望这种关系在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互不干涉内政和平等互利基础上，得到长期稳定的发展。三国领导人表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具有重要影响，三国重视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并表示要进一步发展三国议会同中国人大间的关系，扩大相互间的交流与合作。三国企业界人士对进一步发展同中国的经济贸易关系，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热情。

在同三国包括一些地方领导人的会见交谈中，不少人提到了人权问题。乔石阐明了我原则立场，分析了人权问题必须同各国的实际情况和人们最关注的迫切问题联系起来看，得到了对方的尊重。

乔石在出访西欧三国期间，先后看望了中国驻西欧三国大使馆工作人员、驻日内瓦和维也纳联合国和国际组织代表团成员、其他驻外机构人员以及留学生、华侨和华人代表等。在日内瓦参观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时，著名美籍华裔物理学家丁肇中教授向乔石介绍了几位来自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科学家，并说其中一些科学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引起

国际上的重视。乔石高兴地称赞他们是国家的宝贵人才，勉励他们继续努力工作，不断攀登科学高峰，为人类文明和科技进步作出新贡献。

1月30日下午5时20分，乔石圆满结束对西欧三国为期15天的访问，乘专机离开维也纳回国。乔石这次访问西欧三国，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对于推动我国同三国关系的发展，促进西欧国家进一步改善对华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

李瑞环在瑞典饮 250 年前的中国热茶

1994年5月6日，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乘专机抵达瑞典第二大城市哥德堡，开始对瑞典王国进行为期4天的正式友好访问。

瑞典是李瑞环此次出访北欧4国和比利时的第三站。当晚，哥德堡市长斯卡格在市政厅举行宴会，欢迎李瑞环访问哥德堡。席间双方分别致辞，盛赞中瑞之间和上海市与哥德堡市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李瑞环说，瑞典与中国有着悠久的友好交往史。早在250多年前，第一艘前往中国的瑞典商船就是从这里起航的，来自中国的货物从哥德堡运到其他城市。近年来，哥德堡发挥其尖端工业的特长，在同我国的贸易和经济合作关系上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哥德堡与上海结为“姐妹城市”后，友好合作关系有了长足的发展，他说：“我知道，斯卡格市长本人曾多次访华，是中国的好朋友，我们对哥德堡市政府和斯卡

格市长为促进中瑞友好合作关系所做出的努力表示赞赏，并愿通过你们向哥德堡市人民转达中国人民的致意。”

李瑞环说：“我本人在 80 年代曾来瑞典和哥德堡市访问过，你们发达的经济，美丽的风光和好客的人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次旧地重游感到格外，亲切。我希望，我们此次对瑞典和贵市的访问，将进一步加强中瑞友好合作关系。”

斯卡格市长说，瑞典在历史上与中国就有贸易往来，瑞中友好合作关系源远流长。在瑞中交往中，哥德堡是重要“门户”。哥德堡和上海是“姐妹城市”，双方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关系发展较快。他说：“近 10 年来，我多次访华，中国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国际贸易的发展有赖于中国。”

斯卡格说，瑞典在技术和管理方面有优势，中国也有自己的长处，双方合作潜力很大。国家间真正的合作是双向的。他希望李瑞环此次访瑞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瑞中两国的关系，特别是哥德堡与上海之间的经贸关系的不断发展。

5 月 7 日上午，李瑞环来到约塔河畔的泰拉挪瓦船厂，参加了新哥德堡号仿古帆船的开工典礼。

新哥德堡号帆船是根据 250 多年前从中国返回的哥德堡号帆船仿制的。哥德堡号属于代世纪同中国开展贸易的瑞典东印度公司。这家公司曾多次派船去中国，把中国的陶瓷、茶叶、地毯等货物运到瑞典。哥德堡号是这些帆船中的一艘，于 1745 年在由中国回到哥德堡时，不幸在约塔河口附近沉没。现在，哥德堡市决定重新仿造一艘船，并计划由哥德堡

启航，沿当年的航线驶往中国。

新哥德堡号基金会在船厂举行了隆重的开工仪式。身着古代服装的士兵持枪列队欢迎李瑞环。李瑞环从哥德堡市长斯卡格手中接过点火线，亲自点燃了开工的礼炮。随着轰隆一声巨响，欢呼声四起，士兵们鸣枪致意。接着，中国驻瑞典大使杨桂荣和瑞典驻中国大使林德思为船厂大门揭幕。此前，李瑞环还参观了哥德堡号沉船打捞物品展览。李瑞环兴致勃勃地品尝了用 250 多年前的茶叶泡的热茶。据介绍，自 1986 年以来，打捞上来的茶叶已有 370 吨。因北海盐分低，茶叶仍可饮用。李瑞环饮后说：“像是福建的红茶。”中午，新哥德堡号基金会设宴招待了李瑞环及其一行。

当晚，瑞典沃尔沃汽车公司副总裁列纳特·耶安松在哥德堡举行晚宴，欢迎李瑞环。宾主共同表示将进一步推动沃尔沃公司与中国企业的良好合作关系的发展。

李瑞环说，中瑞两国虽相距遥远，但中国人民对贵国并不陌生。瑞典发达的工业和一些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企业在中国有相当高的知名度，沃尔沃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李瑞环指出，当前，中国正在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努力，中国经济正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交通是中国优先发展的领域之一。瑞典和贵公司在这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和一定的优势。我们高兴地了解到中国的一些企业已同贵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李瑞环表示相信，本着平等互利的精神，沃尔沃公司同中国企业之间的合作一定能取得更大进展。

此前，李瑞环参观了沃尔沃汽车公司的生产车间和样车

展览。沃尔沃汽车公司是北欧最大的企业，以生产汽车和发动机为主。

5月8日上午，李瑞环结束了对瑞典第二大城市哥德堡的访问，乘专机抵达首都斯德哥尔摩。

李瑞环在机场发表了书面讲话。他说：“中瑞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瑞典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最早同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中国人民对瑞典人民一向怀有友好的情谊，对瑞典人民在建设自己国家中所取得的成就表示钦佩。近年来，两国高层互访增多，经贸关系越来越密切。中国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同瑞典的友好合作关系，这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江泽民非洲六国和胡锦涛出访拉美

中国不忽视非洲和拉美

中国和非洲人民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彼此没有任何历史芥蒂。中非人民同命运、共患难，在争取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的长期斗争中，始终相互同情，相互支持。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和一系列非洲国家宣告独立，中非关系进入全面发展的新时期。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非洲民族解

放运动的先驱们，共同奠定了中非友好合作的坚实基础。新一代领导人的相互访问，增进了相互了解，推动中非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中国主张非洲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应当有更大的发言权，国际社会应当认真听取非洲国家的声音，尊重非洲国家和非洲统一组织的意见。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应该切实帮助非洲减轻债务负担，有责任改善非洲发展的外部条件。

中国和非洲国家同属第三世界，都是发展中国家。过去在反帝反殖和反霸的斗争过程中结下浓厚的友谊。

中国一向支持非洲国家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尊严的正义斗争，尊重非洲国家根据本国国情自主选择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支持非洲国家为维护国内稳定与团结、振兴民族经济、促进社会进步所作的努力。

现在国际形势虽然是有大的变化，但在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强权政治、发展本国经济等方面，非洲国家与中国仍需要相互支持，友好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将一如既往地作为非洲国家主持公道，伸张正义。

当前正值新旧时代转折的世纪之交，中非友好关系的全新发展既有中非传统关系作基础，又可依托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国际大环境，可谓天时地利人和齐备。

共同的历史遭遇、斗争经历和历史使命是中非友谊的基础。

新的世界潮流为中非友好合作的加强提供了契机。

非洲国家与中国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相互支持。在世纪之交的历史时刻，中国更加珍视同非洲国家的友

好合作关系。

中非友好关系源远流长，成果丰硕，举世皆知。1995年5月8—22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实现了对非洲六国的正式国事访问。

在亚的斯亚贝巴，非洲统一组织所在地，江泽民发表了面向全非洲的题为《为中非友好创立新的历史丰碑》的重要讲话。

正如非洲国家舆论所说，江泽民的访问“将中非悠久的历史交往和密切的政治关系推向了新的高峰”。江泽民在非洲统一组织的演讲中郑重宣布，中国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巩固和发展同非洲各国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全面合作的国家关系，并提出了五点原则主张。这些原则主张，符合中国和非洲国家的根本利益，也适应了历史潮流和时代的要求，必将为中非友好合作关系注入新的活力。

当然，也要看到，中非关系中仍然存在一些不利因素，中非友好合作的长足发展还面临一些障碍。为了推动中非友好关系再上一个台阶，更好地为各自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服务，以迎接21世纪的到来，中非双方都应该再接再厉，努力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克服困难，排除障碍。

我们要从战略高度重视并加强对非关系和对非工作。

加强对非宣传沟通、交流和磋商工作，扩大在非洲的影响，同时遏制台湾当局在非洲的所谓“银弹外交”，既巩固外交阵地，维护国家统一，又稳定和发展双边关系。

南非是世界闻名的资源大国和非洲头号经济大国，也是非洲其他国家的主要经贸伙伴，市场潜力巨大，战略地位重

要。拓展以南非为中心的南部非洲市场，可以使中国与非洲北、西、中、东地区业已建立的经济联系形成网络，从而覆盖整个非洲大陆。

从新南非来看，第一位黑人总统纳尔逊·曼德拉在对华关系上，历来对我国友好，主张新南非适时与中国建交。他曾一再表示，中国对非国大的斗争有过大力支持，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建设对非国大领导下的新南非也具有现实意义。1992年10月，他曾对我国进行友好访问。1993年8月他公开发表声明称：“我们的政策是明确不变的，当新的民主制度于明年诞生的时候，它会按照我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历史关系行事，会按照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采取的对华关系原则行事。”“简而言之，新南非将在外交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中国的唯一代表。”

南非是台湾当局所谓“建交”伙伴中的最大国家，是台湾当局搞所谓“银弹外交”以图稳住阵脚的重点拉拢对象，因此，拓展南非市场还有利于对南非开展外交工作，打击台湾当局分裂祖国的反动气焰，为维护国家统一作出贡献。

中国与南非尚未建立外交关系，双边经贸合作也刚刚起步，今后还需要多方借鉴其他国家合作的经验和这些国家对外合作的经验，认真地推进各项工作。

据1996年底的最新消息，11月27日，南非总统曼德拉宣布，南非已决定1997年12月底前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全面的外交关系。曼德拉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南非在非统组织、不结盟运动和联合国范围内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而南非对台湾的外交承认是与南非在国际

事务中发挥的作用不一致的。中国已注意到这一表示。

中非关系在世纪之交面临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好时机，我们应该通过努力使中非友好以更加崭新的面貌步入 21 世纪。

中国未来的全方位外交，也必须加强对拉美的工作。

巴西是拉丁美洲最大国家，也是发展中国家中经济实力较强、发展水平较高的大国。它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正以潜在强国的姿态迈步登上世界政治经济舞台。

1992 年上台的巴西新政府调整了原政府急于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过多向美国倾斜的政策，奉行务实的外交政策，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把发展和扩大同亚洲国家的经贸关系与科技合作当做一个新重点，尤其重视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同时保持与美欧和拉美国家的传统关系。

巴西新政府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发展中国家做出了榜样。目前，拉美和亚太地区都呈现较好的发展势头，为巴中加强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巴中两国都是大国，在世界上有重要地位，有许多共同关心的问题，对重大国际事务看法一致或接近，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巴中发展友好关系具有战略意义。巴西政府愿做出一切努力，进一步加强和扩大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以具体行动推进两国经济合作的发展。近年来，两国政治交往趋于密切，高级官员互访频繁。

应该说，中国在拉美发展友好关系的基础是存在的。中国与拉美同属发展中国家，历史遭遇相同，对当今国际问题

的许多看法相近。

当然，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拉美外交仍有待加强的必要。

中美洲成为台湾“务实外交”的外交重镇。

中国在南美洲面临的形势也较为严峻。

在拉美，我们必须面对现实，脚踏实地地多做工作。

在拉美，我们可以改变外交策略，我们应该有所作为。

江泽民旋风般的非洲六国之行

1996年5月初，江泽民在送走来访的俄罗斯和中亚四国元首之后，旋风般地开始了非洲六国之行。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精心安排，面向整个非洲的一次国事访问活动。分析六国特点不难看出，东非肯尼亚是被誉为“人类摇篮的文明古国”，联合国环境署所在地，中国和肯尼亚的关系一直很“热乎”，政府高级官员频频互访，莫伊总统在1980年、1990年和1994年三次访问中国，中国外长两年前访问过肯尼亚；另一个东非国家埃塞俄比亚有“非洲屋脊”之称，是非洲统一组织所在地；北非埃及是世界文明古国又是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之一，还是阿盟总部所在地和与中国最早建交的非洲国家；马里是西非第二大国；南部纳米比亚是非洲大陆最后一个获得独立的国家。

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在重要的历史时刻进行的一次有特殊意义的友好访问，其大的背景概括起来是：（1）人类即将进入21世纪；（2）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迈出了决定

性步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并展示出光明的前景；（3）非洲 53 个国家在赢得了政治解放以后正在努力振兴本国经济，非洲在国际社会的政治份量日益加重；（4）国际局势总体走向缓和并正在向多极化发展，但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5）台湾当局在非洲露骨推行“银弹外交”。

基于上述因素，江泽民非洲六国之行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受访国家更是翘首以待。出访前夕，《肯尼亚时报》发表评论称“不管是对肯尼亚还是对非洲大陆，应该张开双臂欢迎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主席”。路透社发自北京的电讯则称：“中国主席将赴非洲进行里程碑式的访问。”

1996 年 5 月 8 日—24 日，江泽民行程达 38000 公里，受到六国人民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和殷勤招待。

江泽民从 5 月 8 日飞抵内罗毕到 5 月 22 日告别哈拉雷，一直置身于亲切、热情、友好的氛围之中，时时有宾至如归之感。他援引中国古语“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深有感触地说：“中非之间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但我们的心是靠得很近的。”

5 月 8 日，肯尼亚肯雅塔国际机场欢歌笑语，鼓乐喧天，60 多面肯中两国国旗迎风招展。专机停稳后，经过 12 小时长途飞行的江泽民健步走下舷梯，同前来迎接的老朋友莫伊总统亲切握手，互致问候。机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肯尼亚总统莫伊说：“阁下决定把肯尼亚作为您历史性的非洲之行的起点，这是肯尼亚的荣誉。”莫伊总统亲自陪同江泽民前往丽晶饭店，并送至总统套间。当晚，肯尼亚斯瓦希里语

电视台就肯中关系举行荧屏座谈会；翌日，《民族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江泽民到访消息和大幅照片。为欢迎江泽民，莫伊总统在晚宴上特意安排乐队演奏江泽民家乡民间乐曲《杨柳青》，使客人倍感亲切。

5月11日，江泽民飞抵有“鲜花之城”美誉的亚的斯亚贝巴。机场和市区主要建筑上悬挂着埃塞俄比亚和中国国旗、内加索总统和江泽民主席画像。在舷梯旁，初次相识的两国元首紧紧握手。内加索总统热烈欢迎江泽民主席不远万里来访，他说：“在埃塞俄比亚人民饱经30年内战家破国衰享有和平之时，在埃塞俄比亚联邦共和国成立之后，您的来访意义重大。”“从各方面说，您对埃塞俄比亚的访问是一次历史性的访问，……是我们两国关系史上的里程碑。”江泽民衷心感谢内加索总统的盛情邀请，并为能访问“非洲屋脊”的美丽国家而感到高兴。在21响礼炮声中，一位身着艳丽服装的少女向江泽民献上花束。花束用10多种色彩各异的鲜花组成，散发着沁人心脾的芬芳。

之后，江泽民抵达开罗机场，由埃及副总理瓦利陪同，直奔江泽民下榻的建于100多年前的王宫库巴宫，受到等候在这里的穆巴拉克总统的热烈欢迎。穆巴拉克总统曾六次访华，其中三次是江泽民出任中国最高领导人职务之后，两位元首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他致辞说：“我们在发展两国关系方面不存在任何问题，完全可以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江主席这次访问必将使埃中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继续得到发展。”江泽民首次访埃，埃及朝野视为一件富有历史意义的盛事。当天，《共和国报》在第五版推出中国专版，并冠以通栏大字标

题：《热烈欢迎江泽民主席访问埃及！》埃及发行量最大的精息报》在今日时评专栏，为埃中建交 40 周年发表评论说：“江泽民主席对埃及的访问，无论在北京还是在开罗，都受到高度重视。这种重视来源于连结埃中两国悠久的特殊关系。”

5 月 17 日，江泽民的专机抵达马里巴马科赛努机场，受到科纳雷总统和数千群众的热列欢迎。两位少女手捧装满清水和可拉果的器皿，请江泽民品尝。21 响礼炮声中，欢迎群众或戴假面具踩高跷，或伴随激越的非洲鼓点跳起奔放的民间舞蹈；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著名女歌唱家法杜雅塔在乐队伴奏下用中文高歌《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隆重的欢迎仪式结束后，江泽民和科纳雷总统乘敞篷车前往市区，沿途 15 公里的公路两旁的数十万群众冒着 45 度的高温，挥舞马中两国国旗和江泽民、科纳雷画像，不停地向中国客人欢呼：“你好！中国！”敞篷车行至中国贵宾下榻的友谊宾馆见 0 米处，一队身穿猎装的农民朝天鸣枪向江泽民一行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当天的《发展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江泽民的照片和周恩来总理 32 年前访问马里的历史照片。当晚，科纳雷总统在欢迎宴会上隆重地为江泽民主席授予马里最高勋章——大十字勋章。

5 月 18 日，江泽民踏上纳米比亚的国土就同迎候在舷梯旁的努乔马总统热烈拥抱。曾经 8 次访华的努乔马，会见过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的中国领导人，也是新一代中国最高领导人江泽民的好朋友。他们第三次相逢在新生的纳米比亚，都感到由衷高兴。努乔马总统为江泽民主席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一同驱车前往总统府促膝交谈。他对江泽民说：

“我们感到十分荣幸，您决定把纳米比亚包括在您的具有巨大影响的非洲之行中。”随后又送江泽民上汽车，前往中国贵宾下榻的城郊俱乐部饭店。

5月20日，江泽民飞抵非洲六国之行最后一站津巴布韦。

穆加贝总统和政府要员亲往哈拉雷机场迎接，隆重的欢迎仪式在21响礼炮声中进行。曾7次访华的穆加贝对江泽民的来访感到由衷的喜悦。他曾对中国记者说过发自内心的一席话：“津中两国多年来的友谊，使我们敞开胸膛、张开臂膀、打开大门热烈欢迎江主席的到来。”

在非洲六国期间，从机场到国宾馆、总统府、议会大厦、英雄纪念碑，从市中心到郊外工厂、农场、儿童活动中心、风景名胜点，从首都到外地，江泽民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好客的非洲人民的热情欢迎和殷切款待。

让我们撷取几组镜头：

在肯尼亚东非大裂谷谷底奈瓦沙湖畔的奥塞利安农场，等候在这里的数百名花卉工人向江泽民齐声高喊：“欢迎您！欢迎您！”来到花卉分类厅，一名少女将一包鲜花献给江泽民。花卉厅地面上的鲜花组成中国国旗图案，红花为底色，黄花为五角星。江泽民高兴地说：“妙极了，谢谢你们。”

江泽民来到开罗郊外的“斋月十日城”，该城管理机构主任赛义德向江泽民赠送一把金光闪闪的城市钥匙，并表示为能接待中国元首而感到骄傲。江泽民参观的地毯厂、卫生洁具厂门口，醒目地悬挂着穆巴拉克总统和江泽民主席的巨幅画像。地毯厂陈列室一幅编织精美的江泽民的彩色肖像挂毯，

令在场的人员赞不绝口。

中国贵宾光临中国援建的温得和克儿童活动中心，孩子们在乐曲声中翩然起舞，并唱起了礼赞祝福歌。一位少女将一枚红色月季花挂在江泽民胸前；一名男孩将他所作的象征纳米比亚中国友好的图画赠给了江泽民。江泽民把一批书包、文具和糖果赠送给儿童活动中心，并欣然题词：“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乳白色的犹如一架钢琴的巴马科会议大厦，沐浴着金色的阳光。承建这座大厦的中国技术人员和马里市民一道欢欣鼓舞地迎候江泽民的到来。这座建筑物的外墙和门口，悬挂两幅横标十分醒目：“马中关系——南南合作的典范”、“向勇敢的中国人民致敬”……

“始终感觉到生活在热情洋溢的友谊之中。”江泽民在内罗毕对中南两国记者所谈的这番感受，是他历史性的非洲六国之行情感体验最为贴切的写照。

江泽民非洲六国之行的“重头戏”是应非统组织之邀发表长篇重要讲演。

成立于1963年5月，拥有53个会员国的非洲统一组织，是非洲唯一的全洲性政治组织。其宗旨是促进非洲国家的统一和团结，协调并加强非洲国家之间政治、外交、经济、文教、卫生、科技、防务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其总部设在亚的斯亚贝巴。

作为埃塞俄比亚的首都、非统组织所在地的亚的斯亚贝巴，近年来积极调解索马里冲突和布隆迪危机，注重推动非洲之角经济一体化，呼吁国际社会重视非洲，不要让非洲成

为“被冷淡的一角”。因此，亚的斯亚贝巴又有“非洲政治首都”之称。

江泽民发表演讲的地方，被安排在市中心的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会议大厅。会议厅共设 700 多个座位，分为代表席、使团席和记者席。厅内有非洲各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的头像和壁画及非洲各国提供的装饰品。门厅三幅总面积为 150 平方米、由红绿黄三色基调组成的大型玻璃漆画格外引人注目：红色基调象征着非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愚昧的艰苦斗争；绿色基调象征着非洲人民在反殖斗争胜利前夕的希望和殖民主义的垂死挣扎；黄色基调则象征着非洲人民的觉醒、胜利和光明未来。

5 月 13 日当地时间 9 时许，各国驻埃塞俄比亚使节、埃塞俄比亚政府官员和知名人士、江泽民的随行人员鱼贯进入会议大厅。追踪采访这一重大新闻的各国记者，则更先一步“占据”有利地形。

10 时许，江泽民主席、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在非统组织秘书长萨利姆、埃塞俄比亚外交部长塞尤姆和矿产能源部长伊兹丁陪同下登上讲坛，会场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江泽民环顾大厅，以控钻有力的语词开始了充满感情的演讲：

“戏很高兴有机会同在座的各位朋友见面。我要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非洲各国政府和人民，转达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

“我和我的同事一踏上美丽的非洲大陆，就置身于亲切、热情、友好的氛围之中。中国古语说：‘相知无远近，万里尚

为邻。’中非之间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但我们的心是靠得很近的。”

江泽民追溯两千年前中非的交汇、15世纪郑和对非洲东海岸的访问、反法西斯战争期间中非人民的相互支持后指出：“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一系列非洲国家挣脱殖民主义统治宣布独立，中非关系进入全面发展的新时期。”“在近40年间，中国领导人多次访问过非洲，足迹遍及几十个非洲国家；有40多个非洲国家的100多位领导人访问过中国。双方高层领导人的频繁交往，使中非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结下了累累硕果。”

他宣示：“我这次访问非洲的目的，一是向非洲人民学习，增进了解，加深友谊；二是向非洲和各国政府和人民表明，同广大非洲国家世代友好是中国政府始终如一的基本方针和中国人民永久的心愿；三是在新形势下同非洲朋友探讨共同关心的问题，进一步发展中非的传统友谊和合作关系。”

江泽民在论述国际形势复杂而深刻的巨大变化时强调说：国际局势总体走向缓和，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发展，但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世界并不太平，贫国和富国的差距还在扩大，人类生存和发展条件受到种种威胁。总之，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对于我们既有机遇，又有挑战。

谈到非洲形势，江泽民说：非洲正步入一个求和平求稳定。求发展的历史新时期。目前非洲经济总体上仍比较困难，但我相信，自强不息的非洲人民一定能克服困难，加快发展步伐，走向充满希望的未来。

江泽民介绍了中国人民在快要过去的20世纪中做了的两

件大事。当前面临的三个主要任务，中国发展的切身体验，并指出：“中国的发展，为中非之间友好合作，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开辟了更广阔的前景。”

值此世纪交替的历史时刻，中国最高领导人江泽民郑重地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宣布：“中国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巩固和发展同非洲各国面向 21 世纪的长期稳定的、全面合作的国家关系。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中非世代友好建立新的历史丰碑。”

江泽民接着提出了以下五点建议和意见：

- 真诚友好，彼此成为可以依赖的“全天候朋友”；
- 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
- 互惠互利，谋求共同发展；
- 加强磋商，在国际事务中密切合作；
- 面向未来，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江泽民高屋建瓴地指出：过去的 100 年作为非洲的“解放世纪”已载入了史册。未来的 100 年将会成为非洲的“发展世纪”而写入新的历史篇章。

江泽民预言：“一个团结、稳定、繁荣的非洲，不仅意味着赢得政治解放的非洲人民也获得经济解放，而且必将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and 人类的文明与进步做出巨大的贡献。”

他说：“我们有着难以忘怀的昨天、绚丽多彩的今天，还拥有生机盎然的明天。”

他最后表示：“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愿和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大陆的非洲一道，风雨同舟，休戚与共，满怀信心地迈向对世纪。”

江泽民的长篇演讲，激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这篇题为《为中非友谊创立新的历史丰碑》的演讲，立即被各大传媒发往世界各地。

周恩来总理当年访问非洲十国，提出了中国同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和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奠定了中国与非洲国家新型关系的基础。江泽民此次在亚的斯亚贝巴提出的五点建议，着眼于中国与非洲各国面向 21 世纪的长期稳定、全面合作的国家关系。这可以看作是中国的“新非洲政策”而载入史册。马里总统科纳雷高度评价江泽民发表的“新非洲政策”，认为这一讲话证明中国始终言行如一地维护和发展对非洲的友谊。日本一家报纸则认为，江泽民的五点建议意在战略上重视非洲。

如果说 1963 年底前后，周恩来总理第一次访非为中国与非洲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指明了航向，开创了历史性的发展道路，那么江泽民非洲之行不仅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当前的中非关系，而且为中非建立面向 21 世纪长期和稳定的国家关系铺平守道路，为中国与非洲国家在下世纪的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未来，把中非关系推向一个更新阶段和战略高度。更加深远的意义还在于，中国对非洲的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不可轻视的组成部分，因而这次访非的成功，也是建立我国面向 21 世谋对外战略关系的重要步骤。

5 月 21 日，在江泽民即将结束非洲六国之行前夕，陪同江泽民访问的中国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举行记者招待会，对江泽民同非洲国家领导人达成的四点共识作了概括：第一，双方都认为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中非传统友好合作符合双方的

利益；

第二，双方都希望在建设各自国家的过程中相互学习和借鉴，谋求共同发展，在新的形势下，双方的合作要改变过去仅是政府间合作，而把双方的企业、公司转为合作的主体；

第三，双方都认为，在新的形势下，加强中国和非洲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和团结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支持非洲在国际关系中反对外来干涉，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的斗争。江泽民主席访问的六国都积极支持中国统一大业，在台湾问题上都支持中国的立场；

第四，在如何看待人权、如何维护人权、如何发展民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双方的看法也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双方都认为，发展中国家首先是要有一个和平与稳定的环境，才能发展经济、发展民主。

当记者问到如何看待中非关系的发展前景时，钱其琛说：

——首先，双方都有坚定的政治意愿，非洲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非洲，中国与非洲休戚与共，命运相连，双方高层领导人之间的直接接触和交往，增进了彼此相互了解，加深了友谊，为巩固和发展面向 21 世纪的全面合作关系提供了主要的政治条件。

——其次，合作已有着广泛而坚实的基础，中非双方在长期的合作中，建立起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利互助的良好合作关系，有许多成功的经验，进一步加强合作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另外，新形势为中非关系提供了新机遇，当前非洲形势趋向稳定，经济开始好转，中国经过十几年改革开放，

经济获得了长足进展。这些为双方的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国际社会对非洲也开始有所重视，在这种新形势下，中非双方携手努力，开拓创新，一定可以把中非关系推向新水平。

钱其琛说，江泽民主席访非期间，中国同非洲六国签订了 20 多个合作协定，这说明双方发展有着很好的前景，江泽民主席风尘仆仆三万八千公里，满载非洲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和访问获得的丰硕成果回国，历史将记载这次历史性的访问创立的新的历史丰碑。

乘普通航班出访

1994 年 4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率团出访乌拉圭、阿根廷、巴西等拉美三国。

乌拉圭是胡锦涛访问的第一站。国家不大，共有 18 万平方公里，300 万人口，一览无余的田园风光，花团锦簇的伊比利亚式的宁静城市，绵延几百公里的金色海滩，足以勾勒出它的自然和人文景象。因为扼守着汇广大支流于一江的拉普拉塔河进入南大西洋的咽喉，乌拉圭长期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冲。西班牙与葡萄牙、巴西与阿根廷、英国与西班牙一次又一次的拉锯战，给这方土地带来流血和污秽、穷困和屈辱。不屈不挠的乌拉圭人民在大国的夹缝中奋勇争斗 5 个世纪，实现了民族复兴、国家独立和自主发展，造就了刚直不阿的民族气节。

4 月 19 日恰逢乌拉圭纪念 1825 年 33 名爱国将士驱逐巴

西侵略军的节日。听说胡锦涛来访，拉卡列总统打破了常规的外交礼仪和私人的假日安排，请代表团到他距首都 200 多公里的科洛尼亚的乡间别墅。那是一处满目苍绿，繁花似锦的恬静休憩地，在门口迎候的拉卡列穿着棉布衬衫，灯笼马裤和皮靴，腰扎镶着铜环的宽腰带，活脱的一个高乔牧人打扮，胡锦涛健步上前，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相互真诚的目光，温暖的笑容，热情的话语，使生疏和拘束感荡然无存。总统殷切地拉着胡锦涛参观他的居室，津津有味地介绍件件家珍，唯恐漏掉什么。仪态典雅的总统夫人和略显拘谨的侄儿也被引见给客人，大家围坐在古色古香的客厅间，浓郁的家庭气氛油然而生。是朋友就真诚相待，生活中的他才是真实感人的。

胡锦涛向总统转达了中国领导人的问候，热情地致以节日的祝贺，一语打开了他的心扉。拉卡列总统带着与大洋彼岸的 12 亿中国人民的代表共庆民族尊严日的喜悦，落地有声地说：“乌拉圭是个小国，但小得有份量，这就是珍惜民族独立和尊严，在国际事务中坚持独立自主的道义原则。”“世界的种种变化表明，中国将成为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世界需要均衡，一个强大的中国是当今世界举足轻重的均衡力量，对乌拉圭这样的小国而言，更是如此。”胡锦涛论述中乌关系的重要性，表达了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真诚愿望，引起总统的强烈共鸣。他进而滔滔不绝地列数乌拉圭的地缘经济优势，展望乌中经贸合作的前景，描绘区域集团化发展的蓝图，宾主的感情交融在一起。

时间不知不觉中过去了一个多小时，彬彬有礼的礼宾官

无可奈何地中止了会见。分手时，新知已成为故交，乌拉圭总统的家珍中又增添了一幅中国松鹤双面绣。

曾长期在“老、少、边、穷”地区工作的胡锦涛离不开群众，更“偏爱”贫民。在紧张的礼仪拜会活动之余，总忘不了访贫问苦，牵挂着中国 8000 万人口的扶贫问题。在乌拉圭参观农场路上，他就不辞辛苦地“光顾”了贫民住房改造工地，详细了解贫困户的组织合作社，集体贷款，自己建造住房的经验。在阿根廷从塞雷尼西玛乳制品厂回来的路上，又绕道几十公里，考察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一个正在实施“菜园子工程”的贫民区。

近年来，阿根廷经济走出低谷，跨上稳定增长的台阶。但是分配不公和发展不平衡把更多人抛向贫困的深渊。贫困化问题、失业问题、社会稳定问题伤透了多少政治家的脑筋，又拖着国家经济发展的后腿。阿根廷从科技扶贫入手，由国家资助组织科技人员分赴农村和市郊贫困地区办班，办校，对贫民子弟进行实用技术培训，让他们因地制宜掌握脱贫致富的手段，给绝望的人们带来新的希望。为了引导就业方向，政府在部分地区重点扶持以蔬菜种植、家禽饲养等为主的自给自足式经营，“菜园子工程”因此得名。

代表团刚一下车，在田间劳作的人们便四散着跑去洗手，光顾这里的人实在太少了，更不用说是外国人。胡锦涛一把握住身边一位中年妇女沾满泥土的手，又把她的儿子拉过来问长问短。她叫格拉谢拉，丈夫因为工厂倒闭失了业，夫妇俩带着两个孩子同有着相似境遇的邻里们在城市垃圾场上清理出这片空地安了家。在政府的帮助下，他们办起了技工学

校，这一带 13 至 17 岁的孩子们边学习边干木工、泥瓦匠和菜农。房子虽简陋，但是自己设计建造的；蔬菜虽长得不够茁壮，都是自家种的。生活在劳动中露出笑容，孩子们在学习中插上了自谋生路的翅膀。胡锦涛的和蔼可亲驱散了人们先前的紧张和拘束感。散去的人们又重新围拢过来，争先恐后地诉说着自己的“业绩”，孩子们更是人前人后嚷闹着，“贫民窟”里洋溢着节日般的气氛，陪同的“工程”协调员介绍说，这里的经验已经在全国各地推广，有 4000 多名科技人员参与培训工作。他不无感慨地说，“济贫不如扶贫，给蛋不如给鸡，有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希望能与中国的同行交流合作。”

阿根廷是个耐人寻味的国家，西班牙殖民者对土著居民的驱逐和杀戮，造成了它本土文化的断裂。于是，新移民从世界的四面八方涌来，以牧歌式的冒险经历，填补着领土和文化的空白。阿根廷大都市的每个区、每条街、每座建筑都记录着这个新民族诞生的里程，留下了异质文化冲突、妥协、包容，以致调和为一体的印记。曾几何时，阿根廷人在潜意识中保持着原有的民族观念和优越感，现代潮流却带来一些新的变化。社会经济的发展促使阿根廷人民更加关注文化的汇同和民族的汇同，寻找能增强国家向心力和凝聚力的民族灵魂标志，探戈就成为阿根廷新民族文化的国粹了。

在主人周到的安排下，代表团观看了这一雅俗共赏的艺术表演。探戈虽已风靡世界，但他地道道的探戈是集音乐、舞蹈、歌唱和诗歌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它的根在阿根廷。那节奏明快。风格独特的切分喜，那华丽高雅、热烈放浪的舞

步，那激越奔放。如泣如诉的演唱，那诙谐幽默、愤世嫉俗的歌词，无不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然而如果用心灵去感受，探戈的真正内涵和魅力却在于它所反映和表达的阿根廷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喜、怒、哀、乐。从 19 世纪末期诞生于阿根廷的移民大潮以来，探戈经历了从酒吧、家庭、上流社会到艺术殿堂，乃至成为世界性交际舞的发展过程，但它始终没有脱离过抒发阿根廷民族情感的历史主旋律。深沉忧郁的思乡曲调，讽刺戏德的创作手法，兼收并蓄的艺术风格，雄浑高亢的演奏激情，正是这个民族的真实写照。

塞雷尼西玛乳制品厂、因普萨机械设备公司和圣安娜酿酒厂的创业史，真象是异曲同工的咏叹调。在探戈的乐曲中，本世纪初，几户穷困潦倒的意大利难民为逃避欧洲经济的萧条，带着对新生活的渴求，踏上这片混沌未开的土地。他们靠着粗重劳动的原始积蓄办起家庭作坊，从模仿到创造，从参与到开拓，义无反顾地与命运抗争，成为产业发展领域的佼佼者。这是他们共同走过的道路，也是阿根廷民族的发展历程。探戈还在演变，向着深沉，向着成熟，就像这个民族，在多变的世界中，在东西和南北的漩涡中，重新寻找自己的坐标。反思着过去，编织着今天，憧憬着未来。

代表团在巴西的访问一路伴随着一个“水”字，水让人们更多地了解了这个国家。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人类自然财富的伊瓜苏大瀑布处于巴西西南端。巴西与阿根廷交界处的伊瓜苏河在这里绝壁百丈，苍劲雄伟的奇岩峭石有 3 公里宽，飞瀑分 275 组渲泻而下，真可谓“无端绝壁起雷霆，倏尔神兵战鼓临，鲸

吼一声震谷响，鳖翻千里浪潭深。”置身这蔚为奇观，心灵不能不为自然的原始力量所震撼，山川有魂，草木知情，这壮美、险恶、质朴的原始生态环境不正是巴西人民特有的激情和活力的源泉吗！

距瀑布 14 公里处是世界上最大的伊泰普水电站，由巴西和巴拉圭两国联合建设和开发。1260 万千瓦的装机容量，790 亿度的年发电量，18 台 70 万千瓦的发电机组，可说是规模浩大。这项工程直接投资 113.7 亿美元，99% 靠贷款。1974 年动工，1992 年建成，1991 年起年发电收益 23 亿美元，预计 2023 年还清本息。巴西在外债问题上确有历史教训，但他们利用外部资金为经济的长远发展搞战略性基础设施建设，这样的远见和勇气是值得钦佩的，中国的三峡工程将采用 70 万千瓦的发电机组，已掌握有关技术的伊泰普水电站自然是不甘寂寞，已跃跃欲试地加入了国际投标者的行列。水利工程师出身的胡锦涛在伊泰普水电站更是“如鱼得水”，他怀着浓厚的专业兴趣认真了解每一个细节，与巴西的同行热烈讨论着技术问题，相知何需曾相识？最后，他又在坝区亲手种下“中巴友谊树”。临别时，胡锦涛热情地祝愿伊泰普水电站能以最有竞争力的条件参与中国长江三峡工程的国际合作。

亚马孙河是世界第一大河，流程最长，流量最大，流域面积最广。它浩浩荡荡全长 6751 公里，千回百转汇集上千条支流，烟波浩淼滋润 700 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亚马孙流域是葱茏茂密的天然热带雨林，蕴藏的木材占世界总储量的 45%；高等植物 4 万种，巴西独有的就有 1.2 万种，真不愧

为“地球之肺”。在马瑙斯市年轻的市长的陪同下，代表团抱着探寻神秘的原始森林和未开化的印第安人居留地的好奇，沿着亚马孙河的支流——黑河泛舟而下。胡锦涛与市长一路畅谈着亚马孙地区的开发问题，还接受了当地记者的采访，稍有空闲又被同志们拉去满足他们的合影要求，到这里来一趟不容易，与胡锦涛同来的机会就更可贵了。遗憾的是由于时间短暂，船到两江汇合处就掉头返回，不可能再换乘独木舟深入林区腹地了。遥望两岸，胡锦涛对巴西资源的丰富和发展潜力的巨大深表赞叹。

不知从什么时候，“南方”成为不发达的代名词，也许是因为世界经济的中心总是由东向西在北半球游移，把南半球撇在外围和边缘。今天，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生产力要素的变化又一次冲击着国际分工体系和经济力量对比，在竞争中无情地动摇着弱者的地位。巴西这个南方大国从来不甘心置身于发展的快车之外，如今未及彻底走出经济衰退的阴影，已迈出战略性的追赶步伐。它没有依赖资源的富有，因为资源的禀赋不再是决定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全球经济正在从资源竞争转向资源利用能力的竞争。它没有满足于劳动力的充裕，低成本竞争的优势正逐渐丧失，非价格竞争的決定因素是质量，是人的知识和科技水平。它没有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受地球资源和资金积累的制约，靠扩张性宏观政策刺激需求来推动大规模高消耗产业发展和维持经济总量高速增长的局面难以持久，世界经济已从总量增长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它也没有忽视利用综合国力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重要性。它所寻求的是一条以国家为主导加速科技发展和经济知

识化的捷径，目标是成为 21 世纪的世界大国。

科技项目是胡锦涛重视的参观内容。在巴西各地的访问虽然短促，代表团还是挤时间参观了巴西稀树草原农牧业研究中心和亚马孙研究所等科研单位，了解巴西科技发展状况及有关政策。在有限的参观和与巴西中央和州、市各级领导人的接触中，巴西政府强调科技在经济发展战略中的先导地位；在经济依然困难的情况下，不惜大量增加科研投入；重视对国土状况、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的综合性整体研究和规划；积极参与电子计算机、宇航、遥感、生物工程、核能、光通讯等新技术领域的国际竞争；走科技研究与开发国际化道路等。同时，巴西对与中国联合研制资源卫星、和平利用外空和生物工程技术合作等抱以热忱，这给长期处于低水平的南南合作开辟了新天地。在全球性经济实力竞争的机遇和挑战前，处于劣势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难道不能从巴西科技强国的发展思路中得到某种启示吗？

这是一次紧张而有意义的访问。来去 17 天，访问了三个国家九个城市。为了给国家节省开支，行程 6.5 万公里，均乘普通航空公司班机。空中飞行时间累计 68 小时，平均每天飞行 4 小时。一路 8 次倒时差，多则 16 小时，少则 1 小时。长途跋涉十分劳累，又加上生物钟的紊乱和紧张的工作安排，正常的睡眠和饮食都不能保证。然而为了达到“增进友谊，加强合作，促进和平，推动发展”的出访目的，从政治局常委、部长、省委书记到普通工作人员，个个精神振奋，不辞辛劳，全团上下充满了关心、理解。团结、合作的友爱气氛，使访问取得圆满成功。

胡锦涛在同 3 位总统、1 位副总统、2 位前总统、5 位议长、8 位部长和 3 位市长的会见中，从国家关系全局出发，针对不同对象，有重点地介绍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建设情况，并就国际形势、双边关系以及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难点等问题与对方交流经验和看法。这样的高层往来和领导人之间的沟通是任何宣传媒介和联系渠道所无法取代的。代表团访问期间与三国 8 个政党的 40 多位领导人进行了接触，既有执政党，也有参政党和重要合法在野党；既有举足轻重的领袖人物，也有崭露头角的政治新秀。乌拉圭大选在即，代表团分别拜会参与角逐的三大党总统候选人，他们彼此政见各异，但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都抱有同样的友好感情，纷纷表示如执政将积极发展对华关系。胡锦涛在与三国各级政府领导和企业界的交谈中广泛探讨进一步加强科技和经贸合作的途径，并结合中国改革开放中遇到的问题，交流借鉴有益经验；同时抽出时间看望中资企业代表，了解中拉贸易及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情况。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代表团深入农村、工厂、电站、大学、研究所和贫民区，以真挚的感情和细致的交流，把友谊的种子播散在人民群众中。

对中亚决不“输出经济改革模式”

同前苏联东欧国家发展关系基本原则

苏联东欧剧变后，中国及时地调整了这些国家的外交政

策，迅速地制订了对该地基本原则，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一）中国同中东欧国家发展关系的基本原则

1995年7月江泽民主席在访问匈牙利时说，中国同中东欧国家发展长期友好关系五项原则是：

第一，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不干涉别国内政。

中国历来主张，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和模式，完全是一个主权国家内政，别国无权干涉。

第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一视同仁地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差异不应成为发展国家关系的障碍。

第三，中国中东欧国家没有根本利害冲突。我们同中东欧各国发展关系绝不针对第三国，完全基于实现共同繁荣，促进欧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的目标。

第四，根据平等互利原则扩大中国同它们的经贸合作，促进彼此经济的发展，以造福于各自国家的人民。

第五，真诚希望中东欧地区稳定，各国人民友好和和睦相处，支持和平解决相互之间的争端，尊重和支持本地区国家加强区域性合作的愿望。这是中国针对中东欧解体情况所制订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具有指导性。

（二）中国同独联体国家发展关系的基本原则

1994年，钱其琛说，中国在同独联体国家的关系中遵循以下基本政策：第一，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尊重并理解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及所处环境奉行的对内对外政策，绝不干涉其内部事务。第二，主张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发展模式等差异不妨碍双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正常的国

家关系。我们希望通过友好协商妥善解决发展关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第三，坚持平等互利，按国际经济往来的规范开展多种形式的经贸合作，谋求共同繁荣。第四，真诚希望各国内部及原苏联地区稳定、繁荣，各国之间和睦相处，通过和平手段文明解决彼此的分歧以及历史留下来的各种复杂问题。中国同其中一国发展关系并不针对任何其他第三国。上述基本原则是中国处理同新独立的独联体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个最基本原则的具体体现。这些基本原则当然也适用于同中亚各国的关系。因为中亚各国也是独联体国家。钱其琛表示，今后，我们同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的关系就是：既不是结盟关系，也不是对抗关系。这才是正常的关系。重新回到结盟，不需要也不可能，对国际局势不利。重新搞对抗，对国际局势也不利。中国和独联体国家保持一种睦邻友好的、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对国际形势可以起到建设性的作用。

（三）中国同波罗的海国家发展关系的基本原则

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还阐述了中国对波罗的海国家的基本政策。在发展同波罗的海地区各国关系中，中国一贯遵循以下基本原则：第一，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尊重并理解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及所处环境决定自己的社会发展道路和其对内对外政策，绝不干涉其内部事务。第二，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主张超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差异，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第三，根据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加强同各国的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促进共同发展。第四，尊重该地区各国加强区域性合作的愿望，

并希望它们相互之间以及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邻国友好相处，通过和平手段妥善解决彼此的分歧及历史遗留的问题。真诚希望波罗的海各国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

由此可见，中国在苏联东欧剧变后，尤其是苏联解体后，对前苏联地区有了一个完整的外交政策构想和原则，这些构想和原则是十分重要的。中国与前苏联各国关系之所以能够得到良好发展，是与这些构想和基本原则分不开的。

同中亚各国发展关系的基本原则

中亚地区是中国极为关注的地区，这是因为中亚地区是中国的近邻。中国有一千个理由来关注该地区的发展和稳定，关注中亚地区事态的变化。一苏联剧变之时，中国对苏联所发生的一切都抱着“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苏联解体，各主权国家纷纷宣布独立，尤其是独联体成立后，中国本着“尊重别国人民的选择”的原则，承认中亚各国的独立。随后，中国派出以李岚清为团长的政府代表团访问了新独立的中亚各国。

中国在同中亚各国发展关系时依据什么样的原则呢？同发展其他国家关系所遵循的原则一样，中国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中亚各国关系的。在中国与前苏联新独立的共和国建交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中国政府在国际交往中的一贯立场是，坚决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己的选择。从这一立场出发，中国政府于去年12月27日正式宣布承认俄罗斯联邦政

府和其他十一个共和国的独立。”“中国一向愿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关系。中国 and 原苏联的各共和国是友好近邻。中国人民同这些共和国人民之间有着传统的友谊，相互间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我们赞赏这些国家政府表示尊重和支持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一贯原则立场。中国愿意同原苏联的其他共和国谈判建交事宜。我们衷心祝愿中国同俄罗斯联邦、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乌克兰、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土库曼斯坦共和国以及原苏联的其他共和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是中国几十年来处理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的总结和经验，更是中国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这个基本原则也完全适用于新独立的中亚各国。不仅如此，在苏联解体之时，中国政府和人民没有像某些国家那样对新独立的国家——当然包括中亚各国——指手划脚，横加评议，表现出大国主义和霸权主义。

中亚各国是中国的新邻居。中国对发展同中亚各国的关系十分重视。除了中国与发展独联体国家关系的四项基本原则之外，中国又针对中亚地区提出了更为明确的外交政策的构想和原则。1994年中国政府总理李鹏在访问中亚各国时，提出更为明确的处理同中亚各国关系的四项基本原则，即（1）坚持睦邻友好、和平共处；（2）开展互利合作，促进共同繁荣；（3）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不干涉别国内政；（4）尊重独立主权，促进地区稳定。这是中国政府同中亚各国发

展关系所遵循的基本准则，也是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总原则的具体体现。

（一）“坚持睦邻友好、和平共处”，就是建立一种关系正常而友好的“邻居”关系

李鹏总理说：“中国同中亚国家或者是有着共同的边界韵邻国，或者是近邻。睦邻友好是中国和中亚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完全符合我们彼此的根本利益。现在，中国人民正在专心致志地建设自己的国家，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和平国际环境，特别是良好的周边环境。我们对中亚各国人民始终抱有善意和友好之情。我们永远是你们的好朋友、好邻居。中国在上世界上包括在中亚地区从不谋求任何私利，不摘自己的势力范围。就是将来经济发展了，国家强盛了，也决不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将永远同自己的邻国保持平等友好关系。你们完全可以相信，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中国的这一方针都不会改变。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中国永远是中亚各国的“好朋友”、“好邻居”。应该说，邻居关系有好有坏。同样，国家的邻居关系也是如此。而且，一般的邻居关系好坏容易调节。实在不行，还有迁走的选择。而国家间的邻居关系则不同，若产生不友好的关系，一则会给双方国内政策造成很大负面影响，牵扯国内经济建设的精力；二则双方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也会导致双方关系变形，出现突发事件，影响该地区的稳定。所以，国家间的邻居关系必须坚持“睦邻”原则。中亚5国中有3国同中国毗邻，即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这是中国西北部的新邻居。中国同这些新邻居有着很长的边界线。中国同

这3国的关系也是新型的，崭新的，没有任何历史的沉重的包袱，没有过去的积弊。如果说存在某种不愉快的历史事实，也是沙皇俄国和苏联大国主义所为，与中亚各国人民没有关系。事实上，沙皇俄国在19世纪掠夺了中国大片领土，在20世纪中期苏联又在中国西北部策动了大规模武装叛乱。这些都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感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伤痕。但这些同中亚各国人民没有直接联系。实际上，中亚各国人民同中国人民一样历史上受到伤害很深。现在中亚各国独立了，中国人民和政府真诚地希望同中亚各国人民和政府发展友好睦邻关系，并且将这种关系一代一代地保持下去。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中国西北部和中亚地区的繁荣和稳定，才能使欧亚腹地的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

（二）“开展互利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就是在睦邻友好的关系下，同中亚各国开展互利的经济往来、经济合作和经济开发，求得共同繁荣

李鹏总理说：“发展经贸合作在相互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这一方面，我们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我们应当做也可以做的事情还很多。我们在同中亚各国的经济合作中，将严格遵守平等互利原则，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中国愿同中亚各国一道，不断改善合作的环境，扩大合作的领域，提高合作的水平，互利互惠，走共同发展之路。”

中亚各国现在正处于经济的转型时期，出现了一系列的经济困难和经济危机；中国也处于经济改革的关键时期，发展和改革的任务很重。尽管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能够在互利合作的基础上尽力发展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在经济上

给予必要的支持。这种经济支持是不带有任何附加条件的，同时也是按照国际经济贸易规范进行的。在这方面，中国的态度是从这一前提出发的，即中亚各国克服经济衰退和经济危机的能力越强，就越有可能使中亚地区走向繁荣和稳定，而一个繁荣而稳定的邻居对中国来说毕竟是有利的。只有中亚各国处于繁荣和稳定的状态下，中国同其经济往来才能顺利地进行，才能加速中国西北部地区的开发。所以说，中国西北部地区的繁荣和稳定，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同中亚各国的繁荣和稳定连在一起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主张积极进行经济合作，以达到共同繁荣。

（三）“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不干涉别国内政”，就是充分地体现对“邻居”的尊重

李鹏总理说：“世界是多样的，中亚各国的国情也各不相同，世界上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适合所有国家国情的单一的发展模式。我们认为中亚各国同中国一样，同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一样，都有权独立自主地选择适合本国实际情况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发展道路。我们相信，中亚各国完全有能力、有智慧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事实上，中亚各国的独立是在十分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完成的。苏联解体是由其内在规律决定的。独联体各国的独立也有其内在逻辑。从实际情况来看，中亚各国对彻底独立缺乏足够的物质准备和精神准备。虽然这些国家也宣布了独立国家宣言，但它们追求的是联盟或者联邦框架下的主权国家。三个斯拉夫国家宣布成立独联体时并不包括中亚各国。但中亚各国无法离开前苏联这个基本框架。所以，它们又以创建

国的身份加入了独联体。独联体各国选择独立的道路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自己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无须他国加以“决定”。同样，中亚各国选择独立的道路也是历史给予中亚各国人民掌握自己命运的机会。

至于模式问题和社会制度问题，中国更是尊重中亚各国人民的选择。中亚各国人民走什么样的道路，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中国绝不过问，中国政府的一个原则是把国家关系同意识形态区分开，同世界上不同制度的国家友好相处，包括中亚各国。中国也注意到，摆在中亚各国人民和政府面前的有五花八门的可供选择的发展道路和模式：有西方式的，也有东方式的；有世俗的，也有宗教的；有民主类型的，也有专制类型的；有分权制的，也有集权制的；有单一经济类型的，也有混合经济类型的。如此种种，令中亚各国政府眼花缭乱。这表明，世界上的各种势力都在竭力影响中亚各国的政策，力图将中亚各国纳入自己的发展轨道。同时，中国也注意到一些新独立的国家对中国模式抱有一定的兴趣，而另一些国家则对“土耳其模式”感兴趣，还有个别国家对“韩国模式”感兴趣。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决不强迫他国接受“中国模式”。中国经过十多年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经济发展很快。但这是在中国特殊的条件下取得的，中国决不“输出经济改革模式”。至于中亚一些国家准备借鉴中国一些经济改革的经验那是另一回事，中国愿意同中亚各国交流经济改革的经验和教训，互相切磋，避免不必要的挫折和走不必要的弯路。中国也抱着借鉴的态度观察中亚各国的经济改革经验，为我所用。

（四）“尊重独立主权，促进地区稳定”，就是充分尊重中亚各国的独立主权，尊重这些国家的国际法主体的地位，在同这些国家发展关系时坚持平等原则，促进地区稳定

李鹏总理说：“中国衷心希望中亚地区保持长期的和平和稳定。我们赞赏和支持中亚各国为维护国家独立与主权、促进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促进各国的友谊与合作所做的一切努力。我们发展同中亚各国的关系不针对任何第三国。我们愿意看到中亚各国彼此和睦相处，并且同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中亚各国的发展需要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世界也需要一个稳定繁荣的中亚。”

尽管中国是一个大国，但中国并不以大国自居，欺压或不尊重中亚新独立的国家。因为如果不尊重这些国家的主权，就很难谈得上保持该地区的稳定。不仅如此，中国准备尽其所能，帮助中亚各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应有的作用。中国曾积极支持中亚各国加入联合国，加入其他国际性的各种组织。而且，中国同中亚各国发展关系决不是针对任何第三国的。

同中亚各国发展关系的 四项基本原则的作用和意义

几年来的事实表明，中国同中亚各国的关系发展顺利：中国同中亚各国的高层政治交往日益密切，政治关系处于十分协调的状态；中国同中亚各国的经济贸易也有很大发展；文化往来日趋增多。所有这一切是与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基础上发展与中亚各国关系分不开的，与中国同中亚各国发展关系的四项基本原则分不开的。

李鹏总理的塔什干演说受到了中亚各国人民的重视和好评。1994年4月23日，阿卡耶夫总统说，中国同中亚国家发展关系的四项基本原则，给包括吉尔吉斯斯坦在内的中亚各国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符合中亚各国人民的利益，在维护中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方面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他说，李鹏所说的中国永远是中亚各国的好朋友、好邻居这句话，短短几天里在中亚各国已经家喻户晓。4月23日，阿卡耶夫总统在同李鹏总理会谈时说，这些原则对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和整个中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特殊的积极作用。

李鹏总理在塔什干公开阐述的不是权宜之策，而是今后我国长期遵循的基本政策。它引起了中亚国家及其人民的积极反响和共鸣。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塔什干演讲的精神将会显示出更加强劲的生命力。“世世代代友好相处是中国和中亚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完全符合各自的根本利益。”

中亚各国在中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

中国将同中亚各国发展关系也放到中国外交政策上的“优先位置”。例如，李鹏总理表示，中国和土库曼斯坦两国都在集中力量进行建设，都需要有一个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特别是良好的周边环境。我们十分重视巩固和发展同包括土库曼斯坦在内的所有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把它放在对

外关系的优先地位。1993年10月19日，李鹏总理会见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时说，中哈是近邻，中国十分重视同哈萨克斯坦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中哈之间的互利合作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也有利于本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1992年8月8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钱其琛在同苏列伊麦诺夫外长举行会谈时指出，中哈之间有着传统的友好合作关系，中国政府把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1992年11月22日，钱其琛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同其外长会谈时再次表示，哈萨克斯坦是中国在中亚国家中的最大邻国。中国重视同哈萨克斯坦的关系，愿意同这个国家发展持久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钱其琛指出，中哈两国对许多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相同或相似。1993年12月，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在会见乌兹别克斯坦外长赛义德卡西莫夫时说，乌兹别克斯坦是中国的近邻。两国人民的交往源远流长，中乌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长远利益。中国对乌兹别克斯坦人民始终抱有友好和善意之情。中国重视同乌兹别克斯坦的关系，并支持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和人民为维护独立、振兴经济所作的努力。可见，中国同中亚各国发展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在中国外交政策中占有重要位置。

当然，就像同中国发展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并不占中亚各国的外交政策的首要地位一样，同中亚各国发展关系也不占中国外交政策的首要地位。这些状况都是由一系列历史因素以及中国和中亚各国在国际政治格局的地位所决定的，这是

非常自然的客观现实，但这并不妨碍中国与中亚各国发展非常良好的互利合作关系。

对中亚地区的几点或考虑

一、中亚地区的特殊性

中亚各国在苏联解体中兀然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格局。

中亚地区地处欧亚连接点和战略接合部上。自古以来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横贯欧亚大陆的第二条大铁路的开通，使中亚成为连接东西交通的走廊。

中亚地区也是各种思想、文化、宗教相互作用的接合部和融汇点。从文化上看，中亚的穆斯林文化、斯拉夫文化、汉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从宗教上来看，伊斯兰教、天主教、东正教、佛教、儒教等在这里发挥影响；从意识形态上看，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西方价值观在这里互相撞击；从思潮来看，泛突厥主义、“大哈萨克主义”、“大乌兹别克主义”、“大塔吉克主义”有所抬头。总而言之，该地区是世界上各种文化、思想、宗教互相撞击最激烈的地区。

中亚又是世界上民族成分最复杂的地区之一。这里分布着 100 多个大大小小的民族。中亚的基本民族是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土库曼人、吉尔吉斯人、塔吉克人。俄罗斯族人在中亚占很大比例。这里还有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德意志民族等等。各民族互相融合、相互斗争，导演了一场又一

场民族融合和争战的悲喜剧。

中亚地区的战略资源十分丰富，盛产石油、黄金、天然气、生产核武器必需的钢，以及优质的棉花等。

所有这些都决定了该地区具有极强的经济战略地位。

正因为如此，中亚各国刚刚独立，就立刻成为世界外交关注的焦点。国际上的各方势力纷纷向该地区渗透，以争得有利位置。

从中国方面来讲，中亚的这种独特的战略地位，既存在着若干个不确定的因素，又显示了该地区今后发展的巨大潜力。可以这样说，中亚地区的独立既是世界走出冷战的产物，又必将对冷战后的世界政治经济局势产生重大影响。

二. 中国应该如何看待这个地区

中国是以积极的态度看待这个地区的。

应该坦白地说，中国在中亚地区不谋求特殊利益，同其他国家展开所谓的“中亚角逐”。但中亚地区重新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使中国确实面临着新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局势。过去中国是同一个苏联大国打交道，而现在则是同几个国家打交道，而且，这些独立国家的外交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越来越趋于多样化。这就要求中国方面尽快适应这种变化，制定出完整而又灵活的外交战略和策略。那么，中亚地区各国独立后对中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中亚地区各国的独立，使中国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格局发生了变化。中亚地区成为横在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大国之间的战略中间地带和接合部。这样，中亚地区成为除了蒙古共和国外中国与俄罗斯之间又一个战略中间地带。随着

中亚各国的独立，俄罗斯在西段同中国的边界变得很短。俄罗斯同中国的接壤主要体现在同中国的东北部的接壤。这是一个新的地缘政治格局。这意味着什么呢？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来观察，可以这样说，中国的西北部和东北部的安全环境对中国来说是处于一个极好的时期。过去沙皇俄国和苏联对中国形成了强大的军事压力，这使中国在国内政策和战略选择方面受到很大牵制。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表现出同中国搞好关系的真诚意愿，双方的边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和平景象，这对中国一心一意搞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十分有利。将来，退一万步说，即使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掌握了俄罗斯大权，中国同俄罗斯在中国西北部地区也有了一个缓冲地区和中间地带。而在中国西北部尽管苏联解体造成了一些不确定因素，如核武器问题、军队问题、边界问题以及边界谈判问题，但经过几年的实践，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正在得到克服和解决。如 1996 年 4 月 26 日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签署的上海协定，就是最好的例证。

中亚各国的独立，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这意味着在欧亚腹地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市场，一个现实的和潜在的经济合作区域。这对中国实行全方位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时机。中国也正在抓住这个机遇，迅速地同中亚各国建立密切的经济联系，广泛地开展经济贸易合作，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亚各国共同发展经济，共同促进该地区的繁荣。应该说，中国同中亚各国的经济合作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传统。“丝绸之路”是中国同中亚各国发展经济合作和文化交往的历史纽带，它昭示了中国人民和中亚各国人民传统

友谊的源远流长。“丝绸之路”是中国人民和中亚各国为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曾做出巨大贡献的写照。经过若干年的历史隔断，今天，新的“丝绸之路”又一次深入中亚各国，其起点更高，交往更广，影响更大。过去，中国在西北部地区，其文章作在“防”字上，现在中国政府的文章作在“放”字上。从经济上看，中亚各国在前苏联国民经济体系中处于原料基地和商品市场的地位。这些国家采矿业、农业和畜牧业发达，但加工业却极其落后，新兴产业更是风毛麟角。苏联解体后，中亚各国同俄罗斯、乌克兰等国的经济联系遭到严重破坏。中亚各国不再将原材料廉价地出售给俄罗斯等国，而俄罗斯等国也不愿意低价提供消费品。这样中亚各国不得不向外寻找经济合作伙伴。这正是中国开拓中亚市场的大好机会。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企业家应该有远大的经济战略目光，不要搞“短期行为”，要认真调查中亚市场，树立起中国商品的良好形象，使中亚成为同中国进行互利合作的经济伙伴。

苏联解体后中国比较耽心的问题是民族主义和宗教思潮对中国的某些负面影响。也可以这样说，苏联解体后，独联体国家对中国可能产生最直接消极影响的地区就是中亚地区。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中国西北部地区是中国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地区。中国与中亚各国中间有一些跨境民族。这些民族一部分在中国境内，另一部分在中亚地区。在民族主义势力在世界范围内开始泛滥之时，中亚地区的一些民族主义势力会借机向中国渗透。所以，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同中亚各国共同合作，维护这个西北部地区的稳定和中亚地区的稳定。

因此，中国要想使其西北部长治久安，必须同中亚各国政府和人民一道，阻止民族主义势力在中亚地区搞什么分裂中国的任何活动，击毁一切分裂中国的图谋。中亚各国应该而且理解中国方面的立场和态度，不给民族主义势力创造任何条件。

与第三方面相关，中国对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有害思潮在中亚各国蔓延也有所担心。“双泛”思潮不仅对中亚各国走向市场经济和民主化道路起着阻碍作用，而且一旦这两种思潮在中亚各国占统治地位，则会危及邻国的安宁。目前，“双泛”思潮在中亚地区有发展之势，但没有占优势，中亚各国政府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繁荣，也限制“双泛”思潮的泛滥。从民族关系与宗教影响的角度来看，在抵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问题上，中国与俄罗斯以及西方国家有着相近的利益。在遏制泛突厥主义方面，中国与俄罗斯、伊朗等国能找到一定的共同语言。最主要的是中国应该同中亚各国政府一道反对“双泛”思潮的泛滥。

中国及时同中亚各国建立外交关系也有旨在阻止台湾以各种手段进入该地区的意图。西方一些分析家认为，中国在苏联解体后，立即表现出巨大的灵活性，同独联体诸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有三个原因：一是，中国需要抗衡俄罗斯的力量；二是，中国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新独立国家同台湾建立关系；三是，中国要为其商品开辟市场。这些分析有些是正确的，但有些是不正确的，如中国需要抗衡俄罗斯的力量观点就很不正确。中亚地区不可能成为中国抗衡俄罗斯的力量，中国也没有这样的打算。况且，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

很好，处于历史上少有的正常发展时期，中国为什么需要抗衡俄罗斯的力量呢？

钓鱼岛问题使中日关系蒙上阴影

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

1996 夏天，在日本政府的纵容和支持下，日本右翼分子到我国固有领土钓鱼岛等岛屿活动猖獗，激起我国人民极大义愤。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它位于中国东海大陆架的东部边缘，在地质结构上是附属于台湾的大陆性岛屿。钓鱼岛列岛位于台湾东北 120 海里处，西东分别距中国大陆和日本冲绳各约 200 海里，附近水深 100 至 150 米，与冲绳群岛之间隔有一条 2000 多米深的海沟。钓鱼岛列岛由钓鱼岛、黄尾岛、赤足岛。南小岛、北小岛、大南小岛、大北小岛和飞做岛等岛屿组成，总面积约 7 平方公里。

自古以来，中国台湾、福建等省渔民一直到岛上从事捕鱼、采药等生产活动，自明朝初年起，钓鱼岛及其列岛就属于中国版图。永乐年间（公元 1403 至 1424 年）出版的《顺风相送卜书》有关于钓鱼岛列岛的记载，这比日本声称的琉球人古贺辰四郎 1884 年发现钓鱼岛要早 400 多年。明朝以后中国许多历史文献对这些岛屿都有记载。

在日本 1783 年和 1785 年出版的标有琉球王国疆界的地

图上，钓鱼岛列岛属于中国。

19 世纪末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没有对中国拥有对钓鱼岛列岛的主权提出过异议。1895 年 4 月，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全岛及其所有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这以后在日本才有了“尖阁群岛”（即钓鱼岛列岛）之说，而在此之前，日本的地图一直是用中国的名称标定钓鱼岛列岛。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被美国占领。1951 年，美、日背着战胜国中国，非法签订了《旧金山和约》。《和约》第二条虽然载明日本放弃其对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一切权利、权利名义与要求，但第三条错误地把日本所窃取的钓鱼岛等岛屿归在美国托管的琉球管辖区内。中国总理周恩来当时严正声明，中国政府坚决不承认《旧金山和约》。中国政府 1958 年在发表的关于领海声明中宣布，日本归还所窃取的中国领土的规定“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领土，包括台湾及其周围岛屿”。

日本觊觎我钓鱼岛由来已久

日本觊觎我钓鱼岛列岛并非始于今日。在 19 世纪末爆发中日甲午战争前，日本没有对中国拥有对钓鱼岛列岛的主权提出过异议。1884 年日本那霸居民古贺首次登上钓鱼岛采集羽毛和捕捞周围海产物。他随后提出开拓钓鱼岛的请愿还被冲绳县知事拒绝。1885 年后，冲绳县知事多次上书日本政府，要求将钓鱼岛、黄尾岛、赤尾岛归其管辖，日本官方都

顾及中国清朝政府对这些岛屿的主权主张而没作答复。但是后来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后，通过强迫清朝政府签订《马关条约》而攫取了台湾及附属各岛屿。日本在二战中战败后，把台湾归还给了中国，却把台湾的附属岛屿钓鱼岛等私自交给了美国托管。

60年代末联合国委员会宣布该岛附近可能蕴藏着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后，日方立即单方面采取行动，先是由多家石油公司前往勘探，接着又将巡防船开去，擅自将岛上原有的标明这些岛屿属于中国的标记毁掉，换上了标明这些岛屿属于日本冲绳县的界碑，并给钓鱼岛列岛的8个岛屿规定了日本名字。

1971年，美日两国在签订归还冲绳协定时私相授受，把钓鱼岛等岛屿划入归还区域。这一交易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1972年中日两国在恢复邦交的谈判中，双方从中日友好的大局出发，同意将钓鱼岛列岛归属问题挂起并留待以后条件成熟时解决。可是，当1978年中日谈判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日本一些敌视中国的国会议员提出要中国承认日本对钓鱼岛列岛拥有主权。日本政府顺应右派要求，出动巡逻艇和飞机对我在钓鱼岛列岛海域作业的渔民进行监视。翌年5月，日本政府用巡视船将人员和器材运到钓鱼岛，并在那里修建了直升机场，还向那里派出调查团和测量船。

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局势和国家间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日本再次将手伸向钓鱼岛。1990年10月，日本的一些右翼分子经政府允许，在钓鱼岛列岛的一个岛屿上修建了灯塔。日方还出动12艘船只和2架直升机阻扰台湾渔船接近

钓鱼岛列岛。1996年7月14日，日本右翼分子在钓鱼岛列岛的北小岛设置了一座灯塔，企图使灯塔列于海图以便让国际社会承认钓鱼岛是日本领土。8月18日，日本右翼分子又在钓鱼岛上竖起绘有“太阳旗”和纪念死者字样的木牌。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右翼分子在钓鱼岛上进行的这些活动都得到了日本政府的纵容和支持，而且政府要人与此相配合，称钓鱼岛就是日本领土，并要日本海上保安厅随时准备用武力排除“干扰”。

日外务省文件供出真相

钓鱼岛之争又一次影响了中日关系，日本官员把责任推到中国人身上，甚至指责香港传媒煽动，然而，根据日本官方的文件显示，此次激发中国人保钓浪潮的正是日本政府及日本极右派团体。他们想借“新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出笼之机，在1996年正式把钓鱼岛列岛永远纳入日本控制之下，从而在东海经济资源的分配上进一步和中国讨价还价。

根据日本外务省官方纪录，1995年对外新闻发布会议没有一次谈及钓鱼岛。基本上遵守“搁置主权争议”的不成文共识。1996年在对外新闻发布会上首次提及钓鱼岛问题的是2月19日。当时的发布会主要是围绕“竹岛”问题（韩国称为“独岛”）。由于日方较早时提出对“竹岛”的主权，引起了南韩的强烈反应，日本外务省认为有必要向外国记者做出公关工作。详细解释日方的立场。当时有记者提到中国在钓鱼岛附近钻探石油，并询问日方会否就“竹岛”及“尖阁诸

岛”（即钓鱼岛）提交国际法庭裁决。外务省发言人当时答道：“就我所了解，我方无意这样做，因为在一般情况下我可以告诉你，除非双方同意，否则是不可能提交国际法庭的。”从这位官员的说话可见，日方当时仍承认钓鱼岛和“竹岛”均存在着领土争议。

由于日本把钓鱼岛问题视为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事，台湾当局于2月14日发表声明，重申拥有钓鱼岛主权。

但在2月2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却发表了强硬立场，他表示：“在历史上和法理上，尖阁诸岛一直是日本领土的一部分，它在日本的有效控制之下，在这方面不存在着领土争议问题。”

3月2日，参加完曼谷亚欧高峰会议后，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在被记者问及传闻桥本在与中国总理李鹏会晤时对钓鱼岛有不同意见，桥本不敢公然说钓鱼岛是日本的，反而低调地称谓主权争议会营造起不必要的情绪问题。

但日本政府实际上另有部署，在6月2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外务省发言人在被问及与外国的领土争端时表态称：“尖阁诸岛从来都是日本的领土及受到日本的有效控制，在日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不存在着领土纠纷。”若说2月20日是回应台湾，则此次是针对中国。

有关日本政府的强硬言论，在1996年上半年并没有受到外国传媒的重视，中国人民亦不甚了了。及至7月，日本民间“右翼团体”阳本官方也是如此定性）日本青年社在毫无阻拦的情况下登上钓鱼岛岛屿，建造灯塔、建碑和挂日本旗

等，此举引起中国人民的愤怒及政府的抗议。与此同时，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舰船也加强驱逐在钓鱼岛附近作业的台湾渔民，欲在行动上把侵占变成事实。

7月期间，日本外务省在3次新闻发布会上谈及钓鱼岛问题。7月19日，发言人除重申其在2月20日的强硬立场外，对青年社的活动则以不清楚为托辞，只谓有所听闻。被记者提出“业权”问题时，发言人表示：“就我的理解，尖阁诸岛部分是由政府拥有，此外亦有私人拥有部分。”对于青年社为何可以自行在岛上建灯塔，发言人则以他本人并非国内法律专家为理由拒绝作答，对于一些外国记者要求日方详细解释主权立场和业权情况，并指出在“竹岛”问题上日方也曾这样做时，发言人玩弄外交辞令，谓容后有机会再谈。

7月23日，外务省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海上保安厅的巡舰船已证实了灯塔的建造”。有记者问，这岂不是说日本政府事前已知道青年社建造灯塔，而日本政府是否支持这个组织？发言人答道：“有报道谓一个名为日本青年社的组织已建造了该灯塔，但外务省未曾官式证实此事。政府在该小岛（指建有灯塔的岛）没有自己的土地。但现时我们已知道有一个小型灯塔已在该处建造。”当时有记者问如何申请去该地采访时，发言人顾左右而言他，不予回答。

在7月下旬，由于中国的抗议及台湾和香港掀起了一阵保钓热，期间传出有关日本政府将让步的消息，在7月2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便有记者指出有报道谓日本政府实际上已答应中方立即将灯塔拆除。他询问发言人能否予以证实，以及日本政府是否真的想拆除灯塔，发言人答道：“说老实话，

我们并没有这类的消息，所以我不能予以证实，但我不认为会如此。”他其实已间接表明了日方立场坚定。

同时，发言人证实青年社已向海上安全厅申请，作为正式的官方灯塔，他表示政府会小心考虑有关的申请。

8月间，该灯塔受到台风破坏。8月末9月初，日本舰艇加强驱逐中国人的船只，不准进入12海里水域。9月2日，香港《明报》记者乘台湾渔船欲前赴钓鱼岛，遭遇日方海军拦截。日本船舰还悬下中文的驱逐令，写明“日本政府要求你立即退出日本领海外”。消息及图片见报。日本外相池田行彦访港时表明强硬立场，遂激发起香港人以至海峡两岸中国人的无穷怒火。

在9月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日本外务省发言人证实逐船事件，但不欲再明言1996年以来多次申明的强硬立场。谓“我们已说了很多很多次，难道还要在这里再说一次吗？”他还说：“日本政府对于尖阁诸岛的立场已是众所周知的了，所以我毋需在这里多说一次。”

对于灯塔事件，发言人称：“灯塔已被台风或风暴部分损毁，而我们已获告之有关使之成为认可灯塔的申请已撤回。”有记者追问是否意味日本政府将把它拆除。对此，发言人不予回答。被问及若有青年社的人去修理灯塔又如何时，发言人则表示拒绝回答“假设性的问题”。

表面上，日本政府当天的立场稍有收敛，但也布下另一着翻脸不认帐的棋。有记者提到70年代中日领导人曾同意留待下一代人解决这场领土纠纷时，发言人打断他的问题，并说两国的联合声明肯定并没有这样的陈述。就是说，日方已

实质上推翻过去的不成文共识。

9月9日，青年社分子在海上安全厅舰船“目睹下”登上钓鱼岛岛屿修理灯塔，把它建得更坚固。在9月1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的焦点都集中在钓鱼岛问题上。

记者：你说政府并没有介入这些活动，所以人们可自由去尖阁诸岛建造任何东西？你是否认为从一开始让他们建灯塔便是一项错误？你是否但愿他们当初没有这样做？

发言人：我不知道是否应由外务省回答你这些问题，因为你的问题关乎内政。不过，我可以给你解释，首先，那里所有的岛屿都是由私人拥有的，政府在岛上没有任何土地，所以日本政府不能直接介入私人土地的使用。第二，你谈及一座灯塔，但我们认为这只是一座建筑物，根据日本法律这不是一座灯塔。所以，我可以一再告诉你，日本政府并没有介入私人组织的活动，亦无意支持这些活动。

记者：那么，你是否但愿他们没有建筑任何东西呢？

发言人：他们在私人土地上建造了一些东西。根据有关法律，我们并没有批准建造一座灯塔。

至此，可以看出日本外务省是如何的自掘嘴巴。之前外务省一直视之为灯塔并承认拥有岛屿的部分“业权”。但突然之间，却想推得一干二净。为何如此？

日本青年社与桥本龙太郎政府只是心灵相通，而非一致行动。事实上，青年社的人马也常骂桥本立场不坚定（恢复军国主义的步伐太慢！）。按照日本法例，建造灯塔必须受官方批准，桥本政府若不想拆灯塔便只能不承认这是灯塔！可是，由于外务省官僚忽略了本国法例，故一直认同了灯塔之

说。

另一方面，日本政府突然否认拥有岛屿上任何业权，主要目的是欲阻止外国记者到岛屿采访。

请看9月10日记者会的另一段对话。

记者：拥有签证的外国人能否前往尖阁诸岛？

发言人：在日本国内行走，我们不需要有任何文件。

记者：是不是说如果我有日本签证便能前往该处？

发言人：你想去？那是私人拥有的土地。难道你认为不需要业主许可便能入屋吗？无论怎样，日本政府视这些岛屿为私人拥有。

几经记者追问后，发言人透露了一些住在石垣岛（属冲绳县）上的人拥有钓鱼岛的“业权”，但谓无法提供与“业主”的联络资料。

那么，既然青年社的人并非“业主”，为何又能去建灯塔呢？发言人说或者他们得到“业主的理解或批准吧”。

跟着是一连串发言人更难招架的问题……

记者：难道政府会让任何人到私人土地建灯塔而不查核他们是否获得批准吗？

发言人：但在日本没有人投诉青年社的活动侵犯了私人土地的使用权哩！

记者：这很讽刺吧，海上安全厅的巡逻船不准任何渔船到该区，但青年社的船却可以去，为什么？

发言人：正如我所说，日本政府对这些岛屿的立场是很明确的。

记者：这是私人土地。若我前往，只要业主不说什么便

成吗？

发言人：当然，若业主批准，你自然可以去，但不幸的，政府不可能介入。

一些记者再三表示想去采访，但发言人谓与外务省无关，爱莫能助。

事情其实十分简单，日本政府是纵容青年社在钓鱼岛宣示“日本主权”，以配合欲实质霸占钓鱼岛的政策，因此才有青年社可去做一些非法（根据日本法例也是如此）勾当，其他人则不能踏足。而青年社从来没有说他们得到“业主”的批准才前往钓鱼岛建灯塔。

有外国记者到石垣岛了解谁拥有钓鱼岛“业权”，据石垣市政府官员称，“业权”是属于日本大藏省和一名 52 岁住在日本本州东京以北的奇玉县大宫市的商人栗原，而栗原家族现时只想置身事外。

据了解，栗原家族现时“拥有”钓鱼岛列屿的部分“业权”，是在 70 年代从古贺家族“购人”的，其余岛屿的“业权”则一直仍属日本政府所“拥有”。

日本政府一时一套，甚至公开说假话，反映他们在钓鱼岛问题是如何的理屈辞穷。

不允许把中日关系引入歧途

1996 年 9 月 11 日下午，中国驻日本国特命全权大使徐敦信，就日本右翼团体一再登上我钓鱼岛修建灯塔等事，向日本外务省提出严正交涉，并阐明了中国的严正立场。

徐敦信指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他说，近来，在日本有关当局的放任和纵容下，日本一些团体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涉，一再登上钓鱼岛并修建灯塔和其他标志物，严重侵犯了中国领土主权，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对此，中方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并郑重声明，日方的任何单方面行动都丝毫不能动摇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所拥有的主权，也改变不了钓鱼岛是中国领土这样一个事实，日方在岛上建造的任何设施都是非法的和无效的。

徐敦信说，中日双方在钓鱼岛问题上曾经达成共识，同意将这一问题暂时搁置，待以后解决。现在日方却改变初衷，放任甚至纵容日本一些团体恣意妄为。中国政府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切实遵循双方过去达成的谅解，立即采取措施，消除由此产生的恶劣后果和消极影响，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美众议院扬言有权协日“保钓”

钓鱼岛风云再起，美国众议院有人放话：《美日安保条约》有责任协日“保护钓鱼岛”。此言论虽不是白宫态度，但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

近期来，日美国内保守势力抬头，视中国的崛起为威胁。美国遏制中国需日本的配合，这恰恰符合日本借助美国力量带头制约中国的意图。

日美重新确认和加强两国安全联盟，反映出这两个国家

面对迅速发展的多极化局势，尽管双方经济矛盾和冲突难以消除，但是安全战略上合作和协调仍然是今后一段时期内两国关系的主要方面。尽管从长远看，日美针对中国的战略意图，很可能是一厢情愿，能否成功需要时间来验证。

事实上，日美都各有自己的打算：美国的长期考虑中仍然要制约日本，为此需要借助中国；而日本在遏制中国问题上，要把美国推到前台，避免自己出头引起中日关系紧张，在中美矛盾中获得利益。退一步讲，即使日美共同行动、联手制华，必将导致亚太地区的混乱甚至“冷战”重起，反过来也会危及日美自身的利益。

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访美

秋天，是金灿灿的收获季节。就在这美好的时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应克林顿总统的邀请，对美国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国事访问。从10月26日到11月3日，江主席旋风般地走访了檀香山、威廉斯堡、华盛顿、费城、纽约、波士顿、洛杉矶等7个城市，在美国掀起了一股“中国热”，一时间，江主席成为美国各大报刊头版的新闻人物，有关访问的追踪报道和介绍中国的文章连续不断；江主席的重要活动在各大电视台不停地转播；“中国”、“中美关系”成为美国公众的热门话题……

“客人怎样舒服满意我们就怎样安排接待”

江泽民主席此行是自 1985 年李先念主席访美以来，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访美，也是中国党、政、军最高领导人首次正式访美，标志着中美关系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因此，美国政府对这次访问极为重视，精心组织。克林顿总统对美方负责接待的人员作过专门指示：“中国客人怎样舒服满意，我们就怎样安排接待。”据中国有关人员介绍，美方确实按照克林顿的要求，在访问路线、活动内容和程序、安全保卫和新闻采访等诸多方面采纳了中方的意见，予以积极配合，保证了访问的顺利进行。

美国政府给予了中国贵宾最高规格的外交礼遇。克林顿自 1993 年当选美国总统以来，在白宫接待过不少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但这些外国领导人来访大多属于工作访问，很少得到红地毯、21 响礼炮和白宫晚宴的高规格接待。去年克林顿只接待过来自希腊和爱尔兰的两位国家元首的国事访问，而今年他用最高礼仪迎接的外国领导人唯有江泽民主席。

江主席访美期间，美国方面曾三次鸣放 21 响礼炮，以示敬意：一次是江主席到达第一站檀香山时，另两次是在抵达和离开首都华盛顿时。据有关人士透露，美国的这种做法超过了接待国家元首正式访问的规格，是给中国领导人的“特殊礼遇”。为了表示对中国客人的友好之情，美国政府还打破常规，由副总统戈尔代替原定由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前往机场迎接江主席，并主持次日的欢迎午宴。在江主席到达华盛顿

的当天晚上，克林顿就邀请他到白宫会晤。10月29日上午，美方在白宫举行了隆重、热烈、壮观的欢迎仪式。如果从军乐队入场算起，欢迎的时间长达一个多小时，欢迎者达3000多人。一位在场的美国人告诉记者，这种排场近些年来极为少见，好像只在克林顿的就职仪式上见过。在举行欢迎仪式时，美方考虑到江主席的夫人王冶坪年高体弱，专门为她安排了座椅，克林顿的夫人希拉里一直陪伴她坐到仪式结束。离场后，希拉里还搀扶着王冶坪走进休息室。

“要像保护美国总统那样保护江主席”

美国是世界上犯罪率比较高的国家，而华盛顿和洛杉矶的治安状况不佳在美国城市中更是首屈一指。此外，近几个月来，美国国内的台独、藏独和民运分子蠢蠢欲动，准备在江主席访美期间发起抗议示威活动。这些都增加了保安工作的难度。为了保护中国领导人的安全，美国联邦调查局、特情局明里暗里作了大量工作。有关州、市的警察部门也向中方明确表示，要采取最高级别的保安措施，像保卫美国总统那样保卫江泽民主席，确保中国领导人安全、顺利、愉快地完成访问任务。

在江泽民抵达夏威夷的前夕，美方将一部防弹汽车从本土空运到檀香山，专门供江主席使用。在美国本土6个城市访问时，美方为代表团配备了3辆防弹车。在江主席访美期间，美方安全部门与我方保安人员通力合作，撒下了三道严密的警卫线，护卫着江主席及其随行人员的人身安全。美方

还对数千名国内外记者进行了严格的分类管理。记者分为随团记者、有证采访记者和一般记者三大类。随团记者除了有美方颁发的专用采访证外，还有代表团的专用胸章标记，其中少数摄影、摄像和文字记者还领有美方的特殊徽章。佩带这两枚徽章的记者一般可以接近两国最高领导人，作近距离采访。在白宫等重地的入口处，美方警卫只要看到戴着这两枚徽章的记者，马上放行。有证采访记者一般需要事先登记，并在接受严格审查后领取采访证。这些记者在进入重要地区采访时，美方警卫要仔细核对名单并查验护照。他们可以参加一些大型活动，如白宫南草坪的欢迎仪式，但只可“远观”而不可“近来”。一般记者没有专用采访证，无法进入两国领导人的活动现场，只能看电视直播，听官方发言人或记者朋友“吹风”，领取一些文字资料，并以此编写稿件。美方还强化丁安检措施。现场采访记者必须经过美国安全部门“人力、警犬、仪器”这“三关”检查才能通行。由于采访和参加活动的人数较多，记者们往往在活动开始之前三四个小时就得赶到现场接受安检。

“你的琴声优美和谐，压倒了外面的‘噪音’。”

江泽民主席访美 9 天，先后出席了 40 多场活动，发表了包括一系列演讲在内的 30 多次谈话，同美国政界、经济界、科技界、教育界、华人华侨等各界人士广泛接触交流。美国新闻媒体对此进行了充分报告。江泽民主席坚毅沉稳、开明大度、幽默洒脱、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领袖风范，在千千万万美国人民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次访问的总体气氛是好的，但在少数场合，美国政府

以及当地的一些新闻媒体仍然向中国领导人提出了所谓的人权和西藏问题。

在白宫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克林顿公开指责中国的人权政策是“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江主席神情严肃地重申了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强调反对利用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美国一些报纸评论说，江泽民的谈话表明，中国第三代领导人继承了老一辈革命家坚韧不拔的传统，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绝不退让。

江主席访美受到大多数美国人的欢迎，但少数台独、藏独和民运分子也抓住机会，处心积虑地进行破坏活动。江主席到达檀香山的当晚，夏威夷州长在府邸为他举行盛大欢迎晚宴。就在此时，聚集在附近的几十个藏独分子通过高音喇叭，呼喊反动口号。听到外面杂乱的呼喊声，州长和夫人露出了忐忑不安的神色。可江泽民主席却依然谈笑风生。他望着正在为中国客人演奏钢琴的州长妹妹，意味深长地微笑着说：“你的琴声优美和谐，压倒了外面的‘噪音’。”在江主席提议下，州长夫人即席演唱了夏威夷民歌《阿洛哈》，江主席则弹起电吉他为她伴奏，宴会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宾主的欢歌笑语压倒了院外的“秋虫哀鸣”

虽然江主席的会谈等政务活动安排得很紧，但他仍然挤出时间会见科教界的一些著名学者，参观了美国的大学，并在举世闻名的哈佛大学发表了演讲。在波士顿，江泽民一下飞机便驱车探望他的老师、93岁高龄的著名学者顾流诱，此举被当地媒体传为佳话。在洛杉矶，江主席会见了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斯坦福大学华裔教授朱律文，同他拉起了家常。

江主席对朱律文说：中国人勤奋好学，五千年的文化孕育出一大批精英。中国有个重要的“出口”，那就是科学家和工程师。朱律文回答说，中国不仅会成为一个经济强国，而且将变成一个智慧大国。

在哈佛大学，江泽民主席受到校长陆登庭、哈佛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傅高义教授及上千名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代表的热烈欢迎。陆登庭在致辞中热情地赞扬说，江主席的来访“是哈佛300多年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江主席发表长篇演讲时，听众全神贯注，全场鸦雀无声。演讲结束后，江主席即席回答了与会者的提问。听众席上的一位女士举手发问：你对外面的抗议示威怎么看？江主席不慌不忙地微笑道：“我今年71岁了，但耳朵还很尖。我在演讲时，听到外面有高音喇叭的声音。我想我唯一的办法就是：我的声音要比它高。”话音未落，会场上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江主席向哈佛大学赠送了一套新出版，的《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并表示期待着明年在北京与陆登庭校长再次见面。当地媒体事后评价说，江主席在哈佛反应机敏，谈吐幽默，举重若轻，表现了一个大国领导人所具备的现代意识和良好风度。

东方风来满园春

南国春早。

一月的鹏城，花木葱茏，春意荡漾。

跨进新年，深圳正以勃勃英姿，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就在这个时候，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各族人民敬爱的邓小平同志到深圳来了！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小平同志的到来，是对深圳特区最大的关怀和支持，是对深圳人民最大的鼓舞和鞭策。



1月19日上午8时许，在深圳火车站月台上，几位省、市负责人和其他迎候的人们，在来回踱步，互相交谈，他们正以兴奋而激动的心情等待着……

来了！远处传来马达的轰鸣声。接着一列长长的火车徐徐进站。时钟正指9时正，列车停在月台旁边。

一节车厢门打开，车站服务人员敏捷地把一块铺着红色地毯的长条木板放在车厢门口。

不一会，邓小平同志出现了！人们的目光和闪光灯束都一齐投向这位领一代风骚的伟人身上。

他，身体十分健康，炯炯的眼神，慈祥的笑脸，身着深灰色的夹克、黑色的西裤，神采奕奕地步出车门。他的足迹，在时隔8年之后，又一次踏在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这块热土上。

下车后，邓小平同志满面笑容地同前来欢迎的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市长郑良玉一一握手。

握手时，谢非说：“我们非常想念您。”

李灏说：“我们全市人民欢迎您的光临。”

郑良玉说：“深圳人民盼望您来，已经盼了8年了。”

简洁的话语，充分表达了全省、全市人民对小平同志的想念和崇敬之情。

邓小平同志同省市负责人登上一辆中巴，一直驶到下榻的市迎宾馆桂园。在这里恭候的市委副书记厉有为、市委常委李海东迎上前来，同小平同志握手并向他问好。

千里迢迢，舟车劳顿，市负责人劝他老人家好好休息。

但是，小平同志却毫无倦意。他说：“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想到处去看看。”

众所周知，邓小平同志是创办经济特区的主要决策者。早在1979年4月，他在听取当时中共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的汇报后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次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并颁布《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中国经济特区就这样诞生了。深圳特区是邓小平同志亲自开辟

的最早的改革开放的试验地之一。它的发展情况，小平同志当然十分关注。1984年1月，小平同志曾到深圳视察过。一晃，8年过去了。深圳的面貌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老人家急不可待要亲自目睹一番。

随行人员说，小平同志身体好，昨晚在车上休息得不错，既然他兴致高，就安排活动吧。

在桂园休息约10分钟，小平同志和谢非等同志在迎宾馆内散步。

散步时，邓楠向小平同志提起他在1984年1月26日为深圳特区题词一事。邓小平同志接着将题词一字一句念出来：“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一个字没有漏，一个字没有错。在场的人都很佩服他那惊人的记忆力。

1984年，特区建设遇到不少困难和阻力，有些人对办特区持怀疑观望态度。是年1月24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顾委主任的邓小平同志，同王震、杨尚昆同志在中顾委委员刘田夫和广东省省长梁灵光的陪同下，到深圳视察，给深圳特区题了词，肯定了深圳特区的建设成就，肯定了办特区的方针是正确的，给了特区建设以决定性的支持，坚定了人们办特区的决心和信心，使特区的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散步后，小平同志在省市负责人的陪同下，乘车观光深圳市容。

车子缓缓地在市区穿行。这里，8年前有些还是一汪水田、鱼塘、羊肠的小路，低矮的房舍。现在，宽阔的马路纵

横交错，成片的高楼耸入云端，到处充满了现代化的气息。小平同志看到这繁荣兴旺、生机勃勃的景象，十分高兴。正如他后来说的：“8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小平同志边观市容，边同省市负责人亲切交谈。

当谈到办经济特区的问题时，小平同志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厂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1/4，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车子行至火车站前，邓林指出火车站大楼边苍劲有力的“深圳”两个大字对小平同志说：“您看，这是您的题字，人们都说写得好。”

邓楠打趣说：“这是您的专利，也属知识产权问题。”说得小平同志笑了起来。

当谈到经济发展问题时，小平同志说：亚洲“四小龙”发展很快，你们发展也很快。广东要力争用20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停了一会儿，他补充说，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

他们管得严，我们应该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理更好。

车子不知不觉到了皇岗口岸。皇岗边防检查站、海关、动植物检疫所的负责同志，热情地欢迎小平同志的到来。

小平同志站在深圳河大桥头，深情地眺望对岸的香港，然后察看皇岗口岸的情况。

皇岗边检站站长熊长根向小平同志介绍说，皇岗口岸是1987年初筹建，1989年12月29日开通的。占地一平方公里，有180条通道，最高流量可达5万辆次和5万人次，是亚洲最大的陆路口岸，最近每天约通过7000辆次和2000人次。小平同志听了很高兴，不断点头，露出满意的笑容。

二

国贸中心大厦，高高耸立，直插云霄。这是深圳人民的骄傲。深圳的建设者曾在这里创下了“三天一层楼”的记录，成了“深圳速度”的象征。到深圳来的中外人士，总要登上楼顶的旋转餐厅，远眺深圳城市的景色。

1月20日上午9时35分，小平同志在省、市负责人陪同下，来到国贸大厦参观，该大厦的女职工，整齐地站在两旁，鼓掌欢迎小平同志，并齐喊“邓爷爷好！”小平同志高兴地向他们招手，并鼓掌致意。

在53层的旋转餐厅，小平同志俯瞰深圳市容。他看到高楼林立，鳞次栉比，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很是高兴。

坐下来后，他先看一张深圳特区总体规划图。接着，李灏向小平同志汇报深圳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情况。李灏说，深圳的经济建设发展得快，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1984年，人均收入为600元，现在是2000元。改革开放也有了很大的进展。他还说，这些年来，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是同步发展的。深圳人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坚定不移，并且充满信心……

听了汇报后，小平同志和省市负责人作了较长时间的谈话。

小平同志充分肯定了深圳的改革开放和建设中所取得的成绩。然后，他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小平同志又说，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

小平同志思路清晰，记忆力强，他谈笑风生，有时一两句幽默的话语，引得大家发出一阵阵笑声。在场的省、市负责同志聚精会神地聆听他老人家的谈话，不时还插上几句。谈话气氛轻松活跃。

小平同志侃侃而谈。他还谈到中国要保持稳定，干部和党员要把廉政建设作为大事来抓；要注意培养一代接班人等重大问题。

在谈话中，小平同志强调要多干实事，少说空话。他说，

会太多，文章太长，不行。谈到这里，老人家指着窗外的一片高楼大厦，深圳发展得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

小平同志精神健旺，谈兴甚浓。在国贸大厦旋转餐厅，老人家谈话约谈了30多分钟，使在场的人深受教育和鼓舞。

当小平同志离开旋转餐厅下到一楼大厅时，大厅的音乐喷泉，随着优美的乐曲，喷出图案多变的水柱和水花，蔚为壮观。一楼到三楼，站满了群众，黑压压的一片。人山人海，秩序井然。人人心花怒放，个个喜笑颜开。这是多么令人难忘的时刻！人们为有幸能一睹小平同志的风采而激动万分，也为小平同志的身体健康、精神饱满而无比高兴。

群众在尽情地鼓掌，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响彻国贸大厦。这掌声，表达了群众对倡导改革开放政策的小平同志的爱戴和崇敬；反映了群众对身受其惠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坚信和拥护。

小平同志非常高兴，满面笑容地频频向群众招手致意。整个场面十分热烈，呈现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同人民群众融洽无间的动人情景。

三

离开国贸大厦后，小平同志乘车去深圳先科激光公司参观。

先科激光公司，是一家高科技企业，引进荷兰飞利浦公

司的先进生产技术，是我国目前唯一的生产激光唱片、视盘和光盘放送机的公司。江泽民、李鹏、王震、田纪云、刘华清等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人曾先后到过这里视察。

车子到达先科激光公司时，该公司董事长叶华明等人迎上前去，和小平同志热烈握手。

有人介绍说，叶华明是叶挺将军的儿子。

小平同志握住叶华明的手亲切地问：“你是叶老二吧？”

“不是，我是老四”，叶老明伸出四只手指回答说。

“啊，我们快 40 年没见面了。”小平同志深情地说。

“是的，我那时是小孩子，现在 50 多岁了。”

“你弟弟叶正光在哪里工作？”小平同志对革命家的后代十分关心。

叶华明说：“在海南岛。”

原来，叶挺将军于 1946 年不幸飞机失事遇难后，叶华明于当年 5 月离开延安直到 1953 年，叶正光于 1952 年到 1960 年，都是生活在聂荣臻元帅家里。小平同志同聂帅常有往来，所以那时见过他们兄弟俩。

在公司贵宾厅，小平同志听取了关于公司情况的介绍。先科激光公司于去年 10 月 12 日正式投产，使我国继荷兰、日本、美国之后，成为第四个能够生产激光视、唱盘的国家。该公司可年产激光唱片 500 万张，视盘 150 万张，激光视、唱盘放送机 5 万台。

邓楠拿起一块闪光锃亮的激光视盘给小平同志观看。这种恍如镜子般的盘片，能储存 10.8 万帧色彩逼真的清晰图像，可长久保存，永不磨损。小平同志听了，十分感兴趣，

问：“是什么材料？”公司的同志答：“塑料上面镀一层银。”

他又兴味盎然地看了激光视盘的特性、音响效果、功能和检索能力的表演。当他看到传记资料片《我们的邓大姐》时，对身旁的广东省委书记谢非说：“我今年 88 岁，邓颖超同志和我同年，都是 1904 年生的。我是 8 月出生，她比我约大半岁。”

小平同志出生于 1904 年 8 月 22 日，家乡是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

小平同志接着说：“邓颖超同志是河南人。”他女儿邓楠说：“不，她是广西人。”小平同志纠正说：“她的原籍是河南。广西是她出生和长大的地方。”小平同志对邓大姐十分熟悉。

小平同志对他这位老乡的歌喉及音响效果十分赞赏。听完后带头鼓掌。一边起身，一边说：“很好，我听得很清楚，不走调，音响效果不错。”

从贵宾厅出来到激光视盘生产车间，经过 30 米长的过道，许多职工在过道侧热烈鼓掌欢迎小平同志。

小平同志问：“这些职工多大年纪？”

叶华明答：“大多数是 25 岁到 30 岁，由全国各地招聘来的，大部分是科技人员。”

小平同志听了高兴地说：“很好，高科技项目要让年轻人干，希望在青年人身上。”

在激光视盘生产车间，当叶华明介绍他们每年要生产一部分外国电影激光视盘时，小平同志问：“版权怎么解决？”

叶华明回答说：“按国际规定向外国电影公司购买版权。”

小平同志对此表示满意：“应该这样，要遵守国际有关知识产权的规定。”

小平同志边走边问，对公司的情况问得很仔细，他还问及原材料是否进口？我国目前能否生产？产品质量怎样保证等等，公司负责人一一作了回答。

当小平同志看到几位女工正在擦拭刚生产出来的激光视盘时，便停下来问：“你们是什么地方人？”女工们回答：“汕头人”。小平同志笑着说：“我一看就知道你们是广东人”，说得大家都笑起来。

临离车间前，小平同志问到公司今年的生产目标。叶华明说：“今年要生产 50 万张激光视盘，250 部激光视盘电影，国产片和外国片一样多，其中还有科教片和一部分卡拉 OK，总产值可达 3 亿多元，利润 8000 万元。”小平同志高兴地说，很好，希望你们努力实现这个目标。

小平同志到先科激光公司参观，给了该公司的职工以极大的鼓舞。公司董事长叶华明对记者说：“我是一直在党内老同志关怀抚养下成长的，见到邓小平同志身体很健康，我心里特别高兴。我决心在深圳第二个十年建设中，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不辜负小平同志的殷切希望。”

四

1 月 21 日，是华侨城建设者永远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小平同志到这里的中国民俗文化村和锦绣中华微缩景区游览。

“锦绣中华”，是集中国名胜古迹于一体的世界最大的微缩景区。中国民俗文化村，是中国民俗艺术的荟萃之地，是集民间艺术、民族风情、民居于一园的大型游览区。

上午9时50分，小平同志在省、市负责人陪同下，乘车来到中国民俗文化村东大门广场。民俗文化村顿时沸腾起来了。广场上欢声雷动，鼓乐喧天，身穿鲜艳民族服装的各族青年男女，载歌载舞迎接小平同志的到来。

在广场西侧，小平同志登上电瓶车，由徽州街西行，缓缓驶经各个民族村寨。所到之处，各少数民族的演员都在尽情地跳舞欢歌，敲鼓击乐，充满欢乐祥和的气氛。小平同志一行在这里领略了千姿百态的民族风情，欣赏了古朴纯美的民间歌、舞。而那别具一格的徽州石牌坊群，富有民族特色的贵州鼓楼、风雨桥，云南藤桥，金碧辉煌的西藏喇嘛寺等，又把小平同志一行带进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长河中。

正在这里游览的群众、港澳同胞和外国朋友，纷纷驻足道旁，鼓掌向小平同志致意。小平同志亦频频向他们招手。

到新疆维吾尔族民居，小平同志走下电瓶车，在这里坐下来，兴致勃勃地观看维吾尔舞蹈。这时，小平同志的小孙子走过来，邓楠抱住他，说：“亲亲爷爷。”小孙子亲昵地吻了一下小平同志的面颊，小平同志十分开心。

小平同志接着到锦绣中华微缩景区游览。在“天安门”前，小平同志下电瓶车观赏了“故宫”景色。然后，他走到“故宫”景点旁边的小卖部，很感兴趣地欣赏玻璃柜内的纪念品。

“在布达拉宫”前，小平同志分别同家人及亲属、陪同的

负责同志合影留念。

在驱车回迎宾馆途中，小平同志和陪同的负责同志亲切谈话。

小平同志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来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

他接着说，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

当深圳市长郑良玉汇报到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搞好时，小平同志说，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人民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可以搞上去。我们完全有能力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搞好。

小平同志还谈到要尽快把经济建设抓上去。他说，有条件的地方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

五

1月22日，边城深圳阳光明媚，仙湖植物园内春意盎

然。今天，小平同志和杨尚昆主席带领两家三代人到仙湖植物园种树和游览，给园内园外带来了无尽的喜悦。

上午 9 时 45 分，小平同志在省市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到仙湖植物园。随同来的有他的夫人卓琳、女儿邓林、邓榕和小孙子。随后，邓朴方同志也来了。

先到这里的国家主席杨尚昆，同小平同志热烈握手。接着步入展览厅，观看仙湖植物园模型。小平同志听了关于植物园的情况介绍后，高兴地说：“植物园大有可为。”

杨尚昆主席是 1 月 21 日到深圳视察的。小平同志和杨主席两位老战友在仙湖植物园相逢，自然高兴万分。

“我们在一起几十年啰。”小平同志深情地说。

“我们是 1932 年认识的。”杨主席说着扳起指头数起来，“42、52、62……92，60 年了！”

这时身背三部相机的杨绍明走过来，握着小平同志的手：“邓伯伯，新年好！”

邓榕说：“他是全国摄影协会副主席呀！”

小平同志幽默地说：“你们杨家有两个主席啰！”全场大笑起来。

接着，小平同志和杨主席一同步入室内观赏植物区。这是一个大温室，培育着古今中外种类繁多的珍稀植物，林林总总，使人目不暇接。

他们首先观看据说距今有 1.5 亿的恐龙时代的树种——桫欏。

小平同志说：“还有一种古代树种，叫水杉，现在全国都有了。有一棵很大的，在三峡附近。”说着，他还用手比划一

下。

植物园负责人陈覃清说：“是的，水杉树种距今约 7500 万年，是三峡附近湖北省境内发现的。”在场的人都很佩服小平同志丰富的知识和记忆力。

小平同志说的那棵很大的水杉，是 1946 年薛纪茹先生发现的，他采集了标本。1948 年，由胡先辅、郑万钧先生定名为水杉，公开发表，轰动了当时国际植物界。人们称此树种为活化石。这棵树胸径 2.4 米，高 35 米，在三峡附近湖北省利川县谋道这个地方。

接着，小平同志和杨主席仔细观赏其他植物，兴味极浓。

看到一种叫“发财树”的植物，邓榕风趣地对小平同志说：“以后咱们家也种一棵。”

小平同志指出“光棍树”问：“为什么叫光棍树？”植物园负责人回答：“因为它不长叶子。”

在湘妃竹、人面竹、方竹前，小平同志伫立观赏。植物园负责人介绍说，毛主席的诗句“斑竹一枝千滴泪”中的斑竹，就是指这种湘妃竹。相传很久以前，一个妃子逃难到九嶷山，哭得很伤心，一滴滴泪水滴在竹子上，就成为现在的湘妃竹。”

小平同志说：“成都竹子很多，有红的、黑色、紫的、黄的，也有方的。”植物园负责人说：“成都的望江公园各种竹子都有。”在场有人说：这里的竹子就是悄悄地从成都“弄”来的。小平同志开玩笑说：“这也属知识产权问题啊，我是四川人，要你们赔偿啊。”周围的人全都笑起来。观赏植物区里笑语声喧。

小平同志被这些珍稀植物吸引住了，他观赏得很仔细，注意听介绍，还不断提问，他指着一棵天鹅绒竹芋问：“它长不长芋头？”植物园负责人答：“不长，只供观赏。”邓榕接着说：“爸爸很喜欢吃芋头。”植物园的同志说，这种竹芋的叶子，摸上去像绒布。小平同志听了。好奇地摸了一下。杨主席随手捡起一片叶子，风趣地说：“带着留个纪念。”

杨主席也在以极大的兴趣，观赏着各种奇花异草。他观看猪笼草、鸟巢蕨时，鸟巢蕨那活像鸟巢的模样令他十分开心。他问这植物开不开花？靠什么繁殖？植物园负责人一一作了回答。

这里有一种兰花，很奇特，叫“跳舞兰”。植物园负责人指着一朵兰花给小平同志介绍：“这兰花样子像个姑娘。这是头、身子、裙、腿。它在跳迪斯科哩。”小平同志笑着说：“是，很像个姑娘在跳舞。”

从观赏植物区出来，小平同志和杨主席等人向大草坪走去。置身于美丽的大自然中，满眼是青山绿水，茂林修竹，小平同志感到心旷神怡。他高兴地同家人在这里合影留念。

这里，绿色主宰了大自然的风光，使人流连忘返。小平同志说：“这里的环境真优美。”杨主席赞叹道：“真是天上人间，世外桃源。”

10时10分，小平同志和杨主席在一片开阔的草地上，种下一棵青树——高山榕。小平同志和杨主席挥锹培土。接着，小平同志的家人也拿起铁锹，使劲地将土铲到树根上。邓朴方在旁人的帮助下，也培了几锹土。然后，小平同志和小孙子一齐端起个红色的小水桶浇水。

杨主席同小平同志一家栽好树后，又领着自己一家在不远处种下另一棵高山榕。杨主席和家人一道培土、浇水，动作非常敏捷。

高山榕是一种亚热带植物，桑科榕属，是广东省的代表树种之一。生长快，树冠大，四季长青。

小平同志和杨尚昆主席在这里种下长青树，给深圳增添了无边春色，也将为子孙后代造福遮阴。深圳人民一定会记住这个日子，记住他们为建立新中国、为改革开放所作的卓越贡献，记住他们对深圳特区的关怀和支持，记住他们那长久而浓厚的情谊。

种完树后，小平同志和家人在湖边散步。一家人乐也融融，尽情享受这温暖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欣赏这如诗如画的湖光山色。

小平同志精神奕奕地迈着步，表现出他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摄影记者们纷纷按下快门，拍下这令人高兴的镜头。

六

1月22日下午3时10分，小平同志和杨尚昆主席在市迎宾馆接见了深圳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的负责人，亲切地同他们一一握手。

接着，小平同志和杨主席同深圳市五套班子的负责人合影。合影时，坐在前排的有：小平同志、国家主席杨尚昆、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广州军区司令员朱敦法、广东省委

书记谢非、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广东省副书记郭荣昌、深圳市书记李灏、市长郑良玉、市委副书记厉有为。

合影后，人们都围拢过来，同小平同志握手，小平同志亲切地和大家交谈。

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握着小平同志的手，向他问好，并邀请他 1997 年访问香港。小平同志连声说：好，好。

广州军区司令员朱敦法中将向小平同志敬礼、问好。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向小平同志介绍说：“朱敦法同志在淮海战役中是个连长。”小平同志笑笑说：“那时还是个娃子哩。”在淮海战役这场波澜壮阔、规模宏伟的人民战争中，负责淮海前线一切事宜、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的总前委，由邓小平任书记。

今天，小平同志同省市负责人作了重要的谈话。

小平同志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 100% 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 100% 正确，没那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

李灏说，深圳特区在您的倡导、关心、支持下才能够建设和发展起来的。我们是按您的指示去闯、去探索的。

小平同志说，工作主要是你们做的。我是帮助你们、支持你们的，在确定方向上出上一点力。

小平同志还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

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在谈话中，小平同志还谈到了：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在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中，不搞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等等。

七

时间过得真快，小平同志在深圳，一晃几天过去了。1月23日，小平同志在广东省委书记谢非的陪同下去珠海特区。

上午8时30分，深圳市负责人以及警卫、服务人员，在市迎宾馆热烈欢送小平同志。人们都依依不舍，多么希望小平同志能在深圳多住几天啊。

小平同志和市负责人一一握手告别。

同车前往蛇口送行的有李灏、郑良玉、厉有为等。

车子在宽阔的笋岗路向蛇口驶去。在车上，小平同志和省市负责人亲切交谈。

李灏向小平同志简要地汇报深圳改革开放的几个措施：调整产业结构；放开一线，管好二线，把深圳特区建成第二

关税区；加强法制，依法治市，加强立法执法工作；把宝安县改为深圳的三个效区等等。

小平同志听了后说，我都赞成，大胆地干。每年领导层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不断总结经验，至少不会犯大错误。

李灏说：“您讲的非常重要，我们要争取少犯错误，不犯大错误。”

小平同志说：“我刚才说，第一条是不要怕犯错误，第二条是发现问题赶快改正。”

谈着谈着，车子到了蛇口。李灏说，南山区管蛇口这一片，南山区发展势头非常好，南山的荔枝很有名。全世界荔枝最好是中国，中国荔枝最好是广东、广东荔枝最好是东莞、增城、深圳等地方。

这时，邓榕插话：“那么，全世界的袖子哪里最好呢？”车子里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

原来，小平同志平时在家里，常对孩子们夸耀四川的柚子最好。孩子们都不同意，认为沙田柚子最好。

笑声过后，小平同志说，四川柚子最好，但认识统一不起来。

邓榕说：“说沙田柚子好的人多，说四川柚子好的人少。”

车子在蛇口一个地方停了几秒钟，邓榕指着远处“海上世界”对邓小平同志说：“这是海上世界，是您给题的名。”

车子接着到赤湾港，缓缓地行驶。小平同志坐在车上察看赤湾港码头。

李灏介绍说，赤湾港在蛇口里面，可停 3.5 万吨的船，

准备建成停 5 万吨船的码头，赤湾港在蛇口外面，可停 5 万吨的。深圳东部、西部都有港口，去年吞吐量达 1400 万吨，将来要达到上亿吨。

车子到达蛇口港码头。下车前，李灏对小平同志说：“您这次来，深圳人民非常高兴。我们希望您不久再来，明年冬天来这儿过春节。”

小平同志下车后，同前来迎接的珠海市委书记、市长梁广大握手。

然后，小平同志同深圳市负责人李灏、郑良玉、厉有为一一握别。

小平同志向码头走了几步，突然又转回来，向李灏说：“你们要搞快一点！”

把握时机，快一点将经济建设抓上去，这是小平同志对深圳的期望，也是时刻萦绕在小平同志心头的一件大事。

李灏说：“您的讲话很重要，我们一定搞快一点。”

上午 9 时 40 分，小平同志乘坐的轮船离开蛇口港。

1992 年 1 月 19 日到 23 日，小平同志在深圳的这段日子，是极不寻常的日子，它将永远记载在深圳建设的史册上，永远记忆在深圳人民的心坎里。

“东方风来满眼春”。小平同志来到深圳，使深圳进一步涌起改革开放的春潮。小平同志在这里发表的许多重要谈话，对深圳的改革开放和建设，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敬爱的小平同志，我们衷心祝愿您健康长寿！深圳人民一定沿着您倡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